

學術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總第108期

1991 · 5



MEIXIAN POLYESTER FACT. OF MEIZHOU



学 术 研 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主 办 单 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 辑 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
电话：345916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深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 广东省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座谈会综述
..... (6)

· 经 济 学 ·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体论 高伟梧 (10)
广义再生产论 冯光明 (16)
论90年代深圳特区对外经济发展策略 林 江 (26)
在软中变革的世界经济
——兼谈格局、软竞争和人的因素 贾大武 (32)

· 哲 学 · 精 神 文 明 学 ·

理解主体客体理论和新唯物主义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 高齐云 (37)
胡塞尔论主体际性
——兼评当代哲学的“交往”困境 涂成林 (44)
试论古希腊哲学关于范畴体系的建构原则 崔延强 (48)
民族精神的科学界定及其意义 卢少华 (53)
全国首届广义进化与自组织理论研讨会综述 (59)

· 历 史 学 ·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

- 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 李洪岩 (61)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
——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周炽成 (67)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 禰倩红 (73)
贵在开新，贵在探索
——读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 吕 由 (78)

责任编辑 黄荣显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 民族凝聚力刍议 林佐良 (81)
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 肖君和 (85)

· 文 学 ·

陆一帆《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讨论专辑

- 陆一帆 何楚熊 邓志远 柯汉琳 申家仁 (90)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蔡景康 (100)
“浪仙”钩沉 杨晓东 (106)
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
——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 [新加坡]王润华 (111)
调整着视角的华文文学研究
——“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16)

· 国情省情市(县)情研究 ·

切实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

- 东莞市“科技兴市”问题的思考 姚锦柏 (119)
取之于侨 用之于民
——潮州市金石镇利用华侨捐资为民造福情况调查
..... 杨 越 李鸿生 (122)

· 企 业 研 究 ·

外向型企业发展道路的实践与思考

- 记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广东省市头甘化厂 罗文金 (125)
公关活动与企业的发展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的启示 余华湛 (127)

· 书 海 酌 蠡 ·

《尚书》“有众率怠弗协”解(殷伟仁·99) 韩愈《送权秀才序》为叔南仲作(金陵子·99)

ACADEMIC RESEARCH

No.5, 1991

CONTENTS

- A Deep Study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Jiang Zemin's Speech on
July 1st" Attended by Guangdong econom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orkers (6)
- Ontology of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Gao Weiwu (10)
- Broad Reproduction.....Feng Guangming (16)
- The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of Shenzhen
Special Zone in 1990s.....Lin Jiang (26)
- The World Economy in a Soft Reform---With a concurrent talk
about its pattern, soft competition and human elements
..... Jia Dawu (32)
- The Methodological Prerequisite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Object Theory and the Neo-Materialism
..... Gao Qiyun (37)
- Husserl's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e---A concurrent comment
on the communication predicaments in current philosophy
.....Tu Chenglin (44)
-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o Establish
a Category System Cui Yanqiang (48)
-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Its
Significances.....Lu Shaohua (53)
- A Summary of "The 1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Evolution and Self Organization" (59)
- History Is an Art, Too---A comment on one of Zhang Yinlin's
historical viewpointsLi Hongyan (61)
- "The Innovation toward the Origin" and "the Chinese System
in Western Application"---That the Neo-Confucianism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herits from but surpasses the
WesternizationistsZhou Chicheng (67)
- The Early Propagation of Marxism in Guangdong
.....Ta Qianhong (73)

- Brazing a New Trail in Exploration---A comment on Mr. Zhang
 Quancai's Works "A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through the Han Dynasty"Lu You (78)
- My Humble Opinion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Lin Zuoliang (81)
- An Outlin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Xiao Junhe (85)
- A Complication of Arguments on Professor Lu Yifan's "Outline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Essence for Further Ponderation"
 Lu Yifan, He Chuxiong, Deng Zhiyuan, Ke Hanlin,
 and Shen Jiaren (90)
- Arguments 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Historic Rom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Cai Jing kang (100)
- The Person Named "Lang Xian" and His Anecdote
 Yang Xiaodong (106)
- On the Forming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Wang Runhua (111)
- The Research Adjusting Its Visual Angle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round the World ---A summary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in Chinese" (116)
- Substantially Mak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Well as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s--- A ponderation over
 Dongguan's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city de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o Jinbai (119)
- Absorbing Capital Funds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Using
 Them for the Domestic Chinese
 Yang Yue and Li Hongsheng (122)
- The Practice of and a Ponderation over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an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Guangzhou Shitou Industry
 and Commerce General Company Ltd., Guangdong Shitou Cane
 Chemical Plant.....Luo Wenjin (125)
-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Relation Affai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An enlightenment from Guangzhou
 Baiyunshan General Factory of Medicine.....Yu Huazhan (127)
-

深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广东省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座谈会综述

7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部、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营销学会与本刊在广州联合召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座谈会。梁钊、杨开茂、曾牧野、张振宇、马恩成、王琢、宋子和、张井、郑林书、温力虎、王珺、李金亮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参会者联系广东实际，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入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现将会议发言综述如下：

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广东

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与会者的一个共识。学习《讲话》，参会者强调，在贯彻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必须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总结改革，深入探索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借助于先行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广东积极进取，放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大量引进外资外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繁荣，这曾一度使一些不明实情的同志产生广东是在背离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看法。参会者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事实表明，广东走的正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理由有三：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以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近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个体经济向公有制经济“复归现象”，说明公有制在焕发新的生机。二是在分配上，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并将按劳分配的劳动时间标准改为劳动效果标准。三是广东最早冲破旧体制框架，改变纵向集权过多的格局，在放活企业与市场的同时，强化宏观管理，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高速协调地前进。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广东的实践，是富有成效的。一些同志列举了如下数字：1979年—1990年，全省工业产值平均年递增16.7%，比改革开放前29年年均递增的12%高出4.7个百分点。现在一天的产值相当于1949年全年的产值。在全国经济滑坡的1990年，广东最先走出低谷，经济回升较快。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谬论的有力回击。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企业新体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首要的是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其它经济成分适当发展。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的必然推论，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客观规定。与会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归纳起来有四点：（1）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的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求，决定了我国不能搞“私有化”，而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2）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具有多层次特征，社会化程度不高，且各地各部门发展很不平衡，这又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3）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广东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既打破了单一公有制，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尤其是“三资”企业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据对199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统计分析，其中公有制工业产值占了78.7%，城乡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其它类型经济只分别占5.6%、4.4%和16.3%。（4）80年代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并跃居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有力地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这一条。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层组织，也是经济改革的落脚点，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基础在于放活和管好公有制企业。会上，一些同志对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新体制进行深入的讨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1）创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包括多种经济成分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企业新体制，按照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品格塑造企业，使企业逐步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自享效益、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新经营机制，是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广东大部分企业活力旺盛的关键在于，真正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政策上“放水养鱼”，把蛋糕做大；在市场上形成优胜劣汰的真正竞争机制。（2）鉴于现有企业的失误有企业自身决策水平低的原因，也有上级管理部门官僚主义的干预造成的事实，有的同志认为，深化企业经营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主要抓宏观方面问题，如发展规划、税收、文教卫生及公共交通设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不要错位；其次是把企业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学会竞争，让企业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提高承受能力与应变能力；第三是发挥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一大特色。（3）有的同志认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重要的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体系，使企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依靠科技、依靠市场营销、依靠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上。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走共同富裕之路

在分配问题上，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们在分配关系上，必须相应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2）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区

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资本主义从总体上说是按资分配的；社会主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8）实践证明，广东一些企业使工资、奖金和补贴捆在一起，与经济效益挂钩，实行“四高”（高贡献、高效益、高风险、高收入），推行岗位效益工资制等，是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形式。

经济发展中的先进与落后，先富与后富，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客观现象。如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着的地区贫富差距问题？会上，一些同志认为，广东党政部门在积极推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大干快上的同时，采取措施扶助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做法是较好地体现《讲话》中有关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精神的。（1）坚持以林为主，农、林、工并举的方针，采取“造（林）、封（山）、管（林）、节（柴）”一齐抓的办法，大搞造林种果绿化，改善生态环境；（2）实行减免贫困乡村的税收，鼓励和扶助发展小水电、采矿、交通运输等事业，适当增加对山区的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等特殊政策，开发山区资源；（3）实行贫富地区挂钩，以富帮贫；（4）省党政部门向贫困县派出工作组，挂钩包干扶贫，重在增加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造血功能”；（5）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抽调科研人员推荐给44个山区县担任科技副县长，把大批先进技术、良种、良法引进山区，以科技扶贫。事实证明，《讲话》中关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又提倡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四、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

会上，与会者就计划与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等进行了讨论，主要观点如下：（1）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表现了生产社会化、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统一。它的优越性在于，既保证资源合理配置，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又有利于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生产力发展。（2）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的一般规律，表现在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有计划与市场，而且只有计划与市场结合，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协调发展，否则就会失衡。计划与市场这对矛盾共存于商品经济内部，不论是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要按价值规律来调节，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基础在市场。（3）要深刻理解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这句话，必须懂得商品经济一般与特殊的原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社会性质无关，而与社会分工相联系；商品经济的特殊规律则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4）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在努力使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寓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性之中，在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一是在计划指导下放手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如通过把基础设施的某些要素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促进有投入有产出的市场机制形成。“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电养电”等，就是以这种机制为基础的。二是广东在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注意配套进行价格、计划、财政、信贷、税收等

改革，使国家管理部门真正同企业脱钩而把主要力量移到宏观管理和间接调控上来，建立经济预报预警系统和科学的以国家计划为依据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配套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保持社会总量平衡和比例协调。（4）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觉调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二是自觉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包括积累资金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成分和不同阶层的分配，确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五、坚持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专门就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农村的重要特色，是迄今为止我国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一条最好路子，是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应继续坚持的方向。理由是：（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统到分，摆脱了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束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放开农产品价格和流通渠道，大大地调动了农民搞活农村商品经济的积极性；（3）双层经营体制的推行，为农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有效经营提供了系统的社会化服务条件；（4）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30年来我们先城市工业化后农村城市化的老路，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工业化，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开辟了一条捷径。

六、扩大国际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课题。参会者辩证地分析了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搞外向型经济是广东的一大特色，但同时要敢于承认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客观上存在两重性，要看到积极因素是主流，消极因素是支流，但对支流问题也要认真研究，正确对待。对外开放的消极因素是带来外污，甚至会出现外污与内污的合流，我们的原则是排污不排外，内污外污一齐排。

鉴于广东近几年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但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的事实，与会者提出，必须根据自身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着的趋势与实际，及时调整方略，做出新动作。新的战略应是实行双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现代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成为出口的主要产业，向外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体论

高伟梧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弄清楚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体制改革也难以深入。不少文章提出要研讨两者能否兼容，有的还说只有认识两者存在的本质矛盾，才能找出解决矛盾并使之兼容的办法。事实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现实存在，就已表明两者的内在结合与兼容。所以，不仅要根据书本还要根据经验来解答和解决理论上实践上所提出的问题。

一

商品交换最初只是一种生活消费品互通有无的交往方式，尔后为交换而生产，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生产的方式。现代商品经济有别于小商品经济的地方在于为交换而生产的同时又为生产而交换。商品经济的关节点是商品交换，其实质是一种间接的社会劳动协作方式。有社会分工就必需有劳动协作，直接的活劳动协作要受时空限制，受限制条件也较多；物化的即以产品为形式的劳动协作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所有的劳动都直接物化在最终的总产品上，中间产品与劳务不独立计算劳动量。所以要排除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全社会直接生产与直接的社会分配，不光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问题，还必须是全社会直接劳动协作。这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全体社会成员觉悟极大地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极大地增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有可能。

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生产社会化有不同的程度，社会公有制也就有不同的水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一个样的观点是肤浅的，同是公有制也会有内在的、质的差别。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社会化未能达到全社会所有生产领域，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几个行业。就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由于生产水平、社会管理能力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的差异，也不可能是全国直接统一的一个层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存在着不同范围的不同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占有、支配、使用权的分割；也只能在大大小小相对独立的劳动联合体内实现直接的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协作，整个社会还得以间接的劳动协作为基础。至于我们这些从前仍苦于资本

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必须集中力量实现生产的和经济的现代化，也即要有一个实现社会生产和经济商品化的历史任务。总之，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需要，归根到底决定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商品经济，作为劳动协作的一种方式，作为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是商品经济一般。它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可以说就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组织与运行的方式。商品经济只有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相结合，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这时商品经济已不是一般而成为特殊了。诚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定生产力组织与运行方式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成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所以，我们要分清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资本渗透进以劳动者自己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实现社会生产资本化，改变了生产的社会性质，使之适应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要求，实现资本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内在具体结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殊。然而，这特殊的商品经济社会性质，并不改变商品经济一般的本质与规律性。马克思早就论证过：雇佣劳动并不决定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是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① 资本并不发明剩余劳动，而是占有劳动条件，从而占有产品，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产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消失了，作为这种商品特殊的经济形态不存在了，但并不否定作为商品一般的经济形式存在的可能性。现代商品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排除其内容即内在的社会经济属性，而且也扬弃了只适合旧内容的形式部分，并加以改造。总之，已经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商品经济已不是商品的一般，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规定与之结合的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并不否定商品经济一般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已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特殊也只是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有权的实现形式，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的占有权规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变，虽然是比小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变具有更大的质的飞跃，从以私有制为基础转变为公有制为基础，这实际也是否定之否定。商品作为原始共同体的产品开始而现又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联合体的产品复归，产生于公有制又消亡于公有制，这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社会客观规律的。

二

已经结合兼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互间是怎样的关系与状态呢？曾经有的同志以火车与轨道或者恩爱夫妻来比拟和形容，这可以形象地说明某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两者不具有独立性，更不是两个事物。作为商品经济与公有

制的一般，都是寓于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共同体之中。两者是社会经济内容与实现形式的关系，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制约是相互限制在各自本质与规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公有制作为内容从中规定着这个商品货币运动的社会性质，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商品经济作为经济的依存形体，也从形式上制约着经济内容，使特定的经济关系不得背离这种形式的一般规则。总之，这种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都是一个事物，一个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些概念的内涵是相同的，外延也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体，故称之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体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也就是劳动者私有经济，所有商品经济特殊都是一种社会经济的本体，也可以称之为商品经济本体论。

如此，公有制所规定的经济关系就体现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中，而不是在外。不只是联合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来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且联合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也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规定与实现。总之就是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这种商品经济不发展，社会主义就得不到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即是实现公有制所规定的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实现这种经济关系，商品经济不可能发展，如发展起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的同志认为发展商品经济仅仅是增加物质财富，仅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只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而不承认商品经济同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方式。这是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机械地分裂开来，把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机械地分裂开来。

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共同的主人，劳动者之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关系。显然，包括劳动者共同平等地占有劳动物质资料，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劳动地位以及以劳动为尺度平等地分配等，都在商品再生产中实现。我们的企业利润，不仅仅是我们资金积累的、按劳分配的乃至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下生产经营的成果，没有联合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没有社会主义资金的投入，没有生产与经营过程中有计划的民主集中的管理以及按劳分配，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社会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社会再生产的性质，我们的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来源也就规定着现实的分配关系，这就不只是“蛋糕”而且包含着切分“蛋糕”的原则：只能作为社会主义资金积累，只能按劳分配，只能用于社会主义事业。经济效益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经济效益，我们的企业要停产、倒闭，职工没有工资，在职待业或无职待业，就是生产关系的萎缩。只有不断增长经济效益，才可能不断增加资金积累，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与自己公有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实现在生产与经营过程从而分配上的劳动平等，成为真正的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的主人。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同时是生产关系生产的过程，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同样取决于商品生产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即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的繁荣发展。

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否结合与兼容，就不能只看一个方面。两者兼容的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就是能否在商品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中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商品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两者结合的基础与根本标准是社会生产力。我们党中央作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并按照它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进行体制改革之后，国有资产迅猛增加，国家、集体企业飞快发展，大量劳动者参加联合劳动，全体职工生活收入都大为提高并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同时相应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商品经济并不仅是处于内在结合的过程，事实上已经在本质上总体上兼容了。

三

要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纠正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改变旧的惯性思维。

1. 不能只承认“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承认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虽然事实早就证实“产品经济”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现代只能实现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然而一些同志心底里所持旧观点并未彻底转变过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如有的同志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的“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的“劳动”是直接社会一般劳动；又如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的公有制，当然就会把它看成与商品经济存在本质矛盾，两者不可兼容。这种观点，即使承认发展商品经济是必要的，也只是权宜之计暂时利用而已，必然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成一种组装体，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两个部件。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认为我国改革之前是“产品经济”乃有害的观点。我们过去是曾经极力排除商品货币关系，试图实现“产品经济”，但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保持着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而工业和城市则依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虽然是指令性的计划调拨，但一直计算着成本、利润、利息；货币、资金、贷款始终存在；职工领的是货币工资；市场、价格以及价值规律都或明或暗地起着作用，通货膨胀还不时困扰着我们，这不是商品经济吗？只不过变成了萎缩的与漫画化的形式，应该说以前的是被扭曲的变了形的商品经济。要是承认我们已经建立起“产品经济”的体制，就是承认政策可以造就一切，就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然性的结论。这也就使现在不少同志还有这样的错觉，以为我们

现在早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在是重新加入商品经济，增加一点活力。其实，我们自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恢复生产的第一天，就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公有制就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必定包含着实现形式在内。我们现在是恢复社会主义商品的发展，使它正常化，不是现在才把“产品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

为何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呢？我们的计划经济是经常出毛病的，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不都经过审批纳入计划的吗？但并不因之怀疑它不适合公有制而只是认为我们的计划体制不完善。为何对商品经济就不能这样看呢？归根到底就是认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现代生产力的水平，不可能实现“产品经济”，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唯一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符合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的原理，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事业，联合劳动者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自主劳动，共同富裕。“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②这正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 分清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先是承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殊，否定商品经济的一般，把所有商品经济都看成资本主义，或必然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现又只承认一般不承认特殊，把已经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仍看作未有结合的商品经济一般。商品经济是中性的，可以独立存在的，而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特殊性质，商品经济仅仅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道，这不符合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两个概念，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出的问题都算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帐上，不仅要看经济行为，还要深入看清楚行为的主体，谁是当事人。现在个别国营企业也有哄抬物价、转手暴利、以劣充优、伪造帐目、虚报成本、私分利润等行为，其实这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自身固有的。不少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不同经济成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

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分别开来非常重要。我们也必须把商品经济的本质、基本规律与其具体的运作分别开来。具体的经济体制不适应商品经济，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的根本制度与商品经济的不可兼容；同样某些商品经济的运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能因之而断定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本质上是矛盾的。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体，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社会经济还须通过等价交换来联系与协作，实现经济的组织与运行必然受着价值规律的制约，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必然具体表现为商品货币的形态等等，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联合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制度所不能接受的，当然在具体的运作上会有所不同。比如劳动者是主人自主劳动与劳动力作为商品性生产要素的流动要求是一致的，劳动合同制是可行的，但要是合同的内容以

及操作的办法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经理、厂长随便可以开除工人那就不合社会主义原则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现成的形式与经验，仿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作；必须通过实践筛选、改造、创造，使之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规范运作行为。

3. 不能只满足于抽象的判断而不进行具体矛盾分析。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一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特定的形式或内容结合起来的，不弄清楚公有制指的是什么公有制，商品经济是怎样的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准确判断两者的关系。资本主义小私有者的商品经济，当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矛盾的。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要具体分析，现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起步，许多经济关系还未表露出来，只根据书本或者现有的经验来推断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陷入空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内在矛盾，但并不就是一方代表公有制，一方代表商品经济。一类矛盾是现在公有制自身所有的，如群体与个体，部门、个人之间的矛盾。一类矛盾是现代商品经济所必有的，如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之间矛盾，价值与价格的矛盾，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少不了，这些都不能说那一方是社会主义的那方是商品经济的。贪污、贿赂、黄色的东西，自然经济社会也存在，走私、贩毒这些非法的经济行为，是商品经济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更不能扣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头上。总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统一的完整的事物，必须改变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两者分开考虑的思维习惯。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28页。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1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郑英隆

广义再生产论

冯光明

广义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与各种历史类型再生产的统一。本文拟从生产力的角度根据功能结构分析法考察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各种类型，由此考察社会再生产各种类型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和更替，考察广义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及其一般的实现条件。

从经常的联系和不断更新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生产力的劳动就是各种类型的物质资料再生产，不同类型生产力的劳动所需的条件也就是各种类型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条件。由于社会总产品既包含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用于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因此，我们的分析从各个阶段的社会总产品开始。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首先作以下几点必要的假定：（1）假定在各个发展阶段分别都仅仅存在某一种生产力类型的劳动。因而社会总劳动表现为某种生产力类型劳动的单纯倍加。（2）假定各个阶段之间的转变在一年内完成。在历史上，这种转变过程的完成，往往长达几十年，以至数百年的时间。但作为理论的抽象，我们让时间的坐标缩短或转变的进程加速，使它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3）假定生产周期为一年，生产资料都在一年内全部消耗掉，其社会必要劳动量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4）假定一切产品（或商品）都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交换，产品（或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或价值）也不发生任何变动。（5）没有对外贸易。

在社会必要劳动（或价值）方面，社会总产品等于包含新创造劳动在内的社会总劳动，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已消耗生产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C），简称补偿劳动；（2）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消费必要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V），简称必要劳动；（3）劳动者超出维持自身消费的必要劳动范围所进行的剩余劳动（M），即剩余劳动。作为理论上的推广，我们将价值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以适用于包括非商品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形态的考察。这样，当我们运用这一范畴分析非商品经济形态时，所表述的数字单位可以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商品经济形态时，也可以是价值所表现的价格及其货币单位。这一点，我们作为分析的前提肯定下来。

在实物结构方面，社会总产品从最终产品的角度进行分类，包括个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作为固定资产或劳动资料的产品，用于增加储备和后备的产品，以及净出口的产品。由于我们已经作了上述的第三点和第五点假定，作为储备后备和进出口的产品已

经被抽象，因此，我们主要集中研究作为消费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最终产品。首先，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假定消费资料不发生任何变化，即使它事实上是变化的。其次，由于社会总产品是从最终产品的角度进行分类的，作为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劳动对象可以相应地归类到作为最终产品的消费资料和劳动资料之中。再次，作为最终产品的劳动资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其中，生产设施包括土地、建筑物、道路、桥梁、仓库等。这样，在实物结构方面，从最终产品角度划分的社会总产品可以表示为：

$I(C+V+M)$ ——作为第一部类最终产品的劳动资料。它包括： $I_T(C+V+M)$ ——生产工具 $I_F(C+V+M)$ ——生产设施。其中，由于各个阶段生产工具执行着不同的生产功能，具有各异的实物结构和构成，因而可以将生产工具划分为结构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上述的功能结构分类相一致，从而使不同的生产部门结构与各个生产力类型的劳动相一致。

$II(C+V+M)$ ——作为第二部类最终产品的消费资料。它包括： $II_1(C+V+M)$ ——用作必要产品的消费资料。 $II_2(C+V+M)$ ——用于非生产领域消费的消费资料。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各种类型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过程及其实现条件。

我们假设，在社会必要劳动补偿方面，社会再生产类型(1)第一部类用于生产资料的补偿劳动为125C，必要劳动为192V，剩余劳动为64M；第二部类用于生产资料的补偿劳动为256C，必要劳动为500V，剩余劳动为125M。在实物替换方面，人们开始使用单一工具(st)从事采集(G)和抵御天敌的侵袭(R)。

$$I \quad 125C + (192V + 64M)_{R,G} = 381$$

$$I_F \quad 41C + (63V + 21M)_{R,G} = 125$$

$$I_{Tst} \quad 84C + (129V + 43M)_{R,G} = 256$$

$$II \quad 256C_{Tst,F} + 500V + 125M = 881$$

$$II_R \quad 74C_{Tst,F} + 145.5V + 36.5M = 256$$

$$II_G \quad 182C_{Tst,F} + 354.5V + 88.5M = 625$$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简单再生产类型(1)包括社会必要劳动补偿和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I_{Tst,F}(V+M)_j = II_j C_{Tst,F} \quad (j=R, G)$$

经过若干世代极其缓慢而漫长的摸索，随着原始人抵御天敌的活动发展为偶然的狩猎，随着采集范围的扩大，导致了采集物和猎获物的增加。我们假设社会再生产类型(1)在末期的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的：

$$I \quad 125C + 192V + 817M = 634$$

$$II \quad 256C + 500V + 378M = 1134$$

假定社会再生产类型(2)的积累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

$$g \quad I \quad 221M = I(125C + 96V)$$

$$g \text{ I } 228M = \text{ I } (128C + 100V)$$

在社会必要劳动构成方面，经过积累以后，社会再生产类型(2)的社会总产品可以表示为下列的图式：

$$\text{I } 250C + 288V + 96M = 634$$

$$\text{II } 384C + 600V + 150M = 1134$$

在实物结构方面，原始的单一工具发展为镶嵌工具(it)，原始人抵御天敌侵袭的活动，变为起初是偶然的狩猎，继而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经常的狩猎活动(H)。与此同时，原先的采集也发展为定期的收集(c1)。

于是，包含有社会必要劳动构成和实物结构两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2)全年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text{I } 250C + (288V + 96M)_{c1, H} = 634$$

$$\text{I}_F 98.5C + (113.5V + 38M)_{c1, H} = 250$$

$$\text{I}_{Tst} 151.5C + (174.5V + 58M)_{c1, H} = 384$$

$$\text{II } 384C + 600V + 150M = 1134$$

$$\text{II}_H 130C_{Tit} + 203V + 51M = 384$$

$$\text{II}_{c1} 254C_{Tit} + 397V + 99M = 750$$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社会再生产由类型(1)转变为类型(2)的社会必要劳动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text{I}_{Tit, F}(V + M)_j = \text{II}_j C_{Tst, F} + (\text{I} \Delta C + \text{II}_j \Delta C)'_{Tst, F} + (\text{I} \Delta C + \text{II}_j \Delta C)''_{Tst}$$

同时，也得到了简单再生产类型(2)包括社会必要劳动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text{I}_{Tit, F}(V + M)_j = \text{II}_j C_{Tit, F} \quad (j = C1, H)$$

诸如矛、弓箭等镶嵌工具的发明，以往处于偶然和孤立状态的狩猎发展为经常性的狩猎，采集变成了收集，随之引起狩猎区域和收集范围的扩大，以及猎获物和采集物的增加。于是，我们假设社会再生产类型(2)在后期的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的：

$$\text{I } 250C + 288V + 538M = 1076$$

$$\text{II } 384C + 600V + 492M = 1476$$

假定社会再生产类型(3)的积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g \text{ I } 899M = \text{I } (250C + 144V)$$

$$g \text{ II } 312M = \text{II } (192C + 120V)$$

经过积累以后，在社会必要劳动构成方面，社会再生产类型(3)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text{I } 500C + 432V + 144M = 1076$$

$$\text{II } 576C + 720V + 180M = 1476$$

在实物结构方面，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生活资料的生产已经由原来的收集狩猎发展为农耕(cu)畜牧(D)，人们使用的劳动资料已经由从前的镶嵌工具发展为复合工具(ct)和简单传动工具(tt)，诸如有孔石锄、钻杆和钻弓等。

这样，包含有价值构成和实物结构两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3)全年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由下列图式表示：

$$I \quad 500C + (432V + 144M)_{Cu,D} = 1076$$

$$I_{Tct} 125C + (107V + 36M)_{Cu,D} = 268$$

$$I_{Ttt} 143C + (124V + 41M)_{Cu,D} = 308$$

$$I_F \quad 232C + (201V + 67M)_{Cu,D} = 500$$

$$I \quad 576C_{T(ct,tt),F} + 720V + 184M = 1476$$

$$I_{Cu} \quad 450C_{T(ct,tt),F} + 562V + 140M = 1152$$

$$I_D \quad 126C_{T(ct,tt),F} + 158V + 40M = 324$$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社会再生产类型(2)转变为类型(3)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I_{Tct, Ttt, F}(V + M)_j = I_j C_{T(ct,tt), 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ct, 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tt}$$

同时，也得到了简单再生产类型(3)包括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I_{Tct, Ttt, F}(V + M)_j = I_j C_{T(ct,tt), F} \quad (j = Cu, D)$$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7页)并经过若干世代而极其缓慢地积累起来。我们假设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所组成：

$$I \quad 500C + 432V + 932M = 1864$$

$$I \quad 576C + 720V + 648M = 1944$$

假定再生产类型(4)的积累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

$$g \quad I \quad 716M = I(500C + 216V)$$

$$g \quad I \quad 432M = I(288C + 144V)$$

在价值构成方面，经过积累以后，社会再生产类型(4)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quad 1000C + 648V + 216M = 1864$$

$$I \quad 864C + 864V + 216M = 1944$$

在实物结构方面，发明、创造、经验和技巧经过若干世纪的艰难探索和缓慢的积累，人们发明了能够将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并将原动机与各种传动工具联结起来，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由原来的复合工具、简单传动工具和生产设施所组成的原始生产手段，发展为由复合工具、包括原动机(og)和各种传动工具所构成的传动机构(tm)、生产设施所构成的古典生产手段。

这样，包含有价值构成和实物结构两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4)的社会总产品，可

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 1000C + (648V)_1 + (216M)_2 = 1864$$

$$I_{T_{ct}} 248C + (162V)_1 + (54M)_2 = 464$$

$$I_{T_{tm}} 288C + (186V)_1 + (62M)_2 = 536$$

$$I_F 464C + (300V)_1 + (100M)_2 = 864$$

$$II \ 864C_{T(ct,tm),F} + 864V + 216M = 1944$$

$$II_1 672C_{T(ct,tm),F} + 672V + 168M = 1512$$

$$II_2 192C_{T(ct,tm),F} + 192V + 48M = 432$$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社会再生产由类型(3)转变为类型(4)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

$$I_{T_{ct}, T_{tm}, F}(V+M)_j = II_j C_{(ct,tm),F} \\ + (I \Delta C + II_j \Delta C)'_{T(ct,tm),F} + (I \Delta C + II_j \Delta C)''_{T_{tot}}$$

同时, 也得到了简单再生产类型(4)的实现条件:

$$I_{T_{ct}, T_{tm}, F}(V+M)_j = II_j C_{T(ct,tm),F}$$

社会剩余劳动经过若干世纪的积累, 发明、创造、经验和技巧经过若干世代的艰难探索。人们开始利用各种天然能源作为生产过程的动力。假设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I \ 1000C + 648V + 1646M = 3294$$

$$II \ 864C + 864V + 861M = 2599$$

假定再生产类型(5)的积累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

$$g \ I \ 1822M = I(1000C + 322V)$$

$$g \ II \ 604M = II(432C + 172V)$$

在价值构成方面, 经过积累以后, 社会再生产类型(5)的社会总产品, 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 2000C + 972V + 324M = 3296$$

$$II \ 1296C + 1036V + 257M = 2589$$

在实物结构方面, 经过技术变革, 劳动资料由原来的复合工具、传动机构和生产设施所组合的古典生产手段, 发展为由复合工具(ct)、传动机构(tm)、天然能源(ne)和生产设施所组成的传统生产手段。

这样, 包含有价值构成和实物结构两个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5)的社会总产品, 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 2000C + (972V)_1 + (324M)_2 = 3296$$

$$I_{T_{ct}} 289C + (140V)_1 + (48M)_2 = 477$$

$$I_{T_{tm}} 448C + (217V)_1 + (72M)_2 = 737$$

$$I_{T_{ne}} 477C + (232V)_1 + (77M)_2 = 786$$

$$I_F 786C + (383V)_1 + (127M)_2 = 1296$$

$$I 1296C_{T(ct,tm,ne),F} + 1036V + 257M = 2589$$

$$I_1 1006C_{T(ct,tm,ne),F} + 803V + 199M = 2008$$

$$I_2 290C_{T(ct,tm,ne),F} + 233V + 58M = 581$$

由此，可以得出社会再生产由类型(4)转变为类型(5)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ct,Ttm,Tne,F}(V+M)_j = I_j C_{T(ct,tm),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ct,tm),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ne}$$

同时，也得出简单再生产类型(5)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ct,Ttm,Tne,F}(V+M)_j = I_j C_{T(ct,tm,ne),F} \quad (j=1,2)$$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剥夺农民土地，对外掠夺和殖民扩张，通过国债、税收、保护关税制度而对内掠夺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假设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I 2000C + 972V + 297M = 5944$$

$$I 1296C + 1036V + 1167M = 3499$$

假定再生产类型(6)的积累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

$$g I 2486M = I (2000C + 486V)$$

$$g I 856M = I (648C + 208V)$$

在价值构成方面，经过积累以后，社会再生产类型(6)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4000C + 1458V + 486M = 5944$$

$$I 1944C + 1244V + 311M = 3499$$

在实物结构方面，经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由原来的复合工具、传动机构、天然能源和生产设施所组成的传统生产手段，发展为由工作机构(wm)、传动机构(tm)、动力机构(mm)和生产设施所构成的近代机器生产体系。

于是，包含有价值构成和实物结构两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6)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4000C + (1458V)_1 + (486M)_2 = 5944$$

$$I_{Twm} 1220C + (444V)_1 + (148M)_2 = 1812$$

$$I_{Ttm} 592C + (216V)_1 + (72M)_2 = 880$$

$$I_{Tmm} 880C + (321V)_1 + (107M)_2 = 1308$$

$$I_F 1308C + (477V)_1 + (159M)_2 = 1944$$

$$I 1944C_{T(wm,tm,mm),F} + 1244V + 311M = 3499$$

$$I_1 1501C_{T(wm,tm,mm),F} + 961V + 240M = 2702$$

$$I_2 443C_{T(wm,tm,mm),F} + 283V + 71M = 797$$

由此，可以得出社会再生产由类型（5）转变为类型（6）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wm,Ttm,Tmm,F}(V+M)_j = I_j C_{T(ct,tm,ne),F} + (I\Delta C + I_j\Delta C)'_{T(ct,tm,ne),F} + (I\Delta C + I_j\Delta C)''_{Twm}$$

同时，还得出简单再生产类型（6）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wm,Ttm,Tmm,F}(V+M)_j = I_j C_{T(wm,tm,mm),F} \quad (j=1,2)$$

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股份公司广泛发展，生产的迅速集中和垄断资本的形成，使社会生产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的手中。我们假设社会总产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I 4000C + 1458V + 5458M = 10916$$

$$I 1944C + 1244V + 1598M = 4781$$

假定社会再生产类型（7）的积累按照下列方式进行：

$$g I 4729M = I (4000C + 729V)$$

$$g I 1220M = I (972C + 248V)$$

在价值构成方面，经过积累以后，社会再生产类型（7）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由下列图式表示：

$$I 8000C + 2187V + 729M = 8916$$

$$I 2916C + 1492V + 373M = 4781$$

在实物结构方面，经过现代科技革命，人们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由原来的工作机构、传动机构、动力机构和生产设施所组成的近代机器生产体系，发展为由控制机构(cm)、工作机构、传动机构、动力机构和生产设施所构成的现代信息自动化生产体系。

于是，包含有价值构成和实物结构两方面的社会再生产类型（7）的社会总产品，可以用下列图式表示：

$$I 8000C + (2187V)_1 + (729M)_2 = 10916$$

$$I_{Tcm} 2309C + (630V)_1 + (211M)_2 = 3150$$

$$I_{Twm} 841C + (230V)_1 + (77M)_2 = 1148$$

$$I_{Ttm} 1148C + (314V)_1 + (104M)_2 = 1566$$

$$I_{Tmm} 1566C + (428V)_1 + (142M)_2 = 2136$$

$$I_F 2136C + (585V)_1 + (195M)_2 = 2916$$

$$I 2916C_{T(cm,wm,tm,mm),F} + 1492V + 373M = 4781$$

$$I_1 2244C_{T(cm,wm,tm,mm),F} + 1148V + 287M = 3679$$

$$I_2 672C_{T(cm,wm,tm,mm),F} + 344V + 86M = 1102$$

由此，我们得到社会再生产由类型（6）转变为类型（7）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

两方 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_{cm}, T_{wm}, T_{tm}, T_{mm}, F}(V + M)_j = I_j C_{T(wm, tm, mm), 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wm, tm, mm), F}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T_{cm}}$$

同时，还得出简单再生产类型(7)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实现条件，即：

$$I_{T_{cm}, T_{wm}, T_{tm}, T_{mm}, F}(V + M)_j = I_j C_{T(cm, wm, tm, mm), F} \quad (j = 1, 2)$$

比较研究表明，各个类型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社会必要劳动补偿而言，要求第一部类生产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的必要劳动加剩余劳动之和 $I(V + M)$ ，必须等于第二部类所消耗生产资料的补偿劳动 $I C$ 。就实物替换而言，要求第一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结构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结构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结构与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结构之间，必须统一于一定类型生产力的基础上。

由此，可以得出各个类型简单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补偿和实物替换两方面统一的一般实现条件，即：

$$I_{FO, F}(V + M)_j = I_j C_{FO, F} \quad (j = 1, 2 \dots OrG, H \dots)$$

其中：FO, F表示现存的劳动资料。

各个类型简单再生产的一般实现条件也可以表达为如下两个公式：

$$I_{FO, F}(C + V + M) = (I C + I_j C)_{FO, F} \quad (j = 1, 2)$$

$$I_j(C + V + M) = I_{FO, F}(V + M)_j + I(V + M)_j$$

上述两个公式表明，为了进行一定类型的简单再生产，不仅社会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总量，必须刚好满足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需要，而且社会生产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必须统一于一定类型生产力的基础之上。

比较研究表明，社会再生产各个类型之间转变的实现条件，包括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个方面，在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补偿方面，要求第一部类生产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的必要劳动加剩余价值之和 $I(V + M)$ ，必须等于第二部类所消耗生产资料的补偿劳动 $I C$ 加上两大部类追加生产资料的补偿劳动 $I \Delta C + I_j \Delta C$ 之和。

在实物补偿方面，第一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结构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结构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结构与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结构之间，必须统一于各个类型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和发展。由于我们已经假设，各个阶段只存在一种类型的生产力，因此，各个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就是各个类型生产力的倍加和总和。社会总产品是从产品方面表现的社会总劳动。不同类型的社会总产品，实际上是已经物化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总劳动。也就是不同类型社会生产力的劳动物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社会总产品在各个类型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的实物补偿，归结为各种类型生产力的劳动之间的发展和更替。

从社会必要劳动补偿与实物替换两个方面的统一来看， $I(V + M)$ 总是可以分为两

个部分。一部分与 $I C$ 相等，用于替换已经消费的生产资料，其实物内容是作为不同类型社会再生产之间转变前提的现存生产资料。由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从作为最终产品的劳动资料来划分的，而劳动对象则作为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被归到相应的最终产品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作为转变前提的现存生产资料从已存的各个类型的劳动资料进行概括和表述。因为任何劳动资料都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所组成的，而生产工具在本质上是物质属性劳动功能化的结果。所以，现存的劳动资料可以表述为现存的生产工具 F_0 和生产设施 F 。另一部分与 $I \Delta C + I_1 \Delta C$ 相等，按其实物内容又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其一，相当于 $(I \Delta C + I_1 \Delta C)''$ 的部分是不同阶段社会总产品中的新质，本质上是劳动功能从人向生产工具新转移的凝结物。是人的劳动功能物质对象化的新产物，可以用 $N T$ 表示。其二，与 $(I \Delta C + I_1 \Delta C)'$ 相当的部分，是适应于劳动资料结构中新质的发生和发展，而导致原有生产部门的相关发展所必需相应补充的生产资料。

由此，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类型及其转变过程的一般实现条件，可以表述为如下的公式：

$$I_{F_0, N T, F}(V+M)_j = I_j C_{F_0, F} + (I \Delta C + I_1 \Delta C)'_{F_0, F} + (I \Delta C + I_1 \Delta C)''_{N T} \\ (j=1, 2)$$

这一公式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要求社会必须按照动态的结构和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首先，它表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这种比例关系，是指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经济联系的数量对比关系，是数量上的规定性，它反映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总量状态。这种数量对比关系是以一定的质的规定性为前提。其次，它还表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结构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结构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结构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结构之间，必须在一定类型生产力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因此，两大部类产品的数量比例关系和总量状态，是在体现一定类型生产力的社会总产品结构中实现的。再次，两大部类生产的不同结构、比例和总量平衡关系，是在各个类型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中实现的。既没有一成不变的结构，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比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两大部类生产的结构、比例和总量的变化，通过同社会需求的结构、比例和总量的反复平衡而不断在更高类型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

这一公式还表明，不同类型社会再生产的更替，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扩大再生产。在公式中， $I(V+M)$ 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与 $I C$ 相等，其它两部分 $(I \Delta C + I_1 \Delta C)'$ 和 $(I \Delta C + I_1 \Delta C)''$ 与两大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 $(I \Delta C + I_1 \Delta C)$ 相等。与 $I C$ 相等的部分，是满足原有生产部门实现简单再生产的需要，用于补偿已经消费的生产资料，其实物结构为 F_0, F 。但是，不同类型社会再生产之间更替的特征在于，它要求第一部类提供追加的生产资料，其实物结构必须具有新质的劳动资料 $N T$ 及其相关发展所需相应补充

的生产资料，并且在数量上必须和两大部类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相等。因此，在不同类型社会再生产的更替中，原有生产部门FO，F总是实现转变的前提和基础，新兴生产部门NT的建立和发展是实现转变的充要条件，而相关生产部门的相应发展则是实现转变的必要条件。

社会再生产各个类型及其转变过程的一般实现条件，还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公式：

$$I_{FO,NT,F}(C+V+M) = (I_C + I_j C)_{FO,F} \\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FO,F} \\ + (I \Delta C + I_j \Delta C)''_{NT}$$

$$I_j(C+V+M) = I_{FO,NT,F} \left(V + \Delta V + \frac{M}{X} \right)_j \\ + I \left(V + \Delta V + \frac{M}{X} \right)_j$$

它们表明，实现各种类型社会再生产的转变，不仅要求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已经包含具有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的供给总量，必须与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需求总量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而且社会生产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必须统一于各种类型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和更替。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90年代深圳特区对外 经济发展策略

林 江

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回顾

建立深圳特区的最先构想，是在1979年筹建出口加工区，这显然是参考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的发展而作出的决定。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更作出决定将深圳发展成为兼营工业、农业、科技、旅游、商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其开放程度远远超乎原先的构想。特区创办初期，主要的对外经济活动仍局限于“三来一补”业务。嗣后，随着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其他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在笔者看来，真正标志着深圳特区走向成熟的是两个方面：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外引内联向高层次发展。

1. 深圳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形成。深圳特区建设初期，主要偏重于饮食、旅游业等第三产业。1986年以来，深圳特区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特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制订了“立足深圳，加强联合，面向海外，扩大出口”的方针，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和经营思想、方式、策略的转变。深圳特区帮助企业从主要收购内地产品出口转变为自办实业生产出口；从来料加工装配逐步转向“外接单、内生产”和到内地办出口生产基地；从间接远洋贸易向直接远洋贸易转变，形成了进料——加工——增殖——出口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

2. 深圳经济特区外引内联向高层次发展。深圳特区作为处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结合部，以及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要把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资金吸收进来，在壮大自己的同时，辐射至内地；另一方面又要以内地为依托，利用内地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增强特区的经济力量，提高对外商的吸引力。外引内联的结合，不仅是发挥“窗口”和“基地”作用的重要条件，而且是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深圳特区近年来外引内联正向高层次发展。

深圳特区1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了以下事实：

(1) 特区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中央实行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的正确决策，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特区人民的艰苦奋斗的必然结果。同时，还应该强调的是，这与它在过去10年的体制创新历程中，始终紧扣“建立市场调节为主体的运行机制”的主题是分不

开的。

目前深圳特区已初步形成或正在形成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证券市场和信息市场；同时，与市场调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体系也正逐步确立；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企业，进行了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利税分流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特区还为股份制改革相应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开辟了比较规范的股票市场。

由此可见，90年代特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应继续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2)香港作为一个多功能的国际城市，无论在资金、技术、管理、贸易、市场等方面，对深圳特区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资金方面，目前港资已占深圳特区引进外资总额的80%，而且，深圳从外国引进的资金，相当部份也由香港在其中起搭桥牵线作用；在技术和设备方面，深圳特区近几年来引进的技术设备中，香港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位；在管理经验方面，深圳的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已经直接采用香港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在贸易方面，香港在深圳的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已成为深圳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另外，深圳开拓远洋贸易，许多方面已得到了香港的配合和帮助。

二、90年代经济环境的变动及其对深圳特区的影响

如果说，80年代是深圳经济特区奠定基础、实现经济起飞并进入外向型经济轨道的时代，那么，90年代将是深圳特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外向型经济体系日渐成熟、趋于完善的时代。

步入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与1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特区如何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寻求新的发展策略，把特区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1. 国际经济因素

9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可能会产生新的组合，出现排他性的区域经济集团，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但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对深圳特区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下面重点探讨一下亚太区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以及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影响。

亚太经济目前出现两个倾向，都给深圳经济特区提供机遇和挑战。第一个倾向是亚太经济处于分化，南朝鲜紧逼日本，与日本争夺美国市场。台湾经济走下坡路，投资环境恶化，资本外流，中小型企业纷纷前往内地投资，台湾当局趋向于采取积极开拓东欧和苏联市场的策略；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加强与内地结合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香港作为内地贸易的转口基地，将内地每年250亿美元的对港出口的95%转口至第三国，珠江三角洲及经济特区中有15000个企业约200万名工人成为香港商品来源的重要生力军。

亚太区的经济分化一方面显示中国在亚太区经济中的影响力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依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亚太区经济的另一个倾向表现在区域的次级组合，出

现了几个小经济三角：第一组是日本、泰国、印尼“投资三角”。日本的西太平洋经济圈以泰国和印尼作为两条腿，使之成为日本跨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基地。日本在印尼投资了98亿美元，泰国20亿美元，占其亚洲投资75%。第二组是南朝鲜、北朝鲜加上中国山东半岛的“朝鲜海三角”。南朝鲜以跨国大型企业为主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全国十大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二。工业以钢铁、造船、汽车、机械、电子为主干。南朝鲜竭力推进与中国的贸易，这个三角以政治加贸易为动机。第三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成长三角”。三国已谈判设立经济管理的统一标准、统一的海关手续，拟设立4万人的工业园以及类似加勒比海的旅游金三角。这个三角的背景是新加坡缺乏劳动力、水和土地资源，希望这个三角为之提供发展空间。第四组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中国三角”。港台经济和中国内地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这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十分迫切的课题——中国内地如何在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上以经济特区为基地促进与香港、台湾的经济合作。

世界经济形势变动特别是亚太区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对深圳特区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在引进外资方面，由于亚太经济处于分化，台湾投资环境恶化，中小型企业纷纷前往内地投资，日本的日元升值后为适应扩大内需而调整产业结构，南朝鲜与中国内地民间经济往来的开放等等，均为深圳特区增加了引进外资的机会。

(2) 在贸易方面，日本经济将向以内需为主转变，增加进口，得益最多的将是亚洲“四小龙”。波斯湾战争之后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重建以及中东新经济秩序的建立，将会扩大国际市场需求量。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香港劳工短缺，带动了生产成本上升，将会令香港把更多的生产线迁移至内地（包括深圳）生产。这会给深圳带来增加贸易量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90年代世界上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参与争取外资的竞争，台湾、南朝鲜等地区产业升级的逐步实现，都给90年代深圳特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深圳特区应该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比较优势。

2. 国内经济因素

深圳经济特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90年代中央给予特区的灵活政策会否改变对深圳特区未来的发展路向影响深远。

笔者认为，首先，10年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证明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证明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市场机制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不存在改变特区政策的问题。引起各方面关注的是特区增加了一些财政上交的任务。最初几年，特区主要是投入，目前财政收入有了大量增加，稍许增加上缴，为国家财政多作点贡献，这也是合理的和正常的。财政上缴的数目增加很少，不会影响特区自身的建设，也不会引起税负的增加。因此，对投资者而言，深圳特区的大门继续敞开着。

其次，中央在经济领域实施的治理整顿措施对深圳特区既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最明显的有几点：

(1) 平抑了物价。深圳特区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通过“引导消费”的方式，如实行住房商品化，扩大股票发行面等形式把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变为生产投资，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物价的上升幅度；

(2) 整顿了特区的市场秩序，建立、健全了一批管理法规，加强了廉政建设，取消了一大批效益不高和官商不分的行政性公司；

(3) 趁势调整了深圳特区的产业结构，抑制了部分非生产部门的增长，增加了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投入。

以上几个方面，对投资者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平抑物价和整顿市场秩序，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措施，对吸引外资是有力的促进。

当然，治理整顿对深圳特区也有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人民币资金短缺，影响交易；管理权限有所集中，一些办法行不通了，新办法又没有及时制订出来，欠缺灵活性，办事效率未能尽如人意等等。

笔者认为，90年代深圳特区在制订发展战略时，应继续在“特”字上作文章。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与内地一样，深圳特区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针，但市场调节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方式可以更灵活一些。在这样的方针下，如何恰如其份地实现计划指导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深圳特区经济是以外向型为主的商品经济，它并不要求特区内的产供销平衡，故特区计划机构（如深圳市计划局）实行综合平衡的目标应是基础设施服务与经济发展是否相适应方面，以及对新建大型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审批。至于经济的日常运作则主要依靠特区各企业自主进行；

(2) 特区虽然面向国际市场，但由于特区与内地均属商品经济，互相之间如何加强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有人认为，深圳特区创办初期从事了一些转口贸易和替代进口商品销往内地，是特区赚了内地人的钱，今后要在少牵动内地的条件下发展特区经济，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深圳特区毗邻港澳，随着交通、资讯及金融业的发展，将更有利地发挥中国对外经济的桥梁作用，转口贸易将会增加，这对深圳特区和内地而言都是有好处的。事实上，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不意味着可以与内地隔绝，相反，这正需要内地更积极的介入，更需要内地资源的投入作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后盾。显而易见，如果深圳特区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隔绝，那只能成为“孤岛”。没有经济腹地、就失去了经济依托。诚然，如何协调特区与内地，特别是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关系，的确是值得我们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3) 特区从投入到开始产出，逐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如何处理特区与中央及省的有关部门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如果多个部门都把手伸向特区，可能会对特区的积极性造成消极的影响。比较可取的办法是“总

体承包，个别协议”解决问题。例如，在财政、外汇上交任务方面，宜一揽子承包，对于供水、供电、原材料、进出口等方面的问题，可由特区与中央及省的有关部门订立中长期协议，按协议执行，由特区管理，而不应采取归口管理、按件审批的做法。

三、90年代深圳特区对外经济发展策略构想

深圳经济特区要完成90年代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必须是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深圳建成国际化的经济特区。

深圳特区地处亚太区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经济联结亚太经济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基地。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分工合作，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过程日益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过程中，经济特区有条件先走一步，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率先实现经济国际化。国际化的具体内容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行情组织安排生产，按国际经济规律来协调社会再生产活动，促进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与此同时，按照国际化城市的标准来建设特区，建立和健全现代港口城市的多项功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的各种服务，从而使深圳特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城市功能逐步国际化。

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策略，90年代深圳特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与结构水平的外向性。

深圳特区应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一个长远规划目标，在步骤上可先考虑把目前特区占主要比重的轻工、电子、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支柱产业部门的工业技术水平得到改造提高，形成规模经济，扩大出口，然后利用不断累积的出口收汇有重点地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提高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商品化的能力，争取在2000年前后使部分高新科技工业成为特区的主导产业，从而实现特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需求结构特别是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特区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必须与市场诱导的机制相结合。同时，在特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把产业组织的改造列入重大议事日程。

2. 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的深港经济关系。

深圳特区毗邻港澳，而90年代港澳又面临着主权回归的新情况，因此在制订对外开放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与港澳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建议设立“两制一体”的深港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两制”就是一国两制，“一体”就是要实现经济开放模式、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体化，最终形成深港经济技术合作区。具体内容是：（1）深港经济开放模式一体化，把深圳特区建设成一个具有“香港功能”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为此必须开放“一线”，管好“二线”。要按部就班地开放“一线”，第一步只允许生产资料免税进入特区，消费品不能免税进入；第二步允许消费品免税进入特区，这样可减轻“二线”防止走私漏税的压力。（2）深港经济运行模式一体化。这里主要是指两地企业经营活动一体化。因此，应全面放开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对企业产、供、销全面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对深圳特区的存量资产允许流动、转移、重新组合；对增量资产要实行内资与

外资分开管理的政策。(3)发展模式一体化。这是指深港各自发挥优势,互补劣势。其中心环节是产业结构一体化,换言之,把深港两地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使深港经济协调发展。

3. 建立和健全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新经济体制。

深圳特区要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90年代更上一层楼,保持深圳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最高层次,成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结合部,就必须实行特区市场国际化,特区企业须按照国际惯例生产经营,实行公平竞争。为此,特区要做好两方面工作:在宏观上,要建立和完善深圳特区的宏观间接调控机制,完善特区的市场体系;在微观上,要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行股份制,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生产经营者。要做好以上工作,当前重要的问题是落实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力争中央赋予深圳特区在生产发展、投资项目与规模、生产力布局、税率、税网、进出口贸易、金融、物价、外汇管理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使特区的特殊政策名符其实,这一方面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特区经济运作的不必要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可减少经济特区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真正形成按国际惯例办事的经济运行机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上接第47页)

的发展一样,也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是人类自由度增强的表现。人本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在交往过程中不断表现自己,发展自己,增强自己的活力。如果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成长、壮大,是以世界性的交往如开辟新大陆、拓展世界市场为前提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样也必须在交往中体现出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脱离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不可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交往的世界性的普遍发展视为达到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之一。他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⑩这足以表明,在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注意一下它们在交往问题的各种观点及其优劣是非,无疑是有益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①⑥⑦ 胡塞尔:《巴黎演讲》第36页,第90页,第35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81页,第91页。

④ 胡塞尔:《理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第420页。

⑤⑧⑨⑩ 胡塞尔:《笛卡尔沉思》第90页,第107页,第107、108页,第108页。

⑪ 参见《英国现象学会会刊》1976年1月号B·道恩豪尔的文章。

⑫ 穆尼埃:《存在主义哲学家》,1949年英文版第72页。

⑬ 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萨特》,第173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
责任编辑:冯生

在软中变革的世界经济

——兼谈格局、软竞争和人的因素

贾大武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以80年代末雅尔塔体系瓦解为标志，世界处在不同于以往的动荡、分化、改组之中。今后的国际经济关系交往将是综合国力较量的展开和深入。其总的特征是在软中变革，具体体现为：从硬性的对抗到软性的发展，从物质的竞争转向服务的竞争，从有形形态的争夺趋于无形形态（如风险、机遇、速度、质量、影响度）的争夺，从开发自然资源向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智力转移。开展这个变革时期的经济特点研究是世界经济理论的重大课题，将会产生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突出特征是：从硬性的政治对峙和军事扩展改变为软性的局势缓和与经济、科技发展。这一点，随着美苏之间军备控制谈判的发展，特别是中导条约的签订而明显体现出来。出现和形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中各种软因素软成分迅速增长，形成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运动，引起了由量到质的改变。

就世界范围而言，软因素的增长和运动还处在发展中。这些软因素主要有：

1. 战略主导性因素发生变化。战后40年的美苏军事对峙说明，单纯军事力量既不能达到政治目的也不能保持持续能力，反而导致经济失调。经济和科技越来越成为高政治问题，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的能力，各国都已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本国经济和科技发展上，高技术产业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美国制定了“高边疆”和“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确立了“科技立国”的治国路线；西欧提出和实施“尤里卡计划”；苏联制定出加速发展战略；印度、南朝鲜、新加坡也制定了发展新技术工业的计划。由于战略主导性因素的变化，美苏两国将会减少对地区冲突的介入，局部战争的热点也将减少，战争呈现减少、缩小和降级的趋势。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80年代战争热点已从38个减到28个，预计90年代还将进一步减少。1989年世界军备开支实际减少了2%，减至约9500亿美元。在1990—1997年间，美国军费开支计划减少1800亿美元。日本在

1991—1995年期间，防卫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以下的水平。战略主导性因素关系全球大局及其大战略的形成，我们必须尽全力予以关注和把握，否则会出现预期不足而处于被动。

2. 潜在性因素：速度及其相应的影响度显得越来越重要。从速度角度分析，世界可分成快与慢两个部分。①沙尔文·托夫勒认为，快与慢不只是个隐喻的问题。各国的整个经济要么快，要么慢。原始生物所具有的是慢神经系统，比较发达的人的神经系统对信号的处理要快一些，原始的和先进的经济也是这种情况。在快速经济中，先进技术加快着生产速度。但这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决定这些经济发展速度的有：办事的速度、作决定(特别是有关投资的决定)所需要的时间，在实验室中研究出新方法的速度，把这些新方法运用于市场的速度，资本流动的速度，信息和知识在经济体系中传输的速度。快速经济产生财富以及权力的速度快于慢速经济。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次历史性骤变加快了经济上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并为今天的超快速符号化经济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种加速效应使节省下来的每个单位时间都比上个单位时间更加宝贵，从而能造成一个积极的反馈环，使加速的过程更快。反过来，这一过程产生的后果将不仅是演进性的，而且是革命性的。时间变得越宝贵，象原料和劳动力这样的传统生产因素就会变得越不宝贵。②据此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的成功和欲展政治大国雄姿，原联邦德国的强盛和快速完成统一，亚洲“四小龙”及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各种经济圈的出现，多极化的兴起和两极的终结，最终都决定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今后随着速度的快慢，将会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由美、日、西欧三极再形成多个经济集团纷争。

3. 方法性因素：调整国际关系的手段趋于综合性多角化和国际性高级化。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和服务化，使地球变为“全球村”，各种联系更加紧密而复杂，已由一元对一元的阵营关系变为一元对多元和多元对一元的多角关系，解决问题需要从全球范围来考虑，并不断采用新的方法，方法性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格局的调整和转换。综合性多角化要求看问题要全面分析多种因素，如日益重视的综合国力问题就是一国基于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实力；还要求研究问题要多学科进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已出现很多新观念，如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区域研究、系统论、动机—行为理论、冲突理论、决策理论、竞赛理论(博弈论)等等，知识的规范性和精确性比以往都有了新的提高。国际性高级化是在国际关系中由于超国家力量的作用增强而出现的超国家的政府间、经济集团间、国际经济管理和协调体制以及其管理规则和方法的发展趋势。例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增强；西方7国的政策协调将从宏观经济领域发展到经济结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加强对外经济政策协调；跨国公司的合并与扩大及其业务联系更加紧密，经营方式走向多种形式的国际联合并向全球公司发展；各国采取提高双边贸易关税，制定种种限制措施，强行倾销各种工业产品等手段展开多方面竞争。当今经济竞争方式向全

方位和高级化展开。

以上是管见中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的几种软因素，但并不排斥其它的制约因素。又因为，软因素是种活动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固定地看待。

二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知识、智能对经济服务的程度和质量的竞争，这种服务的含量越高，经济的软化程度就越高。就这个意义讲，经济竞争就是在软的方面竞争。比如，一件新产品的诞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量，而且需要科技的研究开发来服务；某个企业参与当代经营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规模，还要具备应有的功能、正确的发展战略、决策、管理艺术和未来的形象。

软的方面竞争，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中发生，并引起了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1.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兴起和发展，使科学技术成族成群地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成为高科技新兴产业。2. 新兴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渗透力加剧，引起了产业间“互相渗透的革命”，产业结构趋于高度化、服务经济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产业向中度、高度软化产业发展。3. 物质产品特点由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4. 服务经济由为企业服务展开，扩大到为个人生活服务，为个人娱乐服务，为公共事业服务。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带动服务结构的变化，谋生型服务得到改造，新型服务业不断诞生，服务正走向全面化、社会化。

随着世界经济日益服务化、信息化、国际化、全球化，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不仅和商品贸易基本相一致，而且自70年代中期起，就已经超过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速度。根据国际决算银行的统计，198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为17308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3631亿美元，服务贸易规模已达商品贸易规模1/5以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0年11月28日提出的报告显示，整个80年代以美元计算的世界贸易额增长了75%，服务贸易增长又快于商品贸易增长而于1989年达6800亿美元，已接近总贸易额的1/4。

服务贸易中发展较快的技术贸易，其年平均增长率在1964—1970年就达16.5%，超过商品贸易10.5%的增长速度。目前全世界共有先进技术和专利3000多万项，每年递增100多万项，贸易额每10年翻两番，已逾千亿美元。其中软件技术贸易不断加强。技术贸易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影响着其他国家。

与我国的经济水平相联系，我国处于技术贸易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发展，已经和还在不断影响着我国的服务业的发展。如我国的信息业、咨询业、旅游业、第三产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单说我国的咨询业，从1980年上海、北京首先出现咨询单位开始，到1990年上半年止，全国已有各类咨询机构1000余家，专职咨询人员达7万人，业余咨询人员有几十万人，咨询范围有经济、科技、外贸、工程、法律和社会诸方面。但我国咨询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主要局限表现在咨询内容、咨

询范围和体制等方面，主要问题表现为手段落后、经营粗放、独立性差、政策法律不完善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今后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咨询业，其发展趋势必然走向服务社会化。^③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新技术的运用，经济的软化正在促进市场、生产、资源的全球性重组，软竞争已为大势之所趋。对于企业来说，软的开发和开拓是最有价值的一种活动。企业不失时机参与软竞争是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一个好办法。

三

对从世界格局由硬性对抗转为软性发展与经济竞争在软的方面展开的特点作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世界经济变革的第三个特点：经济、科技的不断进步，要靠以软取胜，要靠人才，而人才又是最终决定因素。

过去的科学技术当然也是以人为前提的。但是，它的着眼点是机器和人的关系。经过60年代的实践以后，人们所注意的是人、机之间相互的协调作用；而在现代与未来之间的，作为现在社会所利用的技术目标是实现以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为基础的社会。^④这说明，现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已经由物的开发转向人本身的开发上。

已经发生的变革证明，一切变化都依人的智慧而变化，人们对待战争与和平、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选择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审慎和理智。为此世人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据有关专家估计，到80年代中期，全世界大约有2600个反战组织跨越国界进行活动，其中科学家们的种种研究对人类贡献是巨大的。1983年10月美国几位科学家组成的TTAPS研究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核战争后的世界问题讨论会上正式宣布了核冬天理论，对世界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地缘经济学正在取代地缘政治学，对经济因素的看法已经重于军事因素，给新的国家安全观念赋予新的内涵。这些当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已经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基础和前提。

于是，各国都力争在智慧的基础上，确立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重点，但不外乎经济、科技和人才。很多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协调，世界范围的对人才的争夺战，都集中在这三个范围。分析这些发展战略和实施重点，其共同之处，都是要以软方法达到硬目标，可以共称为以软取胜的战略。

借鉴各国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选择的重点，以分析其共同点、差异和真正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各国共同争夺的重点也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以软取胜的战略，也可说是当代国家战略的一个特征，我们同样不能放弃。

以软取胜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以智力取胜为主的战略。以软取胜归根结底要靠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以开发人的智力来提高人才素质。已故意大利未来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认为，发展不仅要依靠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而且取决于亿万人民的素质，实现人

的现代化。引用这个观点，笔者还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当今世界要重视培养符合软科学发展时代的人才群。这个人才群宜以软专家为核心，又有多层次的软人才组成。

符合软科学发展时代的人才群，应该有强烈的现代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有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有炽热的心、责任心和求实创新、勇于奉献与团结协作的精神。这样的队伍应具备承担重大历史使命的能力，用自身创造的智慧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进步。

具体说来，这样的队伍能够设计和实施开发人的智力的系统工程，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能够进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开发各种软件，按照软经济规律办事；能够适应现在开辟和将来开辟的高科技产业；能够综合运用新兴学科去探索发现和利用事物的趋势性、潜在性和方法性，为改革开放服务；能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战略和决策产生影响，把握时代潮流。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变革中，格局是前提，软竞争是标志，人是动力，三者联为一体显现了软中变革的特征。这种变革将预示着世界经济的转型，转型中还会出现新问题和新特点。通过变革的实践和总结，世界经济的理论将会更加丰富多彩和深入发展。同时这种变革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扬长避短，采取对策，积极进行软的竞争，参与国际分工。

①②沙尔文·托夫勒：《权力转移》，《世界经济科技》1990年12月4日

③张伟弟：《方兴未艾的我国咨询业》，《经济参考》报1990年4月14日

④（日）端山贡明：《当代和未来之间的科学技术》，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作者单位：山西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上接第121页）

对于取得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和企业领导给予重奖。放宽放活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让科研机构承包企业和技术开发项目，亦可将技术成果作为企业参股，建立科学技术市场，鼓励科技人员承包科技项目，保护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合法收益。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东莞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市将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我们相信，到2000年，全市科技进步的主要指标，能够达到全省乃至全国先进水平。

作者单位：东莞市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林有能

理解主体客体理论和新唯物主义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高齐云

在关于哲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许多论者都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里，包含有主体客体的理论，但在阐述这一理论同哲学基本问题以及整个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关系时，则出现多种不同看法，这是学术争鸣的正常情况。然而，我认为多种不同看法的出现，是由于论者在方法论上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就如何准确理解它们的关系的方法论前提，谈谈个人意见，供进一步讨论。

第一，必须了解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关系。

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实际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是恩格斯通过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深刻研究，而概括出的一切哲学共同具有的一般性基本问题。至于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以及各个具体的哲学学说，由于它们产生、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因而它们直接探究、阐述的基本问题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些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彼此各有不同，也不等同于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与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于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探究的基本问题有所不同，恩格斯在提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曾有论述，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恩格斯指出，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还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了解精神现象是自己身体活动的结果和表现，因而当时人们探究、思考的是所谓的“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②恩格斯认为，到中世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经院哲学中有了新的表现：“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而当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又以不同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③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所探究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和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相雷同，而是各有

自己时代的特色。它们与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联系，就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具体的贯彻和特殊的表现。

关于哲学家及其哲学学说探究的基本问题和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关系，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从恩格斯、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中，发现端倪。恩格斯在批判地评价黑格尔哲学时，列举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等主要著作，并且认为精神现象学“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④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⑤ 《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就在于它通过阐述人的意识怎样由“对象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发展到宗教、哲学等“绝对精神”的形态，从而论证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范畴——“绝对精神”的形成。在《逻辑学》及以后的著作里，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变为脱离人和人类的、独立的“实体”和“主体”，并且通过概念的推演，使“绝对精神”经逻辑阶段外化为自然界，再在思维和历史中回复到自身，最后在黑格尔哲学里完成它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运动。由此可见，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绝对精神”的形成和运动，它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具体的贯彻和特殊的表现。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和辩证方法，就是在研究、论述“绝对精神”的形成和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⑥ 关于费尔巴哈及其哲学的问题，恩格斯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恩格斯指出，“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⑦ 费尔巴哈自己也明确地指出，他的“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又说：“我的学说和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⑧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人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费尔巴哈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同样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具体的贯彻和特殊的表现。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主义性质、唯物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杂质，都是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阐述中体现出来的。

有些论者认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承认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们还声称，承认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会导致取消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否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其实，这些耽心是多余的。明确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不仅没有背离唯物主义，而是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并且给哲学、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和要求。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个别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真的与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直接同一，那末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哲学学说，既没有差异，也没有发展，整部哲学史将变得简单而贫乏。

第二，必须了解新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与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功能的关系。

有的论者不仅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包含主体和客体的理论，而且认为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我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一书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学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这个新哲学的“理论体系是以在社会基础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一基本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成为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和外在的，而是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功能所决定的。

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过程中就不断地有所思考有所论述。早在1843年9月，马克思就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⑧揭示了新思潮的功能不在于教条式和空想式地预料未来，而在于通过实际斗争去批判、改造旧世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新哲学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功能结合起来考察，明确地肯定：“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⑨在标志着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更通过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对比，鲜明地揭示了它们在根本性质、根本功能上的原则区别。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⑩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理论，发挥作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的作用，这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功能所在。

要适应新唯物主义的独特的性质与功能，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就不能停留于探讨一般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必须直接寻找现代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历史主体和被改造的历史客体，同时制定科学的主体客体理论。从新唯物主义孕育、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主体及主体客体化的概念，论述了现实的人及其类本质的二重化、异化，造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与公民的分离以至对立，并且强调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观点是“从对象和自身的关系来考察对象的观点。”^⑪由此向前，马克思从人的自我异化中展开了对现代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探索，同时继续制定作为理论武器的新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基本观点。作为对现代社会历史的主体的探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因而同现存的国家及其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它成为人类解放的“心脏”。^⑫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源，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必须改造、扬弃的历史客体。他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分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二者的对立。……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敌对性的相互对立。”^④因此，“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⑤马克思关于为革命地改造现代社会而确定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认识，经过《共产党宣言》直至《资本论》，才达到完整和深刻的程度。可见，新唯物主义只有科学地确定、阐明革命地改造现代社会的具体的主体与客体，才能真正地贯彻、体现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理论和革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的性质与功能。如果没有对上述的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科学认识与阐述，新唯物主义的上述的根本性质与根本功能就将成为虚幻的或被歪曲的。

然而，确定、阐明上述的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有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作为理论指导和进行理论论证。而在新唯物主义孕育、产生的时期，这种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科学理论，只能是逐步制定逐步完善。因此，与逐步确定、逐步阐明现代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主体和被改造的客体的过程相一致，还有一个逐步制定、逐步完善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科学理论的过程。这就是新唯物主义孕育、产生的历史过程中，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主要方面、主要内容。当然，马克思制定、完善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科学理论，并不是在空地上开始的。他以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理论为主要的思想来源，通过批判地改造、创造，而发展出科学的新理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彻底克服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的有关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理论的辩证的内容和能动性的方面；彻底克服费尔巴哈有关理论的直观性和片面性，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发展他的理论的唯物主义的内容。马克思在批判地改造的基础上，把二者的积极因素融合起来，经过思维的再创造，发展出新的科学的主体和客体的理论。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改造为具备“社会特质”的“现实的人”，用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现实的主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把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和主体能动性的基础，进而全面地揭示了主体既受客体制约又能动地改变客体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丰富内容，大大地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深刻地揭示、论述了主体和客体在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发生对立、展开相互作用和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辩证关系，制定了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主体和客体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的科学理论为根据，深刻地批评了费尔巴哈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主体客体问题上的根本缺陷，科学地阐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内容、基本特征，进而划清了新唯物主

义与旧哲学的原则界限。这些确凿的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把主体客体问题作为新哲学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既贯彻了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原则，又体现了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的要求，并且因而得以形成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可见，只有了解、把握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功能与主体客体问题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才能深刻地理解新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本质。

第三，必须了解以主体客体关系为基本问题与马克思哲学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关系。

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存在，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何者是本原、第一性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哲学在以主体客体关系为基本问题的条件下，还能否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和怎样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呢？有人虽然承认主体客体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认为不宜把它看作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耽心那样难于在马克思哲学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既坚持辩证方法，又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马克思哲学承认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答，作为阐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揭示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根本区别时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⑩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答，是他的哲学的理论的基础，而不是他的哲学研究、解答的基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哲学在阐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时，坚持以唯物主义原则为指导，并且使之具体化贯彻在各个方面。

首先，在确定主体及其特性方面，批判唯心主义的精神主体观，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主体观。马克思彻底地批判和清除了唯心主义哲学以脱离人的意志、观念、自我意识等精神的东西作为主体的错误观点，肯定主体是人。但是，马克思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的人”、“抽象的人”，而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⑫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马克思在阐述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时，批判了无限夸大主体的能动性的错误观点，肯定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产物，还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⑬而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⑭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论述，既贯彻了辩证法，又坚持了唯物主义。

其次，在阐述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依存方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同一论，肯定作为客体的对象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现实性。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把精神的东西作为主体，同时把客体看作是主体的自我设置或自我外化，在唯心

主义基础上把主体和客体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同一论，强调主体与客体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肯定作为客体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于主体之外的。通过分析艺术欣赏的主体与艺术对象的关系，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②又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③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互相依存，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音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人不能成为欣赏对象；另一方面明确肯定作为客体的对象的现实存在，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对于懂得欣赏和不懂欣赏的人说来，都是不依赖于他们而存在于他们之外的；而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更显示作为客体的对象的客观现实性。在强调主体与客体互相依存的条件下，肯定作为客体的对象的客观现实性，这是在主体客体理论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又一方面。

再次，在论证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改造时，批判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肯定主体的改造活动必须以客体的规律性内化为基础。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理论把主体对客体的改变，说成是主体意志的自由创造，陷入了唯意志论。马克思承认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地改造、创造，但也坚决摒弃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肯定主体的意志、活动等受客体的规律的制约，必须把主体的尺度与客体的尺度结合并化为内在的尺度，化为主体的目的、计划等，才能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来运用到对象上去”。^④马克思在具体比较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时，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通过生产劳动，“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⑤阐明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必须受客体的规律的制约，这也是唯物主义原则的具体贯彻。

最后，在阐明人类主体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和对社会历史的创造时，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创造论，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实践力量的创造作用。唯心主义者宣扬思想具有创造世界的作用，只要从理论上批判了旧世界，旧世界就会崩塌；只要在思想上认识了新世界，新世界就会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们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⑥他们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首先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具有改造周围世界和创造社会历史的力量和作用。他们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

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²⁰ 马克思哲学的主体客体理论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这是从根本上、总体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同时也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探讨了理解主体客体理论和新唯物主义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应注意的问题。这些探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总的结论，就是在思考、论证问题时，要像马克思那样唯物而又辩证地认识、阐述。

①②③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页，第315页、316页，第316页，第310页，第334页

⑤⑬⑮⑲⑳㉑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第110—111页，第120页，第167页，第122页，第125—126页，第97页

⑥⑰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3页，第152页，第152页

⑧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

⑨⑩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第417页，第388页，第466—467页

⑪⑱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第30页，第50页

⑯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第202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胡塞尔论主体际性

——兼评当代哲学的“交往”困境

涂成林

交往问题无疑是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共同兴奋点之一。在胡塞尔那里，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借助“主体际性”这一术语来进行的，它是胡塞尔克服现象学本体论的唯我论困境的一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在交往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本文拟考察胡塞尔主体际性理论形成的理论契机与基本观点，并把它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内加以评价。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唯我论困境

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本质上看，是一门独具特色的人学本体论。它以现代数学与数理逻辑为模式来建立包含有绝对真理和永恒价值的严密科学哲学，并将通过现象学还原而显露出来的纯粹意识领域作为其本体论的研究对象。由于胡塞尔晚年着意于探讨纯粹意识之内以先验自我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本质结构，最终陷入了先验主观唯心主义与极端唯我论的泥坑。这样一来，胡塞尔现象学便面临着两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其一，先验自我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子，如何建立与其它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换言之，现象学本体论如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其二，仿佛是在彼岸世界游荡的先验自我，如何体现并确保现实的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换言之，它如何具有现实性的特征？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欧洲人普遍感受到一种价值失落和生存危机，这对陷入唯我论困境的胡塞尔现象学来说，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为了解决现象学的唯我论困境，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新唯心主义”的承诺。他指出，现象学虽然也是一种唯心主义，但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也非贝克莱、休谟等人的心理唯心主义可

比，甚至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也大相径庭。

为了更具体地描述这种新型唯心主义的外在形象，胡塞尔求助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他指出，先验自我就是一个孤立的单子，它与意向作用、意向对象一起，构成一个具体的、圆满的单子世界。单子的自我构成如同世界的构成一样，它提供了一幅理论化的世界图景。他说：“现象学的唯心主义自我揭示为一门先验的、现象学的单子论。这种单子论并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捏造，而是关于世界对我们所有先验地哲学化的人都具有意味的一种系统阐明。”^①因此，按照胡塞尔的理解，现象学唯心主义的具体任务就是解释这个单子的世界的含义，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作为真实世界意义的那种含义。这样一来，现象学的唯心主义既具有自给自足的真理性，又成为了一种与人的意义相关的价值体系。

显然，胡塞尔式的“唯心主义”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它始终不能摆脱哲学唯我论的困境。单子毕竟是个体性的，单子世界仍然是囿于纯粹意识之内的意向对象，那么，单子世界如何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呢？换言之，纯我与自我、自我与他我如何交往呢？胡塞尔的解释明显缺乏合理的哲学根据。他必须沿着先验自我同他人的关系的思路继续向前推进。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一类的唯我论实质作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②因此，“这

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③重温列宁在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唯我论的实质不无裨益。

二、主体际性：“移情作用”的主观派生物

胡塞尔解决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困难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探讨主体际性问题。之所以是“重新”，乃是因为这位哲学家以前曾毫无收获地讨论过这一问题。

胡塞尔从何时起开始探讨主体际性问题？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均无定见。我们由于资料所限，亦无须武断。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起码在《理念》时期，胡塞尔便隐约感觉到他的那种在现象学还原之后残存的“纯粹东西”与人们现实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换句话说，胡塞尔在为现象学本体论所设立的目标中，有一条便是确保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可是，通过现象学还原而获得的纯粹意识领域不仅不能体现出他人的现实存在，而且与日常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这个明显的矛盾着实令这位惯于思辨的哲学家搔首不已，于是，他便勉强地借用当时在心理学和美学上已经广泛运用的一个独特概念——移情作用（empathy）来确立不同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个概念，按照胡塞尔一以贯之的见解，显然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科学特征的哲学概念。因此，胡塞尔在《理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中区分了三个对象层次和三种认识方式：一是对原初给与的物理对象，要通过简单的直观来认识；二是指自身的意识状态，要借助于内在认识；三是对“他人的生活经验”的认识，要依靠“移情作用”这一中介。其中，对他人的体认要比前两者复杂得多，因为它不能作为原初给与，所以处于更高的认识层次。对此，胡塞尔认为，“与主体际性相一致的事物，乃是更高层次的构成性统一体。它的构成与处于‘相互理解’关系之中的主体的无限多样性有关。主体际性的世界是主体际性经验的派生物，它是以‘移情作用’为中介的。”^④在他看来，围绕他人的世界与围绕自我的世界，从本质上讲具有同一性。因此，当自我去理解他人时，必须将心身统一起来看待，换言之，对他人身体的体验便是认识他人的一种具体方式。可见，胡塞尔的议论带有很明显的猜测性，并没有形成系统而又完备的结论，而且，其中还弥漫着

浓厚的、他从一开始就厌弃的心理主义色彩。

随着对纯粹意识内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胡塞尔的现象学本体论开始从先验客观唯心主义向先验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回到事物本身”让位于回到先验自我；对意识对象与意识活动的论述则变成讨论先验自我的构成性；至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方法，其批判精神逐渐淡薄，沦为服务于先验自我的工具。到了这时，胡塞尔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现象学本体论已经步入了极端唯我论的漩涡，因而，他在讨论了纯粹意识的三位一体的先验结构之后，又重新提起主体际性的话题。

如果说在《理念》时期，胡塞尔是毫无把握地求助于“移情作用”的力量来建立主体之间的联系，那么，到了《笛卡尔沉思》时期，他便开始自觉地利用业已建立起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尤其是先验自我所独有的意向性系统，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在胡塞尔看来，先验自我虽然类似于莱布尼兹的“单子”，但它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意向性系统，因此，它不仅可以通过意向性将对象世界构成为意向相关对象，而且也体验到他人的自我存在。“无论如何，在我之内，在我的被先验地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命的限度内，我将世界（包括他人）——按其经验意义，不是作为（比如说）我的私人的综合构成，而是作为不是我自己的、作为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其对象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一个主体际性的世界来加以体验。”^⑤因此，“我所体验到的世界不是我个人私有世界，而是一个主体际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赋予所有人的，包含着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对象。”^⑥按照胡塞尔的说法，似乎一旦我们通过先验自我的意向性系统发现了与自己不同的另外的肉体时，那么，我们便可以立即将它视为另外的先验自我，并紧紧把握住他，使之与我本人的先验自我联系在一起，结成主体际性的交往关系。

即使在这里，胡塞尔也没有完全放弃对“移情作用”的幻想。他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先验活动，它必须诉诸真正的现象学描述。换言之，我在对自己的自我进行现象学描述时，同样也体验到在第二层次意义上显现的他人的自我，因为它是“被共同经验之物”。“这样一来，先验主观性被扩展为主体际性，成为一个主体际性的先验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也就是自然以及一般世界的

主体际性的先验基础，这同样是一切理想的对象化的主体际性存在的先验基础。”^⑦因此，通过先验自我的意向性系统，可以产生出一个独特的主体际性的联系，并一起来构成共同的对象世界。注意，这里胡塞尔不再提“我”，而是经常提及“我们”了。他这样写道：“通过上面提到的（构成的意向性）的共同化，先验的主体际性具备了一个独特的主体际性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它构成了对象世界。因此，作为先验的‘我们’，它既是这一世界的主体性，也是人类世界的主体性，这便是它使自身实现对象化的形式。”^⑧然而，在胡塞尔那里，“我”与“我们”的差别，主体际性与对象世界的不同，其实只具有表面的意义，我们依然既可以说是先验自我创造了对象世界，也可以说主体际性是对象世界的创造者，这都是一回事，抹去的还是世界的客观现实性，遗留下来的仍是一个观念化的世界。胡塞尔实际是在重蹈他以往一直遵循着的那条从先验自我出发、构成他人的存在并由此而设立对象世界的老路。

但是，现象学所独具的思辨性不允许胡塞尔的推理思路有丝毫停顿。既然胡塞尔断定：“作为观念的对象世界——它是主体性的（即主体际性的共同化）经验的观念派生物，从观念上看它可以是持久的和谐并因此而维持下去——它在本质上与主体际性（它本身被构成为具有无限开放性的观念化）有关，其各个部分的特殊主体又都配备了相互对立而又和谐的构成系统。”^⑨那么，我们要问，各不相同的先验自我通过意向性系统所结成的主体际性何以能共同构成对象世界呢？胡塞尔受到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启发，认为这同样可以借助“和谐”这一概念来说明。他这样写道：“世界的构成，从本质上看，与各个单子的‘和谐’有关；恰恰是和谐存在于各个具体单子的具体构成之中；相应地，它也与每一单子中持久而又和谐的发生有关。”^⑩不难看到，胡塞尔由于受唯心主义体系的桎梏，并没有真正解决先验自我的相互构成与共同构成的悬案，他所提出的“和谐说”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托辞，而且还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导向了一个模糊的不可测的前景。

三、交往：作为一个时代课题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理论站在现象学的特殊视角，明确地考虑了先

验自我之外的其他人的存在，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这就使胡塞尔“摆脱了唯我论”，^⑪实现了现象学哲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我们以为这种说法尚可商榷。

诚然，胡塞尔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使他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他晚年的全部哲学研究都可以说是这种危机感以及哲学使命感的产物。他甚至从目的论的高度来剖析主体际性的整体观念，声称最终目标是达到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这虽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它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批判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哲学家的“忧患意识”，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胡塞尔的哲学结论令人不敢苟同。因为它不仅没能拯救现象学本体论的唯我论困境，相反是在唯我论的歧途上愈滑愈远。这具体表现在：第一，主体际性只体现了先验自我之间的意向构成关系，它不具备完整的时间维度，即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延续，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仅仅是自我之间当下的意向交流。第二，主体际性完全排除了客观现实性的因素，它不仅没有现实的人的肉体形态，而且也与外部客观世界毫无关系。第三，由主体际性所标示出的他人自我，不过是先验自我的移情作用观念派生物，归根到底依附于我自己的先验自我。第四，与主体际性共在的对象世界，依然是一个观念世界，它是先验自我的意向相关物，它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先验自我之间的和谐一致。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胡塞尔尽管在现象学探索活动之始就提出了绝对真理与人生价值这两个双峰对峙的哲学目标，但它一直是在先验主观性的范围内兜圈子，无论是先验自我，还是主体际性，它们的基地都是纯粹意识领域，真正的、现实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一再是悬而未决，置于永恒的“括号”之中。这一致命的弱点使胡塞尔一直遭到他的后继者与其他流派哲学家的批判，而他后期之所以重点讨论欧洲人的危机与生活世界问题，其原因盖出于此。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胡塞尔利用主体际性来摆脱现象学本体论唯我论困境的努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故伎重演。

交往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哲学课题，这同样是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理论所昭示出来的。因此，问题还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范围里

加以讨论。我们无论说交往问题是对传统哲学题材的突破，还是说它是当代哲学的特产，都不为过分。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绞尽脑汁解释，主体是如何去认识客体的，是依据天赋观念，还是凭借感觉经验，抑或还有其它途径？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沟通方式，先是麻木，继而冷淡，一直视而不见。当一些西方学者在哲学史上寻找这方面的材料时，恍如站在黑暗之中，感到惊讶不已。美国人穆尼埃写道：“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地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过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么一些：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与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它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②这个观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它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为什么直到20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提出一个主体通过何种途径与另一个主体相接触这个更本质也更难于索解的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对外部自然的改造不断理性化、合理化，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交流形式或交往方式却不断遭到扭曲和阻塞，不合理的、非理性的程度日益加剧。人的现实的交往困境必然反映到哲学沉思之中，它迫使当代西方哲学冲破传统唯心主义的研究范围，这就使主体之间的交往问题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往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西方近代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传统，更加强调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合理关系。在当代西方哲学诸流派中，狄尔泰的生命哲学、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舍勒的哲学人类学、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理论、海德格尔的“在世”学说、萨特的“为他”观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伪原则等都有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详细讨论。了解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将它们与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理论作一番比较，或许不无启发。

比如，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就十分重视交往问题。从一开始，他就把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存在关系的个人视为哲学出发点，这与胡塞尔现象学有所不同。如同克尔凯郭尔一样，舍勒也认为，哲学研究是从人类主体性发源的。在他看来，人是一个向世界和其他主体“开放”的存在，人注定要与其他人在一起生活，自然、社会环境都是人的存在的先验结构。人虽然以个体面目出现，但他

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必定会与他人结成本体论的关系。同胡塞尔比起来，舍勒的交往理论清除了很多先验而又神秘的因素，与人的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但是，他强调社会生活无所不在，与人如影随形，这使他在解释人的交往时预先假定了一种泛活力论，最终陷入了机械主义。

再如，雅斯贝尔斯也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交往理论。他所说的交往是指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自我之间的交往，这显然是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前提的。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存在的自我之间的交往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交往是出于人的本性的一种冲动，是自我存在的方式。只有在交往中，人才能追求到现实的圆满性与统一性。正是作为存在主义人学的本体论基础，交往包容了丰富的哲学内涵。雅斯贝尔斯写道：“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实现从未圆满过的交往活动，那么，一切都成了。”^③这里必须指出，雅斯贝尔斯谈论交往，绝不是赋予人的自我存在以社会意义，相反，倒是力图用他人与社会来渲染自我存在。他根本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同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至于当代哲学中的其它交往理论，我们无须一一考察。综上所述，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代哲学之所以在交往问题上陷入困境，它的最深刻的理论根源在于，忽视乃至否认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劳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关系，把交往活动仅仅理解为人与人之间达到的了解和承认水平，甚至归结为人的心理体验与情感反应。这样一来，人的交往便脱离了客观现实基础，成为一个在思想意识领域便可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视。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就具体地讨论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交往概念所涵盖的丰富内容，认为它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外部交往，甚至战争也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还阐述了人的交往活动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交往能力，即生产力；另一是人们在一定的所有制的制约下所从事的物与物的交往过程，这也就是生产关系。他从这两方面入手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扩大如同社会生产力

(下转第31页)

试论古希腊哲学关于范畴体系的建构原则

崔延强

在古希腊哲学中，范畴是指存在的最基本的类型和划分单位，一般被称作“存在的种”。它是构成哲学体系的基础或元素，有多少种存在，根据什么理论原则和指导方法，或从什么角度对存在进行恰当地分类，成了哲学家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可以充分体现出各种哲学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特征。自从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范畴体系之后，范畴体系的建构原则问题一直是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以亚里士多德和晚期希腊注释家波菲利（Porphyry）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逻辑谓词原则；

第二，以斯多亚学派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语法和逻辑原则；

第三，以柏拉图学园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提诺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的本体论原则。本文依次讨论这三个原则的一般特征、意义和影响。

一、经验主义的逻辑谓词原则

亚里士多德首次把法律上的一个用语kategorivies（原指在法庭上对某人的指控和告发）运用到哲学中来，使之成为一个哲学术语。他所理解的“范畴”一词有两重含义：1. 存在的种类，这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2. 谓词或宾词，这是逻辑学方面的意义。^①实际上，在他那里，范畴、存在的类型和谓词是同义词。逻辑谓词就是存在的基本种类。因此谓词有几种，存在就有几种，谓词的分类和存在的划分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从经验出发，分析了表述主词的各种不同情况。有些谓词表述了主词的属性，有些则表述了本质特征。他把这些谓词概括为四种：属、定义、固有性和偶性，建立了“四谓词”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起点”，范畴学说的“导言”，也就是范畴分类的基本原则。亚里士多德先后提出了两套范畴分类体系。一套是被波菲利称为“最大可能的分类”，^②即十分法体系。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另一套是所谓的“最小可能的分类”，即四分法体系。实际上，四分法是根据对主词陈述的不同程度，对十大范畴进行高度概括和凝炼的结果。包括第一实体（个别事物）、第二实体（属、定义）、固有属性和偶有属性。我们试举四分法为例

来具体说明这个谓词分类原则。在《范畴篇》中，③把“可以述说一个主体”(A)和“存在于一个主体中”(B)两个句子分别进行肯定和否定，然后再相互搭配，得出四种结果，建立四个范畴：

(1) A并且非B(可以述说一个主体，但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指陈述主词本质的属和定义或第二实体。如“人”。)

(2) 非A并且B(不可以述说一个主体，但存在于一个主体中。指描述主词偶有属性的谓词或范畴。如“某点语法知识”、“某种特殊的白色”。)

(3) A并且B(既可以述说一个主体，又存在于一个主体中。指陈述主词固有属性的谓词或范畴。如“知识”。)

(4) 非A并且非B(既不可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指作为主词的第一实体。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

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Isagoge)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谓词学说，提出了“五谓词”理论：种、种差、属、固有性和偶性。并且在谓词分类的基础上建立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分法范畴表：

范 畴	实 体	普遍实体(种、种差、属)
		特殊实体(主词或主体)
	属 性	普遍属性(固有性)
		特殊属性(偶性)④

亚里士多德和波菲利关于范畴分类的谓词原则建立在人类感性、直观经验的基础上，反映出早期人类思维和认识的局限性。这种分类原则的经验主义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亚里士多德没有严格区分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他所理解的范畴或谓词不是主观思维的基本“概念”(noemata)，即揭示人类辩证思维的、精神性的概念，而仅仅是存在的类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分类原则缺少康德的认识论倾向。⑤第二，范畴或谓词是对主体不同方面的描述，某种意义上是静态的、孤立的，缺乏有机性和统一性。如果说范畴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只不过是外延方面的类属关系，没有内涵方面的实质性的必然联系，或者说，根据逻辑谓词建立起来的范畴表没有涉及范畴演绎或推演问题，没有考虑简单范畴与复杂范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未能重视复合命题的分类，只侧重于外延逻辑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康德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用嘲讽的口吻指责亚里士多德凭经验建立范畴表，“碰上便捡”，最初捡了十个，以后又捡了五个(即“后范畴”)，结果漏掉了许多重要的纯知性的概念，还把一些派生的感性概念列入表内。撇开康德的唯心主义立场，我们发现他的批评还是有些道理的。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们试图克服经验主义分类原则的缺陷，寻找一个他们认为更加可靠的理论基础来建构范畴体系。

二、形式主义的语法和逻辑原则

斯多亚学派把范畴看成是存在的“某物”(ti)，即具体事物本身。他们建立了四分

法范畴体系：

1. 基质或底层 (hupokeimenon)：指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的存在，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2. 具有质的事物 (Poion)：指取得某些质的实体。包括具有一般质的事物，如“人”和具有特殊质的事物，如“苏格拉底”；
3. 处于某种状态下的事物 (Pōs echon)；
4. 和他物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下的事物 (Pyos ti pōs echon)。⑥

看起来这四个范畴无非是对亚里士多德十大范畴的改造和减缩，但考虑的角度与依据的理论原则却大不一样。斯多亚学派根据的是形式主义的语法和逻辑理论。

斯多亚学派不仅严格区分了语言符号、逻辑概念与判断、存在的事物，而且第一次在三者之间建立了平行或对应关系。他们认为有三种东西是密切相关的：1. 记号或文字符号，是有形体的，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2. 意义或内涵，称为Lecton，即“所意指的东西”或“能指”，是无形体的，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3. 事物或外延，即意义所指称的外界存在，也就是范畴本身。它是有形体的，是形而上学或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记号——意义——存在（范畴）有着对应一致的划分关系。这是斯多亚学派范畴分类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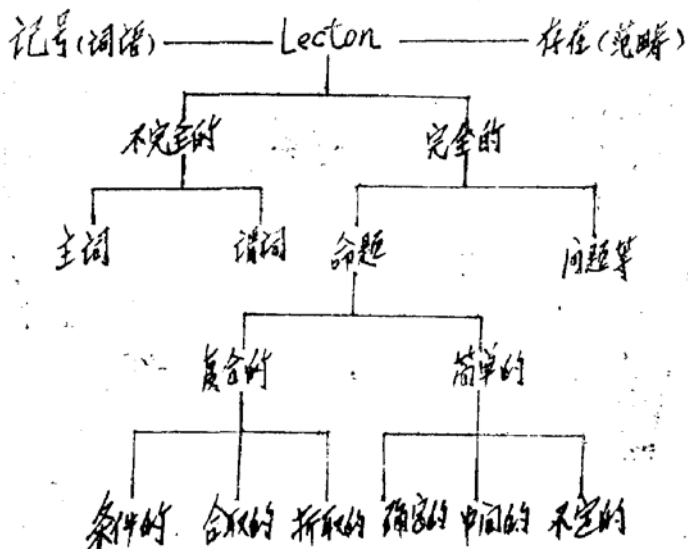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根据语言符号来确立范畴表的。他们十分重视语言学的研究。⑦在词源学方面，站在“本质派”（Physis，名称由事物决定）的立场上反对“习俗派”（Nomos，名称由习惯决定）的观点，认为词和它所表示的事物的真实本质是一致的，对词进行分析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根据这个理论，他们通过对词语的分类进而对范畴进行划分。他们已经区分了五个词类：动词、连接词、冠词（冠词、代词）以及作为独立词类的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词类目录表对应于范畴分类表：⑧

词 类	范 畴
代词和冠词	基质或底层
名词 { 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	具有质的事物 { 具有一般质的事物 具有特殊质的事物
不及物动词	处于某种状态下的事物
及物动词和连接词	和他物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下的事物

斯多亚学派还对逻辑学研究的对象Lecton（意义）进行了划分，并根据这种划分建立了范畴体系。⑨

所谓不完全的，即表达未完了的。包括主词和谓词两个部分。主词如“谁”、“苏格拉底”、“人”、“占卜者”等相当于词类中代词、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所表达的意义，指称“基质”和“具有质的事物”这两个范畴。谓词如“坐”、“走”、“写字”等相当于动词所表达

的意义，指称“处于某种状态下的事物”这个范畴。所谓完全的，也就是指表达已完了的，自身能断定真或假的命题和问题、询问、请愿、宣誓、祈祷等。具有逻辑意义的是命题。斯多亚学派在逻辑学史上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关于命题的划分。他们把命题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两种。简单命题是由主谓词直接结合而成，可按量分成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命题；也可按质分为肯定的、否定的、缺乏的命题。简单命题也指称“处于某种状态下的事物”这个范畴。复合命题是由简单命题加上各种连接词项构成的。包括条件（如



如果)、附加(既然)、合取(并且)、析取(或者)、因果(因为)、比较(比)等命题。斯多亚学派是否根据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的划分也相应地划分了简单范畴和复杂范畴呢？是否依据复合命题的分类也相应地划分了各种复杂范畴呢？如果从斯多亚学派建构范畴体系的指导原则这个前提推断，他们应该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我们在他们的范畴表里只发现了“和他物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下的事物”这一概括性的范畴，没有进一步细致地再分。这可能是象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斯多亚学派只专注于逻辑方面的研究，因而忽视了事物本身(范畴)的缘故吧。但无论如何，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试图根据命题的分类建构范畴体系的尝试，尽管只提出了一个宏观上的原则，没能具体地实施下去。它标志着对范畴的研究从经验性、随机性向规律性、系统性的不断提高和发展。由于斯多亚学派更加注重逻辑概念和判断的内涵方面的研究，因此以之为原则建立起来的范畴表也表现出更多的内在统一性。但斯多亚学派建造范畴体系的原则和指导方法是形式主义的。语言形式、意义和存在的类型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预设好了，然后迫使存在的分类服从于语词和逻辑对象的分类，这就难免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弊。

三、超验主义的本体论原则

历代柏拉图学园派的哲学家基本上是根据柏拉图超验主义本体论原则来批判、改造、吸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建造自己的范畴体系的。他们提出了二分法的范畴表，一是绝对的存在，二是相对的存在。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范畴都可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找到，并且这些范畴都应置于绝对和相对的存在这两个范畴之下。^⑩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提诺并不认为可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直接找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他首先根据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严格地把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所讨论的五个最大的种，即“通种”(megista gene)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或“存在的种”区别开来。^⑪他认为五个最大的种：实体(理智实体)、运动、静止、差异和同一是理智世界的本质规定性。而亚里

士多德的范畴仅仅是可感世界的存在的类型，根本不适合于理智世界。即使在可感世界中，这些范畴也过于烦琐，不能恰当、准确地描述和解释各种现象，必须加以修改和凝缩。例如，时间和地点可以归于量；运动的两个方面分别是活动和遭受，因此这两个范畴可以合并为运动这一范畴；姿态可以归于运动或其他范畴；状况可以划归于实体和关系范畴。柏拉图主义化了的范畴共有五个：实体（仅是第一实体，第二实体属于理智世界）、量、质、运动和关系。五个种和五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从本体论上讲，前者先于或优于后者。五个种虽然在数目上是“多”，但在本质上是“一”，是同一之中的杂多。它们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同时出现，一起构成存在的实质；而五个范畴在本性上是杂多，从不同方面，有先有后地描述具体事物的特征，并不决定存在的本质。其次，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前者是后者的模型，后者是前者的“影子”或“摹本”，从前者中“流溢”出后者来。因此种和范畴在数目上是一致的，甚至在名称上也是相互对应的。有时他也称范畴为“种”，但他认为这个作为可感世界的种仅仅在名称上与理智世界的真正的种相同，意义却迥乎不同。亚里士多德正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意义的种，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可感世界的类型不能称作种，最好称为范畴。普洛提诺根据柏拉图超验主义的理念论和通种论，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建立起五分法的范畴体系，从中体现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神秘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

古希腊哲学从逻辑谓词、语法词类和逻辑命题，以及本体论三个角度考虑了范畴体系的建构原则问题，尽管有其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超验主义的片面性，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启迪了后世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康德实际上就是继承、批判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范畴体系建构原则，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结合起来作为指导原则，建立了范畴表。他把范畴视为先验的知性概念和铸造知识的范型，并根据思维的本质——逻辑判断得出了四组十二个（或对）范畴，每一组范畴都是由三个构成的，体现出正、反、合的思维规律。但康德的范畴体系是建立在先验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关于范畴表的建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斯多亚学派的形式主义逻辑命题原则、普洛提诺的超验主义本体论原则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原则的混合物罢了。

①参见《动物篇》412^{a5}，《物理学》200^{b28}，201^{a1}。《形而上学》1017^{a23}，1017^{a28}

②转自C·伊万吉利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波菲利》E·J·布雷尔1988年版，第51页。

③《范畴篇》1^{a20}—1^{b5}

④转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波菲利》第53页。

⑤П·C波波夫《逻辑思想发展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67页。⁶

⑥这四个范畴的中译名称比较混乱，这里作者根据希腊文重新译出。

⑦参见H·A·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⑧A·A·郎《希腊哲学家》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⑨参阅本森·梅特斯《斯多亚逻辑》加州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16页。

⑩转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波菲利》第8页。

⑪有关普洛提诺的范畴思想集中在《九章集》第六卷，第1、2、3部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民族精神的科学界定及其意义

卢少华

任何课题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探讨，似乎都应该从厘定该课题的基本范畴起步。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中，为了深化对“民族精神”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概念的理解，澄清人们头脑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必要对民族精神的本质含义和基本特征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说明。

一、民族精神的科学含义和本质特征

民族精神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历史范畴。在民族形成的初始阶段，各民族的精神状态还是很不稳定的，且带有随生随灭的特点。当一个民族在相沿相因和代代相传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壮大起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民族自身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以后，就逐渐领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原则、观念，作为人们处理族内关系和族际关系、反抗外敌入侵和维系民族团结的行为准则。这些原则、观念经过世代相传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通过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体育游戏、道德情操等形式固定下来，就成为影响该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绵延不绝和不断振兴，是一个民族具有蓬勃生机的重要标志。由于民族精神是历史地形成的精神状态，因而具有稳定性、持久性的特点。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或共同追求的共同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本民族大众的肥沃土壤中。在阶级社会里，民族精神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是，一般说来，凡是有利于民族发展的观念、原则、品质、性格、道德和风尚，不仅符合本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也能为本民族的统治阶级所接受。这种精神文化在人民大众中凝聚、提炼和发展，并经过统治阶级提倡和推广，就会根深蒂固地融汇于本民族每一成员的言行举止之中，从而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尽管有些性格特征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具有，但即使这些共通性的东西也都

无不植根于各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这就是民族精神的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体现民族发展的生机活力，反映民族根本性格的主导精神。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风貌中，总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如在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中，既有粗暴傲慢、僵硬刻板和桀骜不驯的一面，即日本武士的军刀所象征的那种刚硬、坚强、残忍和疯狂；同时又有彬彬有礼、谦和恭顺和忠心耿耿的一面，即象菊花所象征的温柔、恭顺、娇美和优雅。在所谓的“美国精神”中，也充满了个人主义与从众主义、崇教精神与物质崇拜、工作伦理与享乐主义的文化矛盾，表现了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在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个性中，每一民族总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文化来充任民族发展的脊梁和支柱。例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究竟是守旧、奴性、麻木的阿Q精神占主导地位，还是艰苦奋斗、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敢于抗暴、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精神的关键性问题。只有那些全民族共同具有的、激励和鼓舞本民族成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积极奋进的、反映民族生存发展规律的各种精神特质，才是该民族的主导精神。只有这种主导精神才能构成文化传统的基因和内核，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也只有这种主导精神才能被称之为民族精神。由此观之，所谓的“日本精神”，只不过是一种“阶层精神”，即“武士道精神”；所谓的“美国精神”，许多成份也只不过是一种“阶级精神”，即资产阶级的精神。这些都称不上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形成创造力和凝聚力、产生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巨大的能动性。民族精神不是抽象而空洞的，它渗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和信念之中，并通过人民群众的思想 and 言行而表现出来。正是由于民族精神反映和代表了本民族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愿望和利益，体现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向，因而能够使民族的全体成员形成一种民族共识。这种共识犹如一面旗帜，把全体成员的意志、利益和感情紧紧地统一起来，从而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合作，激励鼓舞本民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的共同目标而奋斗。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支柱，力量所在，它能激励本民族大众的斗志，振奋人们的精神，凝聚人们的力量，陶冶人们的情操，协调人们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

民族精神是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范畴，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时间上看，有传统民族精神和现代民族精神之分。传统民族精神即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流传至今并仍有积极作用的优秀文化传统；现代民族精神即反映一个民族在当代存在和发展规律的观念文化，亦称时代精神。从空间上看，有广义民族精神和狭义民族精神之别。广义的民族精神是指世界各民族共同具有的、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接受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狭义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实现民族自我发展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从结构上看，其横向结构有作为民族社会的民族精神，它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有作为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特指传统文化的精华部

分；有作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精神，即健康的、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其纵向结构有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民族精神包括民族自觉意识、理论原则和文化价值取向，低层次的民族精神包括民族性格、传统习惯和心理感情态度等。从功能上看，可分为具有凝聚功能、支撑功能、激励功能的民族精神等几种类型。民族精神具有凝聚力、向心力、融合力，以维护民族的团结统一；民族精神是一种精神支柱，以保证一个民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繁衍、壮大、发展；民族精神还是一种精神动力，以鼓舞和激励民族成员自强不息。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就是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体现民族生存发展规律、反映民族根本性格、具有积极进步作用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包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健康的民族心理素质两个方面。稳定性、全民性、主导性、进步性、精华性是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那些昙花一现、随生随灭、不能从根本上充分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非主导性精神因素，或者仅为个别人、一些人或一个阶层、一个阶级所独有的腐朽没落的精神垃圾，都不能归属于民族精神的范畴。

二、民族精神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理论误区

人们对民族精神的研究渊源已久。早在公元4世纪的拉丁地文献中，就有对中国人民民族性格的似乎是最早的概括。认为这个民族最热爱和平，“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既没有贪婪的欲望，也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18世纪以后，民族性、民族精神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孟德斯鸠、伏尔泰、黑格尔、莱布尼兹、萨皮尔、庇提里弗斯等都对此进行了探讨，不同程度地分析了不同民族所宗奉的价值信条、生活风格、思想方式、文化认同、行为方式以及典型的心理特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理论观点。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民族精神的探讨并没有把它从民族性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才有关于“国魂”、“民族魂”、“精华”、“精神文明”等类似的说法，用以表明各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性格特征和优秀文化传统。但直到今天，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术语，学术界对此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民族精神是某一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文化在其心理——价值层次的沉淀、结晶、浓缩。它既包括该民族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也包括那些消极落后的精神状态。认为只有从正反两个方面才能深刻把握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风貌。

这种把民族精神视为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合一的观点，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民族关系基础上的不成熟的理论表现。从思想认识上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陷入了理论误区：

第一，把民族精神的概念混同于一般哲学范畴，认为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意识或民族一般精神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精神”概念作了单义的理解。实际上，“精神”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它不仅是指与物质相对立的一般哲学范畴，即社会意识；而且是指人们的意识、观念和心理中起主导作用，并表现意识、观念、心理主体活力和发展方向的东西。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

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不仅具有不同于他民族的一般心理状态、意识、观念和性格特征，而且必然具有在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中占主导地位，并体现民族发展方向和活力的精髓，这就是民族精神。必须把民族精神同民族的一般精神状态区别开来。

第二，没有认清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关系，把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划了等号。民族性格亦称民族性或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它是一个民族心理状态的综合体现。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曾对美洲印第安人、祖尼人、南太平洋的多布人的文化资料进行了研究，把他们的民族性格分别概括为酒神型、日神型、妄想型，认为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民族的心理和行为。1890年，恩格斯也曾对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进行了精神分析，认为这个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这种阶层分析也可视为对部分德国人民族性的论证。从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来看，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本质区别。民族精神特指民族性中健康的民族心理，即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指民族性格的全部。民族精神是民族性格的实质和核心，民族性格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民族精神决定、支配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反映、体现民族精神，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民族的宗教、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因而不能把民族精神完全等同于民族性格。

第三，把民族精神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翻版或同义语，简单地认为民族精神即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结晶。其实，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也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民族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既包括物质文化方面的一切成果，又包括社会意识领域、知识智慧、价值体系、道德情操、行为模式等精神方面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内容则狭窄得多。同时，民族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既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包含着大量毒害、麻醉人民的糟粕。而民族精神则是一个肯定概念，它仅仅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其外延比传统文化要小。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内核，它贯穿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第四，在思想方法上强调了两点论忽视了重点论，看到了现象忘掉了本质，把各民族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精神现象当成了各民族的精神本质。从总体上看，各民族的精神状态都是兼容并蓄的，既有国民劣根性的一面，又有其引为自豪的优秀品质。表现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且界限又往往不十分清楚，经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不论各民族的精神状态如何复杂，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支柱决定该民族的发展方向。在各民族复杂多样的精神因素中，也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要素才能决定该民族的根本性格和精神风貌。广大民族成员所具有的、符合各民族历史发展趋向的精神因素只能是该民族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优秀品质，它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之中。各民族的个别成员在个别时期或个别社会制度下存在的一些不稳定的和消极的精神因素是不会持久的，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和抛弃。因而，将消极落后的精神状态纳入到民族精神这个概念中来，貌似全面、深刻，

但却没有把握住民族精神的实质。推动各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精神并不是作为脱离现实的集体理想人格存在，而恰恰是对各民族复杂精神状态本质的现实反映。只看到各民族精神发展中的历史复杂性，而抓不住本质和主流；只看到民族精神状态的内在矛盾，而没有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问题，不管主观愿望是如何“辩证”，在思想方法上却只能陷入形而上学。

三、正确认识民族精神概念的现实意义

对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反映了民族精神的不同本质、内容和特征。因此，正确认识民族精神的科学含义和本质特征，绝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将民族精神从民族文化概念中单列析出，有助于我们认清传统文化的本质和主流，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民族文化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复杂两面体，既有积极因素和精华部分，也有消极因素和糟粕部分。因为，对传统文化既不能抱残守缺，衣钵传承，也不能一概排斥、全盘否定，而应批判继承。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不仅需要鉴别习惯和批判精神，而且需要辩证的哲学头脑和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是正确地对待和认识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基础。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精华部分和糟粕部分区别开来，并把它们与民族的主导精神与非主导精神联系起来认识，找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民族性格和保持民族生机和活力的根本点，就能够认清民族文化的本质和主流，从而深化对民族文化的研究。相反，如果不从民族文化的本质入手，仅从表面现象作文章，笼而统之地对待民族文化，罗列组合民族文化的两极对立和表面矛盾，不是过分夸大中国人的缺点，就是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的缺点；不是用中华民族的缺点来否定它的优点，就是用中华民族的优点来否定它的缺点；或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来个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待民族文化，是无法说清楚的。

其次，把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文明的概念来认识，有利于我们加强爱国主义的正面宣传教育，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中华民族历经兴衰变化，但始终凝聚在一起，始终保持民族的生机和活力，始终以强大的文化凝聚力维护着国家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它与它的民族精神中所包含的凝聚力、向心力、融合力是分不开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提出民族精神这个精神文明概念，就是要立足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用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来孕育“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本质上来认识传统文化，抓不住民族精神这个核心，反而把精神垃圾倒入民族精神之中，就否定了民族精神的客观存在，从而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否定了中国人自身。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概念上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留一块洁净的地盘，反而要在所有的空地上都填满精神垃圾，在政治上就会导致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第三，正确认识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特征，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振奋民族精神”的口号，确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意识。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肯定的自我认识和

自我评价。民族自信心在道德感情、道德意识上的深化，就是维护民族尊严、祖国荣誉的民族自尊心。在民族自信、自尊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就是民族自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主要的就是依靠这种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如果我们把腐朽没落的精神因素和消极落后的心理成份纳入到民族精神的范畴之中，提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最后，正确认识民族精神的科学含义和本质特征，有利于我们确认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意识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族精神作为整个民族的主导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提高、升华中国的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才能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建立在科学地评价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创造能力和发展前途的基础之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之下，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积极吸收、融汇各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批判、抵制和剔除一切腐朽的精神垃圾和思想糟粕，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内容并保持它的高度纯洁性。

作者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

责任编辑：范英

（上接第84页）

3. 民族凝聚力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凝聚力的历史的、具体的同一。民族凝聚力自然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并不断地形成传统而继承下来的。它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但作为传统，又在历史的批判继承中不断得到扬弃，吸收现实的时代的新因素，实现着新的发展和创新。它不仅具有新时代的特点，而且预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考验中，又形成新传统，并不断得到历史地继承。这就使民族凝聚力在具体的历史继承中不断实现着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凝聚力的同一，这种同一性其意义在于：不仅说明民族凝聚力不能从外面移植或强加，不能割断历史和无视传统而重新创造，它是以自己的民族性和传统性而区别于别的民族凝聚力的；而且说明民族凝聚力同样要面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不是僵化地死守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实现着变革和创新，使其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总之，世界上不存在先验的、抽象的、凝固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的同一性，是发展着的历史的具体的同一性。

①俞克纯、沈迎选《激励·活力·凝聚力》第185页。

②牙含章：《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第9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凌峰

全国首届广义进化与自组织理论研讨会综述

全国首届“广义进化与自组织理论研讨会”最近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和深圳两地隆重举行。会议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首先,与会者对国内外有关广义进化和自组织理论研究的现状、趋势等信息进行交流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闵家胤副研究员是国际一般进化论小组的成员,他介绍了国际一般进化论小组的研究状况和动向,认为目前主要的课题是:(1)“Cognitive map的进化,21世纪的范式”。闵氏将Cognitive map翻译为“认知图象”,而对“Cognitive map”,国际一般进化论小组各成员的理解和定义是不同的。闵氏将其理解概括为以下几层含义:第一,Cognitive map不是一种感性的图象,而是一种抽象的、认识的高级阶段形成的图象;第二,它是集体所共有的;第三,它是“遗传”的,例如涉及到文化的遗传时,相当于我们说的文化遗传基因;第四,从Cognitive map可以产生出科技、社会结构等;第五,价值是其核心。(2)“世界文化进化论”问题(Vaity and Diuersity—many culturel one Future)。文化进化是社会进化的核心,因此,这涉及国际一般进化论小组关于世界进化的总观点。(3)提出多层命令系统(Hilarchy System)的新概念。认为,未来世界进化是要进化成一个多层次参与系统(Hierarchy System),而不是多层次命令系统。这两个系统的信息流方向不同。(4)“意识进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从进化意识中产生出有意识的进化,也即是如何指导、控制人类的进化,使人类顺利度过分叉点,避免灾变的问题。

从一般进化论小组的各项工作中,似乎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察一般进化论的本体论基础问题,如世界的一元性和多元性问题。对此,华南师范大学颜泽贤副教授认为,苏联从80年代开始

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方向:复杂系统发展(演化)理论的研究,这个研究的总特点就是把现代非平衡理论消化吸收而纳入复杂系统演化理论体系中,并将此理论“上挂下联”,即向上不脱离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向下又各自联系自然科学专业,进行具体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目前,苏联在复杂性系统的研究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关于复杂性、复杂性系统概念的研究,这方面的著述很多,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复杂性的分类框架较好,值得借鉴;二是对客体、系统行为、系统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并将复杂系统研究定在第三层次,即是关于发展、演化的分析;三是对新旧演化理论进行比较,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区别。颜氏还介绍了苏联人认为其最迫切的问题:①把发展演化理论引入到分子层次,即研究其微观机制;同时也引入到社会,如经济、生态、生物圈、智力圈等领域;②揭示不同层次上演化的共同准则和机制;③建立发展演化理论的数学模型。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王兆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陈忠副教授等分析了国内有关广义进化和自组织理论研究的状况。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似乎是处于一种“平滑状态”,对很多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但不够深入,还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通过对国内外信息的沟通和评价,大家对国内外的研究有了一个更加清晰和整体的了解。对将广义进化和自组织理论称之为复杂系统演化理论达成了共识。大家认为,我国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差距虽有但不太大,甚至还有超前的方面,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国际研究中取得一席之地。

其次,讨论了有关复杂系统演化理论本身的问题。与会者对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基本概念,如复杂系统、演化、进化(一般进化,广义进化)、自组织、非平衡等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基本上达到共识。对于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逻辑体系,不少学者绘出了各自的框架,如陈忠的自组织理论体系结构包括六大部分,中央党校李建华提出的自组织进化模型由四大机制组成,颜泽贤提出了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逻辑框架;这些理论框架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复杂系统演化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系统演化的条件、机制、动因、自组织的规律或原理以及自组织及进化的哲学思考,具体应用等方面。

不少学者认为,熵或负熵是系统演化的判据,但王兆强对此则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认为熵不能度量序,并且认为熵和负熵概念的应用很混乱,他主张把“序因子”作为系统演化的判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黄明理副研究员提出“信息增殖”的概念,并认为可作为系统演化的判据……对此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虽未能得到统一的判据,但大家都认为,判据不应只限于一个,而应是多元的,而且,对于熵、序、信息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复杂系统演化机制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演化的终极原因,然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对此出现了不同看法,颜泽贤认为,信息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根本;陈忠关于信息—差异—序—势—力—流—进化之间的关系的想法引起大家的兴趣,并认为这是探讨系统演化的动因中值得深入探讨的思路。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涨落(内随机性)、环境压力、支配作用、竞争等作为系统演化动因的分析,对于演化的条件和机制,李建华阐述了他的自稳机制、突现机制、评价机制、运动性质机制,并认为,自组织机制正是这四大机制的综合作用;陈忠则认为,自组织机制包括维度上的机制和各层次上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对自组织的原理和规律进行了概括,但由于对原理和规律的理解的差异及其它原因,对此问题尚未得到一致看法。

最后,对自组织和广义进化的哲学概括及其具体应用的问题也作了探讨。如浙江大学楼慧心对非线性相互作用作了哲学层次上的探讨,黄明理对广义进化与世界图景的问题作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对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哲学概括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观。浙江大学胡浩对广义进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应用作了大量细致的探索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彦副教授则对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作了探索。刘继光对一般进化理论在航空工程中的应用可行性作了分析和探讨。

这次研讨会对复杂系统演化理论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时间条件限制,某些问题提出来了但未展开讨论,体系中的某些问题尚未涉及。这却也体现了该领域的巨大包容性和研究的巨大潜力。因此,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研究正是方兴未艾,前景可观。

(范冬萍)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

——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

李洪岩

张荫麟(1905—1942)笔名素痴,是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史学贡献除著有红极一时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外,在古史、宋史、科技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亦颇多著述,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之誉。但他的史学贡献迄今尚无人予以专门表彰(不含海外),以至其人其学已鲜为人知。在史学理论方面,张氏提出过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史学理论命题;曾试图通过对所谓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他讨论了史实之选择与综合问题以及史料的局限性问题,提出了选择史实的六大标准(他认可的有五种)和影响史料科学价值的15种限制。本文拟对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予以辨析。

一

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未休的重大历史哲学问题。张荫麟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原因有三:

第一,近代中国史学强烈科学化的趋向使他深感有重提史学的人文性(以艺术化为极致)的必要。毋庸讳言,在我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确有一股崇尚科学性、轻视艺术性的偏向。五四的科学旗帜,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败北,胡适等人对科学方法的倡导,都有忽视人的非理性层面的偏向,以至当代学者有人提出“文史必须分家”^①的口号。倒是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词章、义理、考据不容偏废的论断,更有深刻的道理,与当代西方学科综合潮流相通。张荫麟在《哲学与政治》^②一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史学上表现为实证主义)观念,并认为杜威是“老糊涂”。而我们不该忘记在二十世纪哲学家中,杜威可说是对“科学最尊重的一位”。在张荫麟看来,“价值的意识就是领略真、美、善的能力”,价值意识的锻炼是哲学修养的要素之一。因此,光有“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即能“解蔽与毋自欺”还不行。“不故以不知为知,不故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或者“不妄以不知为知,不妄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只能说明仅仅具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尚不具有积极的主观审美意识。科学史家胡适标榜的“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实则仅停留于此便打住了。价值意识的锻炼正是更上一层楼，要求在此之上再对真美善做出判断，即对历史的科学性、艺术性、伦理性予以解答。张荫麟价值观中蕴含的史学理论，确实比胡适的“拿证据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识见更高一层，后者实际上仅仅停留在“理智上的诚明”阶段；胡适虽然也强调“艺术的”、“高远想像力”等史学功能，^③但科学理性无疑是他更重视也更有影响的理论趋向。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风气的批判密切相关。

第二，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在哲学上接受柏格森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现代西方哲人中，怀特海、克罗齐、柏格森全都“喜欢看事物的全体”，^④张荫麟提出的三个哲学修养之一就是“求全”的精神，即在“对象上和方法上都要‘整个地看’”。他说：“予确信柏格森之学说，实涵有若干不刊之灼见，可为今日我国补偏救蔽之剂者。”^⑤实质上他对柏格森的推崇在史学上即表现为将直觉主义拿来运用到历史写作当中，从而讲求史学的美学价值。我们知道，柏格森是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正如张荫麟所概括的，柏格森的学说在于“以直观观心，而广其所得于观心者以说物”。柏格森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会使人想到李石岑、朱谦之、张君勱和张荫麟的先驱梁启超。我们不知道张荫麟是不是通过梁启超而研读柏格森的，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将哲学上的“直观”概念运用到历史理论与写作中，会得出什么结论、产生什么结果？柏格森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常被喻为是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理论，它撇开人的外部社会关系，试图钻入人的内心，表现人类内心深处的意识之流。在柏格森看来，复杂的意识之流是以单纯的自然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方法所无能为力的，必须用人文的方法而不是以机械的方法对待人。人文方法以文学形式为典型，亦即“直觉”。柏格森的著作全都文词华美，广设譬喻，以至以譬喻为“穷理之阶”，^⑥其思想动机正在这里。难怪张氏以柏格森理论为“真实血肉之哲学”了。柏格森使我们想到新康德主义者割裂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意图所在。^⑦而张荫麟在探讨历史之美学价值时，则立足于自然界为“审美对象”与“穷理对象”的二分法，康德的“先天判断”以及叔本华、尼采文学化的哲学亦曾对张氏有过深刻影响。顺便说一句，哲学的诗化在当代西方正形成显学，以至“在英美国家，哲学已经在其主要文化功能方面被文学批评所取代”，^⑧这多少可以更清醒地帮助我们认识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

第三，张氏提出历史亦是艺术的问题又同他浓厚的文学趣味相关。这一趣味主要受吴宓影响，在吴宓的影响下，他译过一些西洋诗，还译过歌德名著《浮士德》，同文艺界某些人士交谊甚深。他本人虽也大写考据文章，却“不以寻褚琐屑为学问之要”。他对梁启超的推重，亦主要在梁氏的才学上，认为“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⑨他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缺点在于忽视读者的接受关系，“直接用原料的地方太多”，“有些若非用自己的话来代替或夹辅，则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⑩他不但要求他人“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自己更能身体力行，其代表作《中国史纲》

乃“以说故事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⑩“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目的在于可读。以至陈梦家认为《中国史纲》是历史教科书最好的一本“创作”。^⑪

在中国近代史家中，强调史学艺术功能的不只张氏一家。除胡适外，刘节在《历史论》中也曾说过：“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但象他这样既有时代背景，又有哲学基础与个人实践的却不多见。探寻张氏提出这一命题的原因，有助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二

为什么说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呢？张氏的论述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 5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当然，张荫麟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不是为了使史学为人民大众服务才考虑到读者的，而且他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之“演绎出来”（钱钟书语），但是即便从他对“一般读者”的重视出发，也对我们富于启发意义。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与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现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

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如此极端，但亦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⑫

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是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淪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学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张荫麟说：“历史者，一宇宙之戏剧

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经验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闻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罗素在“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十八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

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

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从隐喻的角度去谈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

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作语言的本质，这种不恰当的极端化理论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张荫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论断。诗的语言是隐喻化的。从历史发展先后来看，诗的语言先于逻辑语言：先有非逻辑思维，后有逻辑思维。从语言结构的横剖面来看，诗的语言同样比逻辑的语言在发生学上优先：现实人的言语一般不考虑逻辑规范。这些全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问题在于，当逻辑的代替了非逻辑的，非逻辑的消失了吗？应该说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通过艺术得到了升华与凝结。^①艺术就是诗，就是隐喻，就是语言的本质。倘若历史学也落在语言范围（符号是广义语言）之内，它可以抛开语言的本质吗？换句话说，历史学可以不讲究美学的价值吗？我们以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氏的论隐喻，才是深刻的，他无非是说：语言的隐喻性本质注定了历史学必然也是一门艺术。当然，我们只是提供一个理解角度，至于隐喻是不是语言本质，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以上三点是张氏论述历史也是艺术的主要根据。显然，还应补上艺术性的“想象”在历史释义中的作用一节，这在张荫麟看来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在理论上对此却未予探讨，毕竟是个遗憾。

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应该统一，由此必然引出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关系问题。张荫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是认识论上的二分法，他说：

吾人在于自然世界可视为审美对象，亦可视为穷理对象。其于历史世界也亦然。持审美态度以观物者，凝止于当前境界之全相而不求进；持穷理态度以观物者，即所见以求所未见。持审美态度者，随物所导，而不以智范物；持穷理态度者，厘划轸界，区别伦类，比较同异，而寻求通式。

这可视为张氏讨论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问题的认识论源头，由此引出的是：“持审美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艺术化之史；持穷理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科学化之史”。

这里我们应首先弄清一些概念的交叉性。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应该是问题的关键，由此引出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则牵涉到历史与艺术两大门类的各自特性及比较关系，张氏艺术化、科学化之史的划分，则把上述问题引到了史学门类内部。这些概念虽有交叉，但实质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作对应关系处理。

艺术的真实毕竟不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再现也毕竟不是艺术的表现。“穷理”与“审美”毕竟各有特点。张荫麟看到这一差别，并试图予以解答。他说：“今以历史与小说较，所异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现之境界一为虚一为实也。然此异点遂足抵历史于艺术范围之外矣乎？”不能。因为“相异”反过来正可证明其“相合”。无论“虚”还是“实”，无不以“真实感”为基础。历史的真实性直接造成真实感。艺术则复杂些，但“虚构”的一切无不在现实中立足，包括“龙”这样的“子虚乌有”的事物。这一点，张荫麟辨析得非常清楚。他说：

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就其总的而言，皆以显真。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

写神仙之图画，艺术也。写生写真，毫发毕肖之图画，亦艺术也。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之境界。

在此共同基础上，历史的个性在于“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整理”。历史个性的功能是“传迹”，却不构成完整的历史学，因为历史尚需“传神”。所以张氏又说：“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从一般认识论来看，包括文化在内的“多数人类活动”，均“非纯粹简单之智力所能识取其全体”，艺术表现的“传神”功能补足了历史“传迹”的科学功能，使历史学更上一层楼，不仅具有“骨骼”，尚具有“血肉”，成为自身个性与艺术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张氏说：“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⑥没有科学性，历史就会失真损迹，沦于艺术幻觉；没有艺术性，历史就会失神，失其神，亦即失其真矣。张荫麟曾注

解过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诗中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导。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⑩可移作对历史艺术性与科学性统一关系的形象说明。

张荫麟也曾以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关系，他说：

持审美态度之史家，其与史实之关系……，更切重之比对，其惟述史（就审美之史言）与写照乎？写照与摄影其目的皆在摹真。而异者，摄影于观点以外无所择，而写照则更有所择。写照与述史同者，其选择乃在细节之取舍而不在窳易。虽然，犹有未尽也。试想象一艺术家受约作一画像，而像主已死。彼所得而依据之材料为：一、前人所作观点不同之画像，皆残缺不全，其所余之部分大致相符合而略有悟者；二、关系像主之姿容举止不完备的描写；三、像主生前所用之器服若干。

知大艺术家之任务及其所受之限制，则知所谓艺术化的历史之性质矣。

艺术功能的引入，不是对历史学的背叛。艺术只要“传神写心”就够了，而历史却必须在此之外再加上“传真写迹书事”的功能。在此意义上说，历史不但不象亚理士多德说的那样地位比艺术低，而且比艺术高明。它高于艺术的因素又是艺术传达给它的。古人所谓文人不能写史而史家必须通文观点，不能不说比西方古代学者的论述高明，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处理历史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这样说来，专守历史的科学性的态度就不免还是对历史地位的贬低了，而张荫麟对历史艺术性的强调，至少从史学理论层面来说，是否还在于提高了历史学自身的地位呢？

张荫麟一向被人视为“梁任公学术志业之传人”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⑪他对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的探讨，立脚点在历史哲学而不在艺术哲学，大体相当于冯友兰所谓“释古”一派。他本着“中庸”的原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寻求史学的契合点，认为“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是值得肯定的史学理论命题，对当今的史学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① 李新：《文与史》，《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⑤ 《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1日。

③ 《古史辨》第2册340页，《胡适文存》2集1卷2页。

④ 参观M·怀特《分析的时代》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⑥⑦ 钱钟书：《管锥编》第12页，第25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⑦ 参观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⑧ 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第181页注⑥，三联书店1987年。

⑨⑫ 《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1日，第18期，1943年1月1日。

⑩ 《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

⑪ 《张荫麟文集》第452页，台北1956年。

⑬ 《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1932年7月25日。

⑭ 参观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57页，三联书店1988年。

⑮ 《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论衡》第62期，1928年8月。

⑯ 《燕京学报》13期、15期，1933、1934年。钱钟书《谈艺录》第26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

——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周炽成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

“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①可见，新儒家通过“返本开新”表达双重愿望：一方面重建自五四以来遭到根本性毁坏的儒家文化，以此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之本；另一方面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等内容。“返本开新”实际上就是他们常说的“内圣外王”。这是第二代新儒家最感兴趣而又讨论得最多的大问题。

有理由认为，返本开新的思路是顺着中体西用而来的。持返本开新的新儒家，与持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两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等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

（一）道德自足。港、台新儒家跟洋务派一样，不认为中国一切原有的东西已绝对完美，而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已足够完善，无任何缺陷，中国人只要弘扬它就行了，不必引进、学习西方的道德。张之洞说：“我国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②“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③港、台新儒家也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④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⑤他们的著述，大都是为了阐发由孔孟开其端、而由宋儒大为发展的心性之学的。虽然心性之学的内容比较复杂，但归结起来，无非是道

德修养方法、人性论一类的东西。新儒家承认中国文化的不足，但这些不足都只是表现在“外王”的方面，如缺乏科学和民主等，而非“内圣”（心性之学）的不足。所以，不能把中国传统道德看成是一些简单的外在行为规范的条文，而应从深层去理解它。正因为如此，新儒家以天人合一为根据来论证中国道德的宗教超越性。在他们看来，德性不是简单的道德规范，而是深沉的“天命”、“天性”。跟宋儒一样，他们反复阐发“尽心，尽性，知命，知天”、“性理即天理”、“人性即天性”等命题，认为儒学是一种宗教，但它不同于西方的崇拜人格神（上帝）而又与人性相敌对的基督教，而是一种既有“天”的意义又与人性相一致的“人文教”。可见，新儒家是沿着洋务派极力维护传统道德的路往前走的。

（二）道德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价值。洋务派认为，道本器末，而中学为本，西学为器；中学是根本性的，西学是辅助性的。张之洞指出：“中学为内学，而西学为外学”，^⑥李鸿章也认为，仿习机器办洋务，乃是治标的权宜之计，并非治本的长久良方。^⑦这些说法都明显体现了洋务派的价值取向：重道轻器。所谓道与器、本与末、内与外、体与用，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精神文明（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用这两种文明来概括东、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非常盛行。面对西方的强大冲击，中国人需要通过强调自身原有道德的价值来取得心理平衡；中国虽然在器物方面落后，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有悠久而良好的道德传统。

港台新儒家同样坚持这种逻辑。牟宗三指出：“我们普通泛说的‘我’，可分为三方面说，即一、生理的我；二、心理的我；三、思考的我。……此一、二、三项所称的我，都不是具体而真实的我。具体而真实的我，是透过实践以完成人格所显现之‘道德的我’，即我之真正的主体。”^⑧可见，新儒家非常强调道德生命高于形质生命和认知生命。他们之所以以拯救、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为使命，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人的道德生命体现在中华文化传统之中。若把一个民族的道德生命摧毁了，也就是把一个民族的根基挖去了。

新儒家虽然不认为道德价值是唯一的价值，其他价值都毫无意义，如他们深知宋儒过重“内圣”，而在“外王”方面做得不够，因此，主张引进西学来补此不足，即所谓开新或“新外王。”但他们坚持新外王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开新离不开返本。中华民族之本（儒家道德）在开新中不能动摇，而应加固。在他们看来，五四提倡的科学和民主之所以没能在中国生根，就是因为那时激进的人不仅没有返本，反而要把本摧毁掉：“陈独秀等一方面标科学与民主之口号，一方面亦要反对中国之旧文化，而要打倒孔家店。这样，则民主纯成为英美之舶来品，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是无根的。”^⑨只有从中国固有的内圣中生出的外王才是有根的。因此，无论如何，道德价值都是最高的价值，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

（三）强烈的道统意识。道统是指儒家的传道系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董仲舒、韩愈、宋儒”，这种传道系统为洋务派和新儒家所公认。孔子以后，

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的道统意识都具有几个特征：讲究儒与非儒之辨，以儒家为正统，而非儒家为异端；突出孔子的地位；宣传道统者有高度的卫道使命感，把自身作为世代相传的道统继承人。

张之洞指出：“盖圣人之道，……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清，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的。”^⑩ 儒道为圣道，是尽善尽美的。其他流派的有用之处早已包含在儒学之中了；而它们的流弊，则只为其各自独有，儒家绝无之。相比之下，新儒家对其他流派的态度似乎要宽容一点。但他们仍然以儒家为正宗，而以其他流派为“旁枝”、“暗流”。他们要坚决维护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地位。牟宗三要求以儒家为基准来进行“判教”，“判教首先是对基督教而言，其次对佛教而言，其次对道家而言。”^⑪ 他不反对信仰自由，但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时刻不忘维护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不反对基督教、天主教，但反对拿基督教来篡改中国的文化，反对把中国历来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传统改成耶和華、摩西那一套。^⑫

在突出孔子地位这一点上，新儒家比洋务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张之洞说：“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⑬ 新儒家也竭力把孔子塑造成比其他任何教主都伟大的教主。唐君毅盛赞孔子是圣中之圣。他认为，穆罕默德、释迦、耶稣等都只是“偏至的圣贤型”，唯独孔子是“圆满的圣贤型。”他坚决反对把孔子看作先秦诸子之一，看作一哲学家、教育家，而主张把孔子看作先师、至圣、圣哲，看作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伟大与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伟大与崇高，……谁侮辱孔子，即无异侮辱中国一切崇敬孔子之历史人物，亦是对中国民族之文化生命之侮辱”。^⑭

新儒家与洋务派都对继承儒学道统负有高度的使命感。曾国藩之所以镇压太平天国，卫道精神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视洪秀全信洋教、毁孔像、烧诗书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变。”张之洞的《劝学篇》，同样充满了卫道精神。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和康梁的维新运动分别激起了曾国藩和张之洞的卫道勇气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卫道勇气则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的。新儒家所面临的道统之受冲击，其深度和广度要比洋务派所面临的大得多。他们拯救道统的气度也因而更大。他们不怕孤立，不怕“保守”“顽固”、“民族本位”等责骂，为儒学复兴而著书立说，大声疾呼。

三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承接洋务派，另一方面又超越了洋务派。

首先，新儒家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而洋务派则把这些东西视为“洪水猛兽”。张之洞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⑮ 民权、平等诸说是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的：“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⑯ 与此相反，新儒家却积极倡导这些“异端邪说”。他们承认，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是中国文化历史之一大缺陷。他们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反对它所提倡的民主精神，只是反对它将民主精神与中国文化

传统对立起来。新儒家认为，民主宪政是“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要求”，^{①7}道德上的主体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主体性；儒家思想中本来就包含了很多民主的种子，不少制度也符合民主精神。

由于新儒家承认民主的价值，他们在理解儒家道统时，便与洋务派有不同之处。洋务派所理解的道统是与专制主义相联结的，道统与政统不分，君师合一。如张之洞说：“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①8}而新儒家理解的道统，却与专制主义无涉。他们千方百计把道统和政统分开，把君和师分开。在他们看来，儒家道统不仅与专制主义无关，而且是限制、批评专制主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徐复观指出：按“文化”一词的原来意义，道统是文化，而专制政治是反文化的；孔子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帝王或宰相被列入道统之中，因此，不能说因为专制政治被打倒了，道统也要被推翻。^{①9}但从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历史来看，新儒家把道统和专制政治分开的看法，则难圆其说。

此外，新儒家一方面追求民主，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另一方面，主张文化复归，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样，政治上的激进与文化上的守旧，使新儒家经常处在一种焦虑不安与自相矛盾的心境之中。

其次，新儒家对西方科学精神的理解远远要比洋务派深刻。洋务派最感兴趣的是能直接导致船坚炮利的西方技术，而对西方的纯科学却认识不深，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性。左宗棠曾说过：“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②0}这种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它只看到一面（这一面当然很重要），而看不到另一面：西方人也运智于虚，也以义理为重。西方的纯粹理性和逻辑的精神，超越价值和功利意识的客观精神，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这些“虚”和“义理”的东西都是洋务派所没有看到的。而新儒家则对它们深有体会。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历来都是重实用技术的，但却缺乏一种超越实用动机与道德价值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西方科学精神，实导源于希腊人之为求知而求知。此种为求知而求知之态度，乃是要先置定一客观对象世界，而至少在暂时，收敛我们一切实用的活动，及道德实践的活动，超越我们对于客观事物之一切利害的判断，与道德价值之判断；而让我们之认识的心灵主体，一方如其所知的客观对象，所呈现于此主体之前之一切现象；一方顺其理性之运用，以从事纯理论的推演；由此以使客观对象世界之条理，及此理性的运用中所展现之思想范畴、逻辑规律，亦呈现于此认识的心灵主体之前，而为其所清明的加以观照涵摄者。此种科学之精神，毕竟为中国先哲之所缺”。^{②1}在中国传统中，由“正德”直接过渡到“利用厚生”，在两者之间缺少一个中间媒介：理论科学知识。为补上这一环，新儒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道统”和“政统”的“学统”。这种要求与他们的过分注意道德作用的“泛道德主义”形成尖锐的冲突。他们一方面要外王建立在内圣的根基之上，外王不能脱离内圣，另一方面又要科学（外王的重要内容）独立于道德（内圣的关键）。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

再次，新儒家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而洋务派却对此所知甚少并有抗拒情绪。张之洞说：“不可讲泰西哲学……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名家相近，又出入于佛家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②可见，洋务派对西方哲学所知非常皮毛，并有严重的反感之情。与此不同，新儒家对西方哲学非常熟悉，而且不乏敬意。唐君毅早年为学，先从西方哲学入手，饱览各家著作，深受詹姆斯、英美新实在论及布拉德雷、康德、黑格尔的影响。牟宗三也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是“西方近世学问的两大骨干”，是“人类智力之最高成就。”^③新儒家从研习西方哲学中得益甚多。正是根据其良好的西方哲学素养，他们对儒学和中国文化作出了新的解释。这点不仅使它们远远高出洋务派，而且也高出宋儒大家。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给他们弘扬儒家道德的主体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黑格尔的历史精神则使他们深信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新儒家经常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互比较、相互衡量、相互引证。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儒家学说，得西方哲学之助，更加明朗清晰。而西方哲学家言，因其移植吾国，更得以发荣滋长”，而且，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互交流与贯通，还可能产生一“交配后之新种。”^④学贯中西的背景使新儒家走上了一条中西结合的治学之路。

三

从以上新儒家与洋务派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是沿着洋务派的路子往前走的。从洋务派到新儒家，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步步后撤的趋势。当洋务派的“西用”演变为新儒家的“外王”时，实际上“西体”的相当一部分（民主政治及其观念）已被中国的文化保守派所接受。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在扩大，而固守的“中体”在缩小。新儒家坚持的“中体”已不包括专制政治及其观念，而只剩下中国文化中最坚固的内核——儒家道德。其实，即使是这一内核，也已被新儒家改造过了。

新儒家对儒家道德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他们想方设法摆脱儒家道德与专制政治的牵连。如果客观地看，三纲、名教、卑尊意识等等，无疑属于儒家道德的范围，而它们所包含的政治专制主义和家族专制主义精神却是很明显的。可是，新儒家却认为，政治化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真正的儒家是站在天人之际恢宏、深沉地谈论心性之学的，宣传独立、平等、民主意识的，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限制君权的儒家。这样的儒家究竟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还是新儒家按西学打扮过的？把他们的著作和孔孟、宋儒的著作比较一下，便一目了然。虽然新儒家实际上改造了儒家道德，但又不承认儒家道德需要改造。这种矛盾，正好说明他们不想放弃洋务派的逻辑——道不变。

在顽固派占绝对优势，国人一般不知西学为何物的19世纪后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以及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确实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中体西用在理论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这点，严复早已指出过。它在实践上也碰到重重困难。由于未能摆脱洋

务派“中体西用”的困扰，新儒家不恰当地抬高了传统道德（“中体”的缩小）的作用，成为道德决定论者。他们反复强调，返本的内圣决定开新的外王。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民主仅仅被理解为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要求和维护中国传统道德的手段。按照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洞见，新儒家本来不应只视民主和科学为“西用”的。事实上，当他们暂时不带“卫道”意识，冷静地考虑问题时，他们确实能够发现西方科学和民主对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真正意义，看到它们不是简单的“西用”。他们要求建立独立于道德和政治的“学统”，要求以民主的“对列之局”取代专制的“隶属方式”，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一旦负起“卫道”使命，他们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一切科学之价值，都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由此而我们之主张发展中国之科学，便完全是从中国文化中之仁教自身上立根，决非出自流俗之向外欣羨之情，或追赶世界潮流之意。”^⑥这样，科学就只是发展仁教的手段，他们便把自己主张的建立独立的“学统”的思想否定了。

新儒家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化与哲学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刻的体会。他们所走的中西结合之路，代表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大方向。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中西结合。在我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优越感、以某一学派为正宗这些包袱尚未完全卸下来之前，要实现真正的中西结合是很难的。正如殷海光在评价新儒家时说的：“他们深爱戴在他们心灵底层里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意识。那些代代相传的意识构成他们心灵的实体。……那些意识，分析到最后，无非是父亲意像，我族中心主义，及无上的历史文化声威要求。”^⑦这样的评价似乎有点苛刻，但都切中了要害。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强调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有必要的：面对世界，中国人的心胸应该更开阔些。中国是属于世界的，而不是属于儒学或孔子的。

①④⑤⑨⑩⑫⑬⑮⑲⑳㉑《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3、17、21、165、35、177、177—178、34、28页。

②③⑥⑪⑭⑯⑰⑱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

⑦《洋务运动》（四）第10页。

⑧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物质》台湾学生书局，第70页。

⑩见姜义华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传统文化（下）》第191页。

⑲徐复观：《中国文化的层级性》，《华侨日报》1961.9.22。

⑳《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十八。

㉑《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七。

㉒㉓《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3第278页，现代篇2第307页，台湾牧童出版社1987年版。

㉔转引自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第208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

裨 倩 红

广东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较早较广泛的地区之一。但至今仍未见有较全面、系统地论述这一课题的专文发表。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的早期传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至1921年初广东地方共产党组织成立前，为第一阶段。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和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广东来，首先为一批先进分子所接受；他们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以此指导开展一些实际活动。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东地区，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渠道。

(一)来自广东海员方面。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契机的。广东海员由于经常随船涉足世界各地，接触广泛，见多闻广，消息灵通。所以，他们很快就知悉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尽管他们对于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其伟大意义还不大了解，但当听说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及列宁的领导下，打倒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自己起来当家作主时，都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大好事情”，^①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迪。随后，苏兆征等不少广东海员到了海参崴等地，更直接了解到十月革命胜利的详细过程，再加上有机会阅读了有关革命书刊，眼界更为开阔，逐渐认识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当海员们日后返回家乡时，也就把有关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及所见所闻，在群众中介绍和传播开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有关消息也很快在

广东地区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如在广州发行的《广东中华新报》，连续报道了有关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俄国过激派已完全掌握俄都及莫斯科支配权”，“俄前内阁总理折麟士（按即克伦斯基）已完全失败”。该报还以赞颂的口吻说：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露西亚（按即俄国）之有李宁（按即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种异彩”。^②其他报纸，亦不同程度地报道了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这些报道同样帮助广东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从中看到了时代的新曙光和中国未来的前途。

(二)来自日本方面。早在十月革命前后，广东就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到西欧、日本等地留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如留学日本的彭湃、李春涛等，还参加进步团体“建设者同盟”、戈思摩俱乐部等，经常去听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课，“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③他们渐渐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中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这些留学生通过撰写书信、文章，或回国渡假等机会，向人们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人们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广东出版的一些报刊也刊登有关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的文章和消息，开阔了青年们的视野。如1991年间《广东中华新报》曾先后刊载过《日本人对过激派之心理》、《社会主义震撼日本》等文。

(三)来自国内北京、上海方面。1917年，广东籍青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到北京大学读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直接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下，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爱国运动，渐渐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变。谭平山还曾参加筹办《新潮》杂志，在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谭平山等人还经常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政衡》等进步书刊寄回广东给有关同学亲友，向他们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北京五四运动等方面的讯息。人们再辗转传播，日渐产生影响，使不少青年从中受到了教育。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谭天度曾回忆自己受谭平山等人的帮助和影响的情景：“使我对新思想新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对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起着巨大的作用。”^④

此外，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也象潮水般涌到广州”。1919年10月8日《广东中华新报》曾公开向读者推荐介绍当时国内各地出版的有关进步书刊，其中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解放与改造》等多种。

（四）来自苏俄方面。1920年，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人来到广州，以苏俄政府代表名义，在广州筹建俄华通讯社。以后，还有其他一些苏俄共产主义者相继到广东活动。他们在广州曾广泛接触各方面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等。“（他们）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⑤他们在广东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日渐传播，不断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在青年当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在广东地区的代表人物为杨匏安、谭平山、彭湃等。

杨匏安早年去过日本，较早接触社会主义。1916年回国后，继续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间，他以《世界学说》为总题，撰写了40多篇文章，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社会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东后，在陈独秀的支持和指导下，创

办了《广东群报》。该报先后发表了一批宣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并连续刊载《马克思一生及其事业》的长篇译文，成了广东地区早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东地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开始注意成立社团问题，作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如1920年底，谭平山等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面从事于学理的讨论，一面则从事于社会事业之运动”。^⑦1920年10月间，在日本留学的彭湃与李春涛、杨震嗣等，组织了一个“赤心社”，表示“一心学习俄国”。^⑧

广东地区先进知识分子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921年春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开始，至1923年底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和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广东党组织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广东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1920年12月间，陈独秀来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并兼负指导广东建党的任务。他排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与干扰，与谭平山等于翌年春天“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同年底，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亦着手重建，于翌年3月正式成立，申明“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⑨

陈独秀在广州居留期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仅1921年1月间，他就曾先后在广东高师等学校发表过多次演讲，大力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从1921年1月至9月，他在《广东群报》、《新青年》、《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共发表过40多篇文章、演说词和通讯等，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展开斗争。由于陈独秀等的努力，使广东地区不少青年逐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向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广东党团组织建立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首先是创办一系列报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广东党组织成立后，把《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1921年2月，广东党组织又创办

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同年，原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1922年2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了《青年周刊》。这些刊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开辟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方面的文章。此外，在广东党组织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版的刊物，如《新海丰》、《光明》、《珠江评论》及《新学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其次，加强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的出版发行。1920年9月间成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作为党的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康民尼斯特”丛书共数十种。新青年社迁来广州后，除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外，并继续出版“新青年丛书”，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广州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并迁回上海后，共产党组织在广州再成立了平民书社，加紧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再次，成立各种机构和社团，作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培养革命骨干的阵地。广东党团组织曾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等团体，以“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之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改造为宗旨。”^①1921年，广东党组织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②同年7月，陈独秀以教育委员会名义，在广州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借教师学国音字母的机会，趁机宣传进步思想”，陈独秀、谭平山等“都曾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③

在此基础上，广东党组织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开展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党的“一大”后，广东党组织在广州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派遣党员和革命青年深入工厂，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9月阮啸先等共产党员在广州创办了“爱群通讯社”。他们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同时结合组织工会农会，开展革命斗争。彭湃从日本回国后，随即在家乡海丰先后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劳动者同情会”等团体，创办《赤心周刊》，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农会，开展农民运动。

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广东地区革命实践的结合，促进了广东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来了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一批先进分子在积极宣传和参加革命实际斗争过程中，也进一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早期传播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伟大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因此，宣传十月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初期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11月7日这一天就是“共产党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二十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他既然有这样的价值，我们来纪念他是很有意思的了。”^④一些文章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认为“列宁（即列宁）的理想，是以社会主义实现为目的”，“布尔什维克在目的上，是纯然马克思主义，又是纯然社会主义。”^⑤一些文章还着重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苏俄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底情形简直和俄国一样”，“中国现在需要改造，已迫不及待了”，“（俄国）共产党的方法，可以当做一种过渡时代的手段，适用于中国。”^⑥“俄国人又是革命的成功者，我们中国革命的一切步骤，应当效法俄国，自然容易成功”。^⑦

（二）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初时对马克思主义很陌生。因此，系统地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基本原理，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初期的着重点。杨匏安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撰写的文章中指出：“我们欲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他作三个部分：一、唯物的历史观；二、阶级竞争说；三、经济学说。”^⑧他对这三个部分都作了简明通俗的介绍，使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1921年陈独秀在广东期间，也经常向青年发表演讲，指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如就社会主义问题通俗地讲了如下三个方面：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⑨他在演讲中还结合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帮助青年们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正是由于陈独秀和杨匏安

等人十分注重做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常识方面的工作，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的传播更有成效。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些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一方是有资本或土地等生产的手段的人，统称有产阶级；一方是受压迫掠夺的人，统称无产阶级。”“从来一切社会的形式，都建筑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劳动者实行阶级竞争，尤不可不夺取政权。”^②一些文章还明确地指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只有这个手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只有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普通的民主主义的目的。”^③

正是由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增强革命信心，从而为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打下思想基础。

(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思想。一些文章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④但是劳动者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肆意“掠夺劳动者血汗”。工人们“想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办法”，就要像马克思所说那样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府”，^⑤“使劳工专政实现”。

一些文章还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占重要地位，指出农民在中国占了“最大多数”，他们有“实力”，若觉醒起来，就会“震动天地”。所以“社会运动在都市固不宜轻视，而乡村尤为重要。”^⑥有些文章还明确提出工农联合起来斗争，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联合一切无产阶级，举行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由无产阶级跑到支配阶级的地位，”^⑦革命才能成功。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当时一些先进分子已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打倒共同敌人的思想，考察中国国情，主张国内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们认为：“各种产业的劳动者团结了，……进而为全国的总团结，进而为世界的总同盟。”^⑧“我们要在广东实行革命，尤其要推行各省，联络八方，无论旧革命党，新革命党，总应该大家携手，同革这中国的老命。”^⑨这

种各方面革命力量大联合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地区成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策源地和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

三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广东是传播较早，也较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无论从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播，以至由本地区报刊载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来看，都是国内较早的地区之一。如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与李达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都是同在1919年11月间发表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结合进行的。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流传较早，影响较大的地区。因此，广东共产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结合对无政府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神仙主义”，“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不受压迫”。^⑩从而帮助青年们和工人们初步划清两者的界限，向往社会主义，信奉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广东革命实际相结合。广东共产主义者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改造”，革命分子则要“参加实际运动”，做调查研究工作。为此，广东党组织经常组织党团员深入工厂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广泛深入，其影响更加深远，更富有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能在广东较早、较广泛地传播，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一)广东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地区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资本家便在广州、香港等地投资经营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等，从而诞生了广东乃至全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随着广东地区的外国资本企业、清政府的官僚企业和军火工业，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成长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⑪广东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

压迫剥削，因而很早就奋起进行反抗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进行，工人阶级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并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组织。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 广东的地理位置与较为开放的政治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广东面临南海，与海外事物接触较早较多，容易受世界革命潮流的促进，也易受西方各种思想潮流的影响。广东又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与内地相比较，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深，民主自由气氛也较活跃。特别是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广东更呈现了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各种社团得以公开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可公开进行。正如一位从外地来广州的人士说：“社会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固然都设有机关，但是能如广东这样海阔天空，极好活跃的地方，怕不多见。”^⑨这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的结合。

(三) 五四运动之后，广东地区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作出了贡献。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也曾不同程度地受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当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经过认真比较，毅然接受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值得指出的，在此期间陈独秀曾先后三次来到广东，对于马克思

主义在广东地区的传播，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广东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更进入了广泛深入地传播的阶段。

- ① 据老海员黄养、刘达潮的回忆资料。
- ② 《广东中华新报》1918.9.14。
- ③ 《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 ④⑫ 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谭天度诗文集》。
- ⑤ 《谭祖荫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
- ⑦⑬⑳ 《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19、28—29日。
- ⑧ 李考则：《彭湃同志在日本》（未刊稿）。
- ⑨⑰⑱⑳㉑ 《青年周刊》第4号。
- ⑩ 即“共产主义”的英文音译。
- ⑪㉒ 《青年周刊》第2、3号。
- ⑬㉓ 梁复然：《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及初期的工农运动》，《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 ⑭⑯㉔ 《广东群报》1921年1月15—31日。
- ⑮ 《广东群报》1920年12月6—21日。
- ⑲㉕㉖ 《青年周刊》第6号。
- ㉗ 《青年周刊》创刊号。
- ㉘ 《共产党宣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110页）

道出了包括“浪仙”在内的一群江南才士对于人生道路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浪仙氏，这位名动一时的江南才子，终于带着一腔愤懑，满腹才情，早夭而去，空留下身后这山庄别业、是是非非……

而随着星换斗移，岁月流逝，佘山当年的景致亦已荡然无存。如今，佘山上耸立着我国目前口径最大的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和25米射电望远镜，它的视角正伸向茫茫的宇宙、浩淼的太空。但是，它却无法回视脚下的历史，无法探寻佘山的过去。只有那古老苍劲的佘山，亲眼目睹了此地的沧海桑田和人世间的陵谷变迁，它才是历史的真正见证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贵在开新 贵在探索

——读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

吕 由

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末康有为借今文经“托古改制”，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并一直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一现象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但是在这一文化思想现象结束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部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这一现象的史书，却迟迟未见出现。这并不是因为几十年来国人忽视了这一现象，而是因为经学体系过于庞大，涉及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有深层的影响，以至在短时期内后人无法去准确把握和反映它，所以一直阙如。今天，在“文化热”的继续辐射中，我们终于看到这一领域的新突破，这就是章权才著《两汉经学史》的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版）。本书试图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分析、整理、揭示中国经学史的丰富内涵，追寻它的发展规律，在探索中开新，在开新中探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读罢，不禁想赘上数语，也作“门外经谈”。

西、东汉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第一阶段，也是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被确立，经学的基本内容被确定，经学的基本派别也相继出现，这为后世的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因此，写好“两汉经学史”，是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我觉得《两汉经学史》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些思路，提法和结论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重视对经学思想揭示

汉武帝“独尊儒术”其根本目的在于政治上巩固封建皇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作为“经”，主要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现，包括社会理想境界和达到这一境界的一切手段，以及由此而

来的价值体系、是非标准；而经学的任务则在于对孔子这些理论的阐发以及将这些理论贯彻到社会生活之中。因此，经学无论从统治阶级的意图还是自身的内涵与使命出发，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出现，其特点是思想性极强，以至我们可以说离开了思想内涵，经学也将不复存在。作者正是有见于此，所以紧紧抓住经学思想这一线索进行铺排，从而较好地将两汉经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出来。综观全书可以看到这么两条线索，一是政治家对经学的利用线索，一是经学家（也可以说是思想家）对经学的阐发线索。前者从汉武帝开始，继而是石渠阁经学会议、王莽的复古改制以至白虎观经学会议等；后者则表现为董仲舒对今文经的阐发、刘歆对古文经的提倡以及何休重振《春秋公羊》学和郑玄对今古文学的综合。全书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的穿插演化来阐述两汉经学的发展，从而突出经学思想的。使读者从中看到两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看到经学在各个发展时期的主要思想倾向及经学是怎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者在本书《自序》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将经学思想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将其与物质资料的占有联系起来，从

物质关系的观念出发去揭示它的内涵及其发展倾向，这无疑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结论无疑也是正确的。过去有些经学史方面的著作，由于时代局限，作者多致力于经学形式上的递嬗演变，对经学思想的揭示却极不注重，因此难于满足时代的需求。相比之下，《两汉经学史》在这方面的突破，是值得肯定的。

（二）注意社会政治势力对经学发展的作用

社会政治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既然是经学的主要内容，那么，经学的发展当然也受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为政治需要所支配，这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顺理成章的。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和秦统一后的强制政策下，六国贵族势力大大受到削弱，而刘邦以一介平民而建立西汉皇朝，这时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是中小地主集团。因此，“独尊儒术”之初，经学主要代表这一集团的思想 and 政治欲求。如董仲舒，他在《春秋公羊》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思想，提倡用“德政”改良社会，反对土地兼并，而既采用阴阳五行说来维护刘汉政权的正统地位，却又通过“天人合一”说来约束皇权，使之能顺应中小地主的政治需求。但是，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到了西汉末，一种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经学逐渐抬头，并且渐渐取代原来的经学（即今文经学），这就是古文经学。最后，由于王莽的干预，古文经学几乎完全占据统治地位。这时不再讲“托古改制”，而是讲“复古”，任官制度上也针对今文经学的“无世卿、有选举”而一变而为“有世卿、无选举”，主张世卿世禄制。光武帝因为古文经学与王莽的关系而将其废除，但是，由于世家豪族已占据统治地位，连光武帝都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重建汉朝的，因此这种废除只是暂时的，结果东汉经学仍是古文经学的天下。到了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中的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为了更好地对付农民阶级，只好联合起来，暂时调和自身的矛盾，因此经学表现出今古文学的合流，于是出现郑玄的综合学说，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经学。《两汉经学史》的作者基于经学的阶级（阶层）性，着力从阶级（阶层）利益出发，对两汉经学发展的动因作出上述解释，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经学放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并暂时离开经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而特别强调外因的作用，则这一解释的思路对读者显然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而同时也不失为一种颇具个性而有价值的见解。

（三）注重对经学大师作系统的介绍

作为一部经学史，《两汉经学史》在纵向叙述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横向剖析，这主要表现在对经学大师的系统介绍上。

董仲舒是西汉初年的经学大师，了解董学，对了解西汉前期的经学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作者在书中对董仲舒的社会出身、思想渊源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董学展开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对董学的社会背景、思想内涵、思想意义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作者指出，董氏在经学发展史上有四大贡献，一为“推明孔氏”，二为“抑黜百家”，三为“立学施教”，四为“通经致用”。通过上述四方面的论述，早期经学的发展趋向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作者对刘歆、何休、郑玄等经学史上的重要大师也都一一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而这些经学大师们往往处于经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上，因此，越是能将他们的思想及活动作系统反映，就越能全面地揭示经学发展的契机及脉络。从这一点看，可以说作者善于抓住要点，画龙点睛，从而获得较好的效果。

二

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儒家典籍烧得一无二净，以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已经找不到一册这类书籍。所以只好由旧日的儒生将背时记忆的经文记录下来，重新整理成书，以应急需。儒家这些典籍被朝廷奉为经典，一方面带来了经学的发生、发展和一时繁荣，但另一方面也为它的迅速衰落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一种理论一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也等于被完全孤立、封闭起来，在得不到新的思想和方法补充的情况下，自然与实际相去渐远，最终成为极其烦琐而又脱离现实的东西。西汉今文经学走的正是这么一条路。但是，今文经学确有它不幸中的万幸，那就是当它趋向衰落时，古文经学异军突起。表面上看，古文经学排斥了它，实际上则是古文经学挽救了它，使它虽然衰落而不至于完全消亡，以至到了清代仍有人想为它重整旗鼓。

古文经是儒家典籍的遗留古本，当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逐渐在民间和旧宅址中发现。当时口传的今文经正威风八面，刚刚面世的古文经当然不被当局重视，何况它还羽毛未丰，缺乏竞争力。经过在民间的传播和一些学者的整理、阐

发，它终于成熟起来，而正好今文经学已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它乘机而起，用它的新思想（复古倾向）新方法（训诂）取代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这一现象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社会政治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从经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看，一个缺乏生命力的学说被一个具有新意的学说所替代，也是必然的；再说新形成的社会政治势力对理论的选择，本身就是以这一理论的生命力强弱来决定的。因此，古文经学替代今文经学首先应该被看作是经学内部运动的结果。

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这一历史现象，过去在经学界争议颇多，经学家多数各自站在今、古文学的不同立场上互为褒贬。今天，我们可以完全摆脱那种门户之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峰去俯视这段历史。上文提及，今文经学自身的弊端导致了自己的衰落，假如这时没有古文经学的出现，那么今文经学将象彗星一样在人们面前闪烁一阵便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古文经学的出现如同一颗具有强大引力的星体，将即将远去的彗星拖住，造成二星争辉的局面。以后虽然古文经学光芒较强，但今文经学也还能保持一个若隐若现的地位，并由此构成东汉经学的历史现象。而从辩证的观点出发，没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熟，并且一旦失去了对立面，它也将很快走今文经学没落的老路。因此这里并无扬古抑今的偏颇，而是想借此提出几个问题，即当经学只在今文学或古文学的轨道上发展，两汉经学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而在此基础上又出现第二个问题，即两汉经学的那种繁荣，如果离开了经今古文学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争与互补，是可能的吗？然后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经

学之分为今古文学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是不幸还是万幸，我们应如何看待？所以，当我们在分析经今古文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具体方法时，对它们之间的转承联系应该予以重视，并从经学的总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它们，而不是从今文学或古文学的角度出发去孤立地看待另一方面，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揭示经学的内在及其发展规律。

应该说，《两汉经学史》对上述所及已有相当的注意，只是略嫌表述轻了一些。另外，书中谈及古文经学与王莽关系时讲到，“王莽把古文经推上显赫的位置”，“其结果，古文经学便大摇大摆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又说“为王莽、刘歆所看中的《周礼》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呢？东汉后期的经学家何休曾作了这样的回答：它是‘六国阴谋之书’。这个回答是有一定道理的。”上面已经讲到古文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假如当时的人们对与今文经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的古文经熟视无睹，那倒是一件怪事；而只有当它被考究发微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力，也才谈得上王莽的利用，前者显然是经学这一学说的内在发展的必然，而后者则是社会政治势力对它的利用。我们既要合起来看，也应该分开来看。何休是今文学家，对《周礼》的评价难免存在门户之见。宋代王安石变法与《周礼》多少有些关系，“六国阴谋”怕就联系不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结论仍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经学史应该怎么写，对经今古文应该怎样看等等未必只有一个模式、一种见解，学术界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两汉经学史》的确是迄今唯一的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阐述中国经学史的尝试之作，其开新的探索精神，显然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凌峰

民族凝聚力刍议

林佐良

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特征，首先涉及什么是凝聚力和什么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如能就此作一般性的概括，无疑有利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内涵、特征的深入探讨。

凝聚力原是物理学的概念，指物质结构中同一物质内部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间的内聚力和相互吸引力。这显然是自然界现实的一种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是可以依靠科学手段得以增强或削弱从而进行测定和度量的。

凝聚力概念引进社会科学领域，用于认识人类社会的事物和现象，较早见之于社会学、管理学的群体行为理论，有所谓群体凝聚力概念。这种理论认为，群体凝聚力表明群体对于成员的一种内聚作用，是表现在群体成员身上的向心力。^①民族凝聚力自然是群体凝聚力的一种。民族作为群体，将区别于其他群体而有自身的特性。要认识和把握这种群体的凝聚力，在方法论上可以有多种学科的方法，如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但如果对它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则首先要从哲学的层次进行概括和抽象，需要从最一般、最本质的方面去把握其内涵和基本特征。下面就民族凝聚力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本质和作用

什么是民族凝聚力，需要从它所指对象的范围说起。民族与民族凝聚力是相互联系、直接相关的二个范畴。从哲学意义上说，任何事物在范畴归属上有二大类：一类是存在、物质、客观、客体、实践、实际等，属于物质范畴；一类是思维、意识、精神、主观、主体、认识、思想等，属于精神范畴。按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观点，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则是物质发展到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以后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决定于物质。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既是物质，又是精神，同属两个范畴的事物是没有的。民族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存在，毫无疑问它属于物质范畴。民族凝聚力归属于物质还是精神呢？有些学者提出，它似乎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作为构成民族的一种物质要素参与民族的整合，但这在历史上是从未得到实证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从未发现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形态。构成民族的，有生物的、

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要素，它们无疑在民族的整合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影响着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但它们毕竟并非民族凝聚力本身。民族与民族凝聚力，构成民族的要素条件与民族凝聚力，显然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不同事物，把民族凝聚力说成是物质的东西，这无异于把它们直接等同起来，在逻辑上就难于说得通。民族凝聚力和其他群体凝聚力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蕴藏于民族成员头脑中思想观念的东西，它作为一种社会的群体心理和群体意识，又不是先验的、独立自在的。不是先有民族凝聚力才有民族的存在，而是先有民族的存在，才派生出民族凝聚力。它显然决定和依赖于民族的存在。它的实质是民族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民族凝聚力正是民族内部整合、团结状态的精神反映，是维护民族生存、抵制民族分裂、促进民族繁荣的精神力量。具体来说，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合力，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民族整体对于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二是民族成员对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这说明民族成员并非被动地受民族整体的吸引）；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这种合力主要通过民族成员的共同心理素质和行为倾向得到具体表现，它属于精神范畴是比较明显的。民族的整合和存在既然产生了反映这一客观存在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就必然反作用于这一客观存在。民族存在对民族凝聚力的决定性，就意味着民族凝聚力对民族存在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仅表现为改善民族整合状态、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心理准备和行为倾向，更突出表现为它是把这种心理、意识和行为倾向付诸实践的一种动力；最终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形成新的民族整合的要素条件，在新的民族整合过程中，强化了民族的团结状态，促进了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也就是说，民族凝聚力改造了民族存在。同时创造了新的民族存在，但这种人造的“民族存在”已不是民族凝聚力本身，我们不能把作为精神力量的民族凝聚力和它在实践中的物质转化直接等同起来。

二、关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文化特征

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群体凝聚力，它和其他群体凝聚力的明显区别，是它的精神文化特征。群体有组织态群体和自然态群体二类。民族属自然态群体。民族群体明显区别于国家、政党、社团等组织态群体，无需靠一定的组织目标、组织手段和组织规范才集合成群。在自然态群体中，民族群体又有别于生物群落，无需过分依赖于共同要求的生态环境。民族群体实际上是历史上自然形成并发展变化的人类共同体。它不是靠主观愿望而人为地组合，它的组合主要靠共同体中人们思想、心理上的认同。这种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该民族的共同的精神文化。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构成民族的因素有“四个共同”，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在此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是精神文化的因素。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不少学者在论述民族概念的时候，也都非常重视其精神上的特征。有的说民族是“精神的、情操的人种共同体”，是“文化的种族共同体”；有的说民族是“具有健全精神和热情之心的人类大集团创造的一种道德意识的东西”；有的说民族是“命运共同体结成的一种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总体”；有的更是直接把它说成是“精

神文化共同体”。^②由此可见,民族的形成和整合,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虽然不能排除经济的、地域的、政治的因素,但它主要依靠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应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源泉,作为反映民族群体存在的民族凝聚力,必然具有显著的精神文化特征。

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文化特征要通过民族成员内在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倾向才得以具体反映出来,这却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心理、意识过程。它大致可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心理认同层次。它包括归属感。这是处于感性和自发阶段的民族凝聚力。在民族成员身上,可以说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归属感是自觉不自觉地普遍存在的,它更多地带有感情、情操等非理性色彩。这种民族认同心理的形成,当然与构成民族的人种的、血缘的、地缘的因素分不开,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定势和文化模式的反映,更多地依赖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传统。只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影响,就可强化民族认同的心理过程,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第二,意识觉醒层次。具体来说,这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心理基础上的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是更深层次的、处于理性和自觉阶段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有二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和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它要求本民族要真正成为独立发展的实体,并努力营造维护民族生存、发展的优势和实力。它要求建立积极的、自觉的自我认识 and 自我评价的思想体系,在民族交往频繁的开放时代,既能抵制外民族同化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又能自觉清除本民族内部的离散因素。提高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要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要树立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就要靠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二是积极的民族忧患意识。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民族自省精神。它排除了夜郎自大的封闭观念,把本民族的自立、自强,着眼于面向世界和未来,建立在开放、比较、竞争的基点上。总之,处于意识觉醒层次的民族凝聚力,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一种人文力量,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觉醒程度的标志。第三,行为倾向层次。具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维护民族生存,反对民族分裂,实现民族发展的动力体系。它是民族凝聚力心理认同层次和意识觉醒层次的动态转化,是民族凝聚力最具能动性的层次。它是达到民族凝聚一定目的的实践准备过程,它包括目的、动机、意志力等因素。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只有付诸行动,付诸实践,才能反作用于民族存在,达到能动地改造民族存在的目的。由民族凝聚的心理意识过程激发出来的行为倾向和行为冲动,就是民族凝聚力付诸行动和实践的动力源泉,也是民族凝聚力在实践中“物化”的重要条件。民族凝聚力的三个不同层次又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它完整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

三、关于民族凝聚力的包容性和辩证同一性特征

民族凝聚力的包容性指其可容纳的量度,实指其发生影响和产生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民族凝聚力和民族一样,是历史范畴,它从民族形成到民族消亡的历史时期,一直以精神的能动作用维护民族的生存,推动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它的包容性是相当大的。从空

间上讲，它要求民族内部的各种成分、各类群体在共同基础上以民族大义、民族利益为目标团结、凝聚起来，这就意味着它代表民族内部各种成分、各类群体的共同利益，从而促使各种成分和群体的统一和联合，诸如一个复合民族中各个民族成员的联合；民族内部各阶级、阶层、社团力量的联合。从时间上讲，民族凝聚力具有历史承继性，但又绝不固守传统，而力求面对现实和未来，有所创新和发展。它包容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凝聚力。

但是民族凝聚力包容性所要求的团结、联合和统一，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它具有辩证同一的性质，其辩证同一性的主要表现形态是：

1. 民族凝聚力所体现的民族内部各种成分之间的内聚作用和相互吸引的趋势，是以各成分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为前提的。民族凝聚力所要求的同一，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同一，而是以承认和正视各成分间矛盾差别为前提的同一。如一个复合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所要求的统一、同一，就是以尊重和保留复合民族内部各民族特点、特色为前提的，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文化基础上的联合和统一。又如民族内部阶级的差别和阶层的差别，一般说是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民族凝聚力并非要取消这种差别，而是恰恰以承认这种差别为前提。在阶级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民族凝聚力并不抹杀和取消这一矛盾和斗争，而只是承认在民族的统一体中，这一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仍然具有同一性。仍然具有不受阶级偏见局限的人种的、血缘的、地缘的、人文的共同基础。每当受到外民族的欺凌、侵略，面临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时刻，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将高于一切，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将让位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时民族凝聚力则要求各阶级、阶层同仇敌忾，消弥歧见和政争，为一致对外而实现内部的团结和联合。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最后解放，最终有赖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最后胜利。那个时代，必将是国家、民族走向消亡，民族凝聚力逐渐消失的时代。

2. 从哲学上说，矛盾的对立双方都是互为前提的。因此民族凝聚力要以民族离散力和离散因素的存在为前提。民族凝聚力所体现的统一和同一，是对立和斗争中的同一。民族凝聚力反映着民族的团结、整合状态，民族离散力则反映着民族的分裂、解体状态。民族的存在因素与民族的消亡因素的对立统一决定着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散力的对立统一。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绝对的民族凝聚力。它始终在与民族离散力和离散因素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变化着。一个民族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必然要抵制和克服离散因素，旧的离散因素克服了，民族凝聚力增强了，必然面临新的离散因素的挑战。一个民族的离散力和离散因素中，最本质的就是民族内部的离心倾向，这是本民族的主观因素，它是民族离散的内因。外民族对本民族的同化影响则是民族离散的外因，它要通过本身的离心倾向才能发生作用。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散力的矛盾，最终将跟随国家、民族的消亡过程而逐渐消失。

(下转第58页)

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

肖君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以六个环节的形式存在着的。这六个环节分别起着社会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内在根源、前提条件、具体表现、功能效应的作用。本文拟对这六个环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一些考察，并从中引出一定的结论。

一、社会历史根源：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

大一统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或传统的社会历史结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历史根源。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我认为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所稀有的伟大的贡献。”^①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国家分裂局面，即使是分裂了二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只是暂时的，到头来还是复归于统一。中国历史表明，国家分裂的局面没占多长时间，而国家统一的局面占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结构是以大一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历史结构。这种社会历史结构能维持几千年之久，在世界上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这种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在人们心理上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单向性的思维框架”。^②在这种思维框架的制约下，人们总认为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即天下为一，中华一统，视统一为安，分裂为危。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因而，维护或者恢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抵抗外敌入侵，一直被视为民族大义的最高表现。谁要是在维护或恢复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立了大功，谁就能成为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因而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谁要是破坏统一，反对恢复统一，制造分裂，谁就会成为民族罪人，遗臭万年。总之，“大一统的单向性思维框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要的价值取向，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强有力地左右人们的思想，成为几千年来人民意向的主流，正因为有了这股主流，中华民族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统一力、凝聚力。然而，这种思维框架源出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反映。由是，我们认为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思想根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根源。除单向性的思维方式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和谐统一性有助于人际关系和谐化，而人际关系的和谐又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种主张和谐统一性的中和主义思维方式追求公正，平允、协调、互补、平衡稳定和自行调节，讲究谦和忍让，就其积极意义来说，有助于人际关系向“同心同德”的方向调整处理。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和谐的统一性也有助于民族关系的调整。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民族间的团结、融合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为什么民族的团结、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呢？这恐怕同和谐的统一性思维方式分不开。人们在思维方式上讲和谐、讲中庸、讲统一，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表现出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不难想象，如果用相反的思维模式去处理民族问题，那么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成为民族矛盾的基础，而不可能在差异中寻找出共同点，达到民族间的和谐，统一和团结。”^③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有非常突出的历史思维成分。这种历史思维成分表现为历史的崇拜意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这种历史崇拜意识孕育出对国土乡邦、祖宗先辈的强烈的眷恋。“言必称三代”（孟子），“落叶归根”是这种眷恋的情感意绪的表现。这种眷恋的情感意绪还会进一步扩展为强烈的民族观念，以至“溶化于每个民族成员的思维过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个体思维的主轴。”^④由此就会在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引发出于祖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三、内在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钱穆说过：“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研究历史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⑤钱穆认为祖国和平统一的内在根据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实，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基本点，就其精神而言，就其积极意义而言，都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第一个基本点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周易·序卦》）由此价值取向出发，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儿女总是强调以土地为“生之本”，总是眷恋国土乡邦，强调“落叶归根”。它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巩固。

第二个基本点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取向。“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

(《大学·经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说法，就是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取向的注脚。按照这种价值取向，“一个人在家要少孝、中爱、老慈，在外与朋友交要守信、义，与国家交要忠君爱国”，否则就失掉了做人的资格。这种观念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巩固，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个基本点是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篇)，“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传论》)。如此等等，就是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说明，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规范，非常强调“忠”(不仅对国家忠，也对朋友忠)、“义”(一种爱人的正义感情)，强调亲缘、礼仪、友情、相互信任等。这种注重伦理关系、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明显的有助于调整、搞好人际关系，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凝聚力，正因为如此，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很深的影响。诸如社会交往中的“手足情，同胞亲”、“远亲不如近邻”、“师生(徒)如父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等格言俚语，以及过年过节串亲戚、访朋友、看同志等等礼仪行为，都是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

四、前提条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巩固、发展的内在根据，那么，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巩固、发展的前提条件。所谓民族自信心是指“一个民族由于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认识到自己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崇高价值，因而产生的对于本民族进一步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光辉灿烂前景的确信”，民族自尊心则是“民族自信心在民族道德感情上的深化。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它一方面要求本民族的成员以相应的道德行为来维护民族的尊严，并且不允许它的成员做出有损本民族尊严的行为；另一方面则要求其他民族尊重这种尊严，并且不允许其他民族侵犯、亵渎这种尊严。”^⑥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依据的，或者说，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植根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的土壤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列特性足以激发中华民族儿女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绵亘不绝，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增减消涨，几经跌宕，却能维持和延续下来，这在世界上是极其少有的。第二，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有着极强的内聚力。“不论哪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论割据势力如何强大，终能使固有的传统文化约束人们的心理，在广袤的土地上展现了心理的共同性”，例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不论哪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会跟着中原地区人民群众一起过。又如，我国的方言多得不得了，却能统一于汉字。第三，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有极强的辐射力，在这种辐射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着周围国家和地区，构成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第四，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吸收、更新外来文化上，具有很强的适

应性。例如，佛教文化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经过吸收、更新，具有了中国的特色。音乐、舞蹈等等的吸收，也展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新能力。……总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特性使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确信中华民族有着生存、发展的能力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从而引以为骄傲和自豪，产生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哺育和熏陶。

五、具体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三爱”

中华民族凝聚力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上，这不仅因为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历史传统，还因为“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⑧然而，笼统地说“中华民族凝聚力体现在爱国主义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爱国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认为，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三爱”（爱祖国、爱同胞、爱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具体表现的全部内容（或基本内容）。

爱祖国是就全体中国人与自己国家的关系而言的。具体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维护祖国的统一，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奋斗。

爱同胞是就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中国内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搞好了，人们才能同心同德，为祖国振兴的伟大事业奋斗。

爱中华民族，主要是就外籍华人、华裔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而言。中国人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海水流到之处，都有华人”这句话，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在海外的三千多万中国人中，虽然近二三十年来，大多数人加入了侨居国的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可是他们爱故乡、爱中华文化，爱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未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和富强，愿意为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努力。正如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说的：“我虽然喝了三十一年的洋水，但是我是吃中国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血液于水，我感到自己还是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⑨

六、功能效应：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

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所谓“民族自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民族自强”则是说，一个民族在自立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的各种力、能凝聚起来之后，就会像热核反应一样产生巨大的力量，使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起来。因此，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效应。

中华民族的民族自立、自强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之一。《易传》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要求以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为法，从而永远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系辞上传》则说：“日新之谓盛德”，强调革新进取的奋发精神。孔子对这种积极的人生哲学是大力肯定的，他说：“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可见，中华民族凝聚力是进取型的，而非防守型的。这种进取型的凝聚力包含着竞争意识、竞争力；这种进取型的凝聚力“是进步的，和人类意识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的，不是排拒其他民族而是虚心学习他们长处的”，^⑩这种进取型的凝聚力决不是依靠落后意识、陈规陋俗来维持的。诚然，因为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起作用，因为封建保守的观念起作用，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成分的“日新”意识、竞争意识、勇于“睁眼看世界”，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意识没有得到发扬，相反，被压制下去了。随之而来，本来应该是进取型的凝聚力，就转变成为保守、防守型的凝聚力。现在，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理应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让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宝贵成分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取型的面貌得到恢复。

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六个环节是相互关联、有序递进的六个层次。由这六个层次、环节构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体性、关联性、有序性是一般系统论的重要原则。另外，最后一个层次（以民族自立、自强为目的、效果的功能效应层次）还体现着一般系统论的最优性原则。这么一来，我们就要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系统，即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因此，我们应把探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工作，视为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①⑤引自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

②张恩宏《思维与思维方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355页。

③④单秀法、刘化绵《现代科学思维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⑥陈世松、周群华《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⑦《断裂与继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⑧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4日《人民日报》。

⑨引自葛仁局《炎黄子孙在海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⑩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社科所

责任编辑：凌峰

今年6月2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文艺心理学学会组织召开了以“心理学与马列主义文艺学”为题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学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陆一帆教授的《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赞扬《提纲》作者的理论勇气，充分肯定《提纲》所探讨的问题对于马列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从各方面予以认真的商讨。我们特将陆教授的《提纲》和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给以刊载，并期望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编者

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

陆一帆

文艺是现实的反映，但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反映，即通过社会心理去反映现实。文艺直接反映现实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不是直接的反映而是间接的反映。所谓社会存在或社会现实，就是人类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类的物质活动过程。这也就是经济和政治制度。马、恩曾反复说明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经济与政治。

马、恩说，意识直接反映经济只是人类初期的事，后来意识形态就不是这样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0）后来由于生产力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人类意识形态便出现了，它摆脱了对物质关系的直接依赖。“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上P.36）“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49）“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同上）

各种文艺对现实的反映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表情艺术直接反映社会情感；浪漫主义艺术、神话、童话直接反映社会群体的理想和幻想；再现艺术所直接描绘的不是现实，而是反映在社会群体意识中的社会映象。

关于文艺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反映现实的问题向来不为文艺界所注意，大家都以为文艺是现实的直接反映。我以为要说明文艺的本质，不仅要说明文艺反映什么，同时还要说明文艺如何从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即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从社会现实那里产生出来。这是个重大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这问题马、恩自认为还来不及解决。1893年恩格斯给梅林复信，针对他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所存在的问题写道：“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的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同上，P.500—502）这里恩格斯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这也是文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向。在说明文艺本质时，不应仅仅说明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还要说明社会现实通过什么方式方法产生出文艺来。

把文艺看成现实的直接反映，容易被唯心主义所曲解和歪曲，也容易产生庸俗社会学文艺观。

马、恩提出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解决了。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结构分为四项基本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普氏把它发展为五项，把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两项基本因素。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介乎经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经济政治，而是直接反映社会心理。他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选集》第三卷，P.196）这样就解决了恩格斯提出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其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意识形态。

所谓社会心理，就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群体的日常意识，具有自发、零碎、芜杂、浑沌和比较直观的特点。它的内容包含感觉、映象、思想、情感、理想、传统习惯等。

各艺术品种都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侧重反映社会情感的是表情艺术，侧重反映社会映象的是再现艺术，侧重反映社会理想的是浪漫主义艺术，现代派艺术侧重反映人们异化的情感和感受。

过去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艺时有两个缺陷：一是认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

经济，二是把普氏的社会心理学说排除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这样，以致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艺，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在重要问题——意识形态如何从经济产生——面前止步了，所以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未得到科学的说明。

根据普氏的五项社会基本因素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文艺直接反映社会心理，通过社会心理去反映现实，而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或来源，即前者是后者的原料、加工的基础。

这种观点很容易产生如下误解和非议：（一）这不是唯心论吗？不是。因为我们首先肯定社会心理是现实的反映，它不是作家的生命本能、潜意识，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文艺通过社会心理反映出现实。（二）这不是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吗？不是。“社会生活是文艺唯一源泉”是完全正确的，它从总的方面说明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一般地谈到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时，这个提法已足够了，它十分概括而简单明了。但如果要说明文艺的本质，说明文艺如何从现实中演化出来，这就不够了，因为它太笼统了。所谓“社会生活”实际上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四项基本因素。“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或来源）”与“社会生活是文艺唯一源泉”并不矛盾，前者把后者分解得更细致、更具体化了。（三）这不是二元论吗？不是，我们说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又说明了社会现实是社会心理的源泉，社会现实是文艺的最终根源。两个“源泉”不是并列的，而是因果关系。这就不能说是二元论。列宁也说过：“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了第二个重要前提，即客观实在反映在人的感觉中，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源泉。”（《列宁全集》十四卷，P.124）

社会心理是各种意识形态的直接源泉。文艺反映社会心理有其特点，在形式上是用形象去反映，在内容上是整体的反映，这就构成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何楚熊：意识形态的产生方式是思维艺术通过反映生活显现社会心理

陆一帆在艺术本质问题的思考中，引进了“社会心理”这个环节，得出艺术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反映社会心理的结论。

无疑，陆一帆的探索志在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力图沿着导师指引的方向探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这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责任心都是应当肯定和学习的。

下面就其中两个问题谈谈我的不同认识。

一、恩格斯提出了什么

陆一帆的理论依据来自恩格斯于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被他和马克思忽略了的一点：思想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对此，论者认为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即意识形态经由什么中间环节产生，或说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恩格斯在此信中提出的恰恰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源，或说是思想观念反映的内容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早已解决了的，也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直坚持和捍卫的唯物史观的基点，即意识形态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关系，是对经济条件以及由它决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就在给梅林这封信中提出了他和马克思曾经“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的过错之后，仍然严厉批判保尔·巴尔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歪曲，一再强调指出：各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不应看作“纯思想”的问题，而应“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该信指出了与这种忽略有关的另一个荒谬观念：“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同时强调“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它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作用。这种思想恩格斯于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舍乌斯的信、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都一再强调过；而在更早的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作了更全面的论述。

那么，恩格斯在该信中提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信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形式，“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问题。

方式方法问题显然是重要的，它是唯物史观不容忽略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换句话说，这也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其实，纵览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及书信，就会发现恩格斯对此的觉察并非始于这封给梅林的信。早在1886年发表的、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已有论述。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就批评了当时那种只拿“唯物主义”作为套语，而实际上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去构造体系的方法，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论及概念的产生及其

与现实的关系，指出概念来源于现实，但又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现象，永远不会与之相交。

概而言之，在我看来，恩格斯论及的关于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就是思维。思维的对象不管思维主体自觉与否，都根源于现实关系。思维还包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的影响，积极地或消极地制约着思维主体对现实关系、对现象的掌握与概括。于是意识形态便有了历史性、阶级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则是辩证的思维方法，是自觉地坚持从事实出发的方法。

理论形态体系的思维是概念的思维。那么，艺术形态体系的思维又有何特征？或说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是怎样的？这确是文艺学和美学应当研究解决的。

二、关于社会心理之于艺术

如果前面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所反映的内容是社会现实的观点是无须置疑的了；或说关于艺术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而社会心理便不是艺术直接反映的对象或中间环节。

从哲学观点看，社会心理也是对为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属社会意识范畴。它虽未升华为社会意识形态，但确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按照唯物史观，意识之间可以而且必然互相影响、互相交错、互相渗透，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按程代熙的概括：“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不仅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反映”。（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程代熙译）这种理解大体是符合普列汉诺夫《论工人运动的心理》（评高尔基剧作《仇敌》的论文）的立论精神的：即剧本是通过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描写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工人运动的心理——即这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中的工人阶级的心理。他说：“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是议论，而是描写。在描写阶级斗争时，艺术家应向我们表明，阶级斗争是怎样制约着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又是如何决定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才要求“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看不见摸不着，不是感觉的对象、不是审美观照的对象，因而也不

可能是艺术直接反映的对象。社会心理寓于活动着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从这个意义看，与其说艺术直接反映社会心理，通过反映社会心理反映现实生活，还不如说艺术必须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方能显现社会心理的某些方面。

其实，社会心理不过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一特定环境中的特定阶级、阶层、集团的人在现实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带有趋向性的群体意向。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必须依赖生活中的具体人和事为其载体。

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只有层次的差异，而并无性质的区别。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范畴的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则是“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四）。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普列汉诺夫关于“一切意识形态都有一个总的根源：一定时代的心理”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普列汉诺夫说过：“唯物主义在解释一定社会或阶级的心理时，是以经济发展所建立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的。”因此我们说，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自发的原生态，

意识形态则是经过思维的方式产生的关于意识的体系，是一种自觉形态的社会意识。

社会心理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一、社会心理虽然不为艺术直接提供形象，但它弥散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对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发生影响。

二、内容制约着形式。因此社会心理也必然对艺术的表现方式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如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荒诞派戏剧、意识流小说乃至象征主义等流派的出现就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密切关系。

三、社会心理还通过艺术消费、评论的反馈作用、制约着艺术家的审美意向，从而对艺术生产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德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艺术的市俗倾向，我国当代通俗艺术的流行等便是例证。

因此，将社会心理引入艺术研究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邓志远：普氏对“社会心理”并无明确界定 在本质论范畴只有一个“源泉”

陆一帆教授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逻辑起点，对文艺本质问题作了长期的、深入的、审慎的思考，继承和发展了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与社会心理”的学说，颇有见地地提出了“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等崭新的理论观点。这对于传统的文艺观点，不啻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堪称为“一家之言”。然而，当我对其《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下简称《提纲》）进行再思考时，却又觉得有的提法欠妥。

（一）把文艺本质定义为“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是否恰当？理由有三：第一，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与社会心理”的学说，并非探讨和论述文艺本质问题的，而是探讨和回答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但尚未解决的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问

题。普氏始终只是把“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介因素”来探讨和论述的。即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才能对文学艺术起决定和制约的作用；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介，文学艺术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据我所知，普氏对文艺本质问题的探讨，是从对托尔斯泰关于“艺术是表现情感的”的定义的评析开始的，经过一番评析之后，普氏作出了他自己对艺术的定义：“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的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在于把他反复思索和反复感觉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08页）在这里，普氏并没有忽略“感

情和思想”的源泉问题，而是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感情和思想”是源于“周围现实”的。这就把他的文艺本质观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的基础上了。第二，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或曰“社会中人的心理”）的涵义，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是指在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阶级、阶层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即人们的感受、观点、情感、愿望、理想、习惯、信仰、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等。简言之，是指人们生活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的东西。因而，把文艺本质定义为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容易被误解为“文艺的本质就是主观精神的反映”，或者被反对者找到回击的口实。第三，所谓“文艺本质”，应是指文艺本身所固有的、决定文艺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我以为，这一“根本属性”应归结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不归结为“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因为，“社会心理”本身还有一个“源”的问题，这个“源”不是别的，正是陆教授所说的“社会心理是现实的反映”。此其一。其二，〈提纲〉中所引的恩格斯于1893年给梅林的那封复信里的那段话只是说，他和马克思忽略了形式方面，即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包括文艺在内）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而不是内容方面。具体到文艺上，就是文艺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由是观之，“社会心理”就只是社会现实演化为文艺的一个“中间环节”。换言之，文艺是通过表现社会心理这种方式方法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因此，我以为，不如改为“文艺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表现社会心理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可能更

妥当些、更准确些。

（二）把社会心理看作是文艺的另一源泉是否恰当？理由有二：第一，〈提纲〉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列，很巧妙地引用了列宁批判马赫的一段话。然而，我在细读了列宁的这段话以后，却觉得这段话似乎并不能成为作者这一观点的挡箭牌。因为，照我理解，对于人的感觉和知识而言，“泉源”是共同的，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客观实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称作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但仅承认这一个前提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探究人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否则就会滑向唯心主义。因此，列宁紧接着又指出，“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是第二个前提，而且是更“重要的前提”。这就把认识论牢牢地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很显然，列宁的这段话是对马赫仅承认“第一个前提”而搞混了“第二个重要前提”的批判，怎能由此既推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同时还提出别的“源泉”的观点呢？第二，如果把“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限定在文艺与社会心理这一范畴内，或者用以说明文艺如何产生的源泉问题和产生的方式方法问题，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把它提到本质论的范畴，并用以说明文艺本质的话，那恐怕就不太恰当了。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这个本原就是物质。由此推断，文艺的源泉就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生活，不可能有另一个。如果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社会心理也是文艺的源泉的话，那就可能导致哲学上的二元论，尽管作者一再声言这不是二元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柯汉琳：“直接产物”不同于“直接反映” “源泉”没有“直接”与“唯一”的区分

陆一帆先生的〈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下称〈提纲〉），力图揭示社会心理在从生活到艺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由此重新思考文艺的本质问题。这一新的理论构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社会心理作为人们精神生活过程的结果，无论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意识（从认

识论上讲），或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从文化学角度讲），它都既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的直接反映，又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的中介环节，因此，研究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固然要从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但又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还应进而考察

“经济的枯燥的骸骨”是怎样为“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血肉”所包裹的；而且，“最有趣也是最诱人的方面”是进而考察经济如何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等社会心理的血肉”所包裹着的。就是说，要揭示艺术的本质规律，不能不深入研究社会心理这一生动的“血肉”，这一处于经济、政治与文艺之间的中介环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纲》的理论构想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但在具体展开论述中，《提纲》却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观点。这里试举二例：

一、艺术与物质活动从交织到分离就是艺术反映生活由直接转向间接吗？

《提纲》认为，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而不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文艺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只是人类初期的事。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提纲》引用了马、恩以下论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后来出现了社会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然而，引述马、恩这些话能否证明最初的文艺直接反映生活、后来的文艺就不直接反映生活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所周知，马、恩这些论述的原意是：人最初（原始时期）并没有纯粹的意识，社会也没有纯粹的精神生产，那时的意识、精神生产和物质活动是交织一体的；只是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之后，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才不再与物质活动交织一体，而由脱离物质生产的阶层所制定或创作，这时，文艺才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显然，马、恩这些论述只说明文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作为一种独立形态，而不说明文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反映生活。拿神话来说，难道这种原始艺术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吗？反之，难道《红楼梦》、《水浒传》就不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吗？其实，“直接产物”与“直接反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提纲》却把它们等同起来，这就使其立论失去了说服力。同样，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与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也不是要说明文艺不再作为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因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文艺与物质存在条件、经济基础的关系，而不是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退一步

说，文艺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也不等于文艺不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经济基础”与“社会生活”不是同一概念，而《提纲》却把它们等同起来，这就造成理论偏误。

二、文艺存在着“直接源泉”与“唯一源泉”两个源泉吗？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提纲》由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观点进而提出“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的论断，同时把社会生活称作文艺的“唯一源泉”。这样，文艺就有两个源泉，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的理论也就被逻辑地否定了。这是令人费解的。尽管《提纲》一再说明这并非“二元论”，但实际上就是“二元论”，与早期的别林斯基提出的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心灵也是文艺的源泉的观点颇相似。我以为，源泉就是本源，源泉只有一个，没有“直接”与“唯一”的区分。生活就是文艺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提纲》之所以把社会心理看作文艺的一个源泉，显然因为作者看到社会心理可直接作为文艺的反映对象。不错，文艺创作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反映对象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先前已形成并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完全可以成为文艺反映的“具体对象”之一。但是，这时被反映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我所理解的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或经济的，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它既是整体的又是分层次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从整体的社会生活割离开来当作一个源泉。至于作家的个体心理，不过是外部社会生活的反映，更不能说是文艺的源泉。

《提纲》为了给“两个源泉”的观点找到合理解释，引用了列宁关于“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的说法。这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就精神实质看，列宁说的是认识过程必须从感觉开始，“源泉”在这里的意思无非就是“起点”，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一用词。认识必须从感觉开始，但认识的本源仍是客观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感觉”作为认识过程的一种心理形式，不同于上述所说已客观存在于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构成层面，因此我们更没有理由根据列宁这句话就证明社会心理是文艺的一个源泉。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申家仁：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生活的中介 但不宜提“直接反映”和两个源泉

在当前形势下，陆老师提出文艺本质问题让大家讨论，很有意义，也显示出探索真理的勇气。过去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仅只于此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美学也肯定这一点。陆老师明确指出：“文艺的直接反映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一震聋发聩之语对廓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的误解有积极意义。文艺反映生活不是直接的、映象式的，它经过艺术家的选择、加工、改造，是创造性的客观的“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统一。那么，在“反映”前加“能动”二字是否就可以了？陆老师认为仍然是含混的，未能把文艺与其它意识形态区分开来。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界定文艺的本质？陆老师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得到深刻的启示。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由于“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因此“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0、475页）陆老师认为要揭示文艺的本质，就必须抓住文艺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存在的条件”，即反映的中介。而最早研究这个中介的是普列汉诺夫。

说到普列汉诺夫，过去人们认为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文艺社会学方面。其实，他对后人最有启发的还是文艺心理学。苏联著名美学家卡冈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中说：“普列汉诺夫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观点认为：为了正确地理解文化，必须善于从经济学转到社会心理学。”普氏曾明确指出：“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研究文化“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行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尤其是研究文艺，不重视社会心理“一步也动不得”（《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272—273页）。普氏把马克思社会结构

四层次发展为五层次，把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一前一后两个层次，他的著名论文《从社会学观点看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绘画》，与其说“从社会学观点”，不如说是“从社会心理学观点”，因为它始终是结合社会心理谈论艺术的。陆老师从普氏那里接过社会心理学，把它作为解开文艺产生、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并且发展普氏的观点，提出关于文艺本质的崭新见解：“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我以为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既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又突出了文艺反映生活的中介——社会心理，明确了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有内容和形式，把文艺同其它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了。这一论断，能涵盖不同的艺术门类。也符合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实际。文艺向来是心灵与历史的融汇，无论什么时期的文艺都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观点、趣味、情绪、愿望、意志等等社会心理内容。五六十年代的诗歌散文，文革期间的音乐舞蹈，近十年的新时期小说等等，不都能体现了这一点吗？陆老师关于文艺本质的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是对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贡献。

但是，对陆老师《提纲》中的观点我有两点保留意见。一点是，我认为文艺“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中的“直接”二字不甚妥当，应换为“审美”。因为文艺反映社会心理不是“直接”的，他通过艺术家艺术个性的折光，带有艺术家的主观色彩和创造精神。而且，社会心理又是通过社会审美心理反映到文艺中来的，其间，又经过民族的、阶级的、群体的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审美心理的折射。更重要的是，文艺反映社会心理必须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作为信息载体。说“直接反映”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第二点意见是，还是不要提“两个源泉”为好。“源泉”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唯一的”社会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社会生活不只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还包括社会生活主体——人的社会心理

内容，所以，社会生活的源泉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提供生活材料与社会心理。艺术家在“源泉”中一方面吸取生活材料，即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事件、生活印象、风土人情等等，一方面吸取一定历史时期和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理。当然，“源泉”的这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更为直接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普列汉诺夫才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根源，即某一时代的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选集》第三卷196页）社会

心理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不必提两个源泉，提两个源泉，不管如何解释也难以避免二元论之嫌。过去，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源泉作用理解得较狭窄，着重客观方面的生活材料，而忽视主观方面的社会心理，陆老师提两个源泉似乎是为了强调社会心理这个层面，用心是良苦的。

作者单位：佛山大学中文系

本专栏责任编辑：文可

欢迎订阅1992年 《经济学家》

主编：刘诗白 副主编：肖灼基

国内邮发代号：62—92 国外发行代号：BM4046

《经济学家》是由我国经济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共同发起，西南财经大学直接承办的大型经济理论刊物。

《经济学家》主要发表经济学界新近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反映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研报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以及当代国外各派经济理论的介绍和评价等。

《经济学家》开设的主要栏目有：专论、《资本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博士论坛、国家级课题之窗、经济研究报告、争鸣与探索、海外来稿、学术动态等。读者对象为经济理论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等。

《经济学家》为双月刊，每期定价2.40元，全年14.4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如在当地邮局漏订，可直接汇款到本刊编辑部订阅。

编辑部地址：四川成都光华村西南财经大学 邮编：610074 电话：
784707—541

韩愈《送权秀才序》为权南仲作

金陵子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权秀才序》，权秀才之名历来注家未能注出。今按权秀才应是权德舆从兄权南仲。昌黎序云：“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吴县男为军司马，门下之士权生实从之来。（中略）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陇西公为董晋，其平汴州在贞元十二年（796）；御史大夫吴县男为陆长源，《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八月，“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由此可知，权秀才是在贞元十二年八月陆长源离汝州刺史任时随其赴汴州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三七《送从兄南仲登科后归汝州旧居序》云：“今兄能溯其末流，泳于深源，志之所之，不迁于物。以为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屡空，鄙赐之屡中，故带经食力，耕于汝山之下，（中略）去岁临汝守首贤能之，书贡于仪曹。瞻言正鹄，审固则获。前此亦尝失之矣，退实无愠，羸而不器，盖能反诸己而已。”虽然权南仲登科之年史无载记，但将二序合观，显然可定权南仲就是韩愈所送的权秀才，他于贞元十二年冬以陆长源荐赴举，来年春榜上有名，荣归故里，于是有权德舆的都门送别。权序末云“南官郎有雅知兄者，且与德舆为僚，徵诗祝别，以附其志”，南官郎是尚书省郎官，权德舆贞元十三年任驾部员外郎，正相符合。序称南仲“前此亦尝失之矣”，则有文集卷二《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一诗可证：“吾兄挺奇姿，向晦道自充。耕凿汝山下，退然安困蒙。……邦有贤诸侯，主盟词律雄。荐贤比文举，理郡迈文翁。……时来无自疑，刷翮摩苍穹”。这便是权南仲的前一次赴举。诗称“华簪映武弁，一年被微躬”，应是贞元八年诗人登朝年内由太常博士迁左补阙后作（详拙作《权德舆年谱稿》，南京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研究》第二辑），时陆长源为汝州刺史（详郁贤皓《唐刺史考》），“荐贤比文举”当然是指陆长源对南仲的举荐，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根据权德舆的这两篇作品来看，权秀才即南仲应是无疑的了。

《尚书》“有众率怠弗协”解

殷伟仁

《尚书》中的《汤誓》篇，是商众将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时，成汤向商众发出的战斗动员令。在这篇著名的誓师辞中，成汤扼要陈述了夏朝众人反抗夏桀暴政的情形，其中说到了“有众率怠弗协”。关于这句话的意思，《伪孔传》曰：“众下相率为怠惰，不与上（桀）和合”。此后的孔颖达《疏》及有关著述多从其说。我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有众”的“有”，是语气助词，说详王引之《经传释词》；“有众”即《伪孔传》的“众下”，是夏商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率”，《史记·集解》引汉代经师马融说，释“率”为“相率”、即“一个接着一个”之义，甚是。《伪孔传》从之，无误。但《伪孔传》释“怠”为“怠惰”，则有失妥贴。细审上下文，“怠”以解作“怠工”为宜，这是夏代农人反抗夏桀暴政的形式之一。“弗协”，《史记·殷本纪》译为“不和”，《尚书·伪孔传》解为“不和合”，义虽勉强可通，然终非佳释。我认为，“弗协”应解作“不耕作”，这儿的“协”字是取其“众来合力而耕”的本义。协，或作劦，《说文》云：“劦，同也，从三力。”此徒就篆形说义，其实协或劦所从之“力”，乃单刺耒（𠂇）之形变。殷墟卜辞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一语，协字作𠂇，所从的𠂇，并非力形（力实不可具象），而是曲臂单刺耒的形状。因此，“协田”或“𠂇田”意即以众来共耕田地。综之，“有众率怠弗协”是说夏朝众人相率怠工，甚至拒绝耕作。如果这一解释不错的话，怠工和“弗协”，作为上古时代农人与贵族斗争的一种方式，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看，应是由《汤誓》中记载的夏末农人最早使用的。

“书海酌蠹”责任编辑：刘斯翰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蔡景康

—

“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上来了，明代中叶以后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且围绕着《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而进行的。

今见最早的一篇关于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理论专文，是庸愚子（即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此《序》第一次就历史演义小说的特点、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理论阐述，认为：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著作，虽同取材于历史事实，但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首先是“史之文，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而历史演义小说，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大。其次是历史著作“记代之事”，“褒贬予夺，无一不笔之者”；而历史演义小说在对待历史事实方面，“考诸国史”，“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接近于史；另一方面又可根据需要对历史事实“留心损益”，进行适当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他认为，历史演义小说有重大的作用：其一，是普及历史知识，使前代历史“人人得而知之”。其二，和历史著作一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垂鉴后世”达到“劝惩警惧”的目的。其三，进行思想教育。所谓“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蒋大器的这一些论述，从历史演义小说的特点和作用两大方面，论证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强调了作为历史文学的历史演义小说——“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特点，又指出历史演义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它对于历史事实，又可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留心损益”，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除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通俗这一特点外，蒋大器总结的作为历史文学的历史演义小说这两大特点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有利于人们从性质方面去划清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一般文

艺小说的界限，而且，也就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基础。

但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这确实是当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关西人张尚德，针对这个问题，又写了一篇题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的文章。

张尚德指出历史演义小说是把“史氏所志”，“以俗近语，槩括成编”，他把他的观点，概括为“羽翼信史而不违”。

有人把张尚德的“羽翼信史”说，作为“要求历史小说严格依傍历史记载”，“不允许有作家的艺术虚构”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这是误解。如前所述，张氏之《引》是针对“赘说”而作的。所谓“赘说”，其中心点就在于它抹杀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区别，把两者简单等同，并进而否定历史演义小说存在的价值。而“羽翼信史”说的提出，与此正相反，它是以历史演义不同于历史为前提的。

也许有人说，张尚德承认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仅仅在语言形式方面，即所谓“以俗近语，槩括成编”。这也是误解。因为，所谓“槩括”者剪裁修改之意也，就是对于历史事实，根据需求和可能，予以取舍损益、虚构和加工。

张尚德在反驳“赘说”中，还进一步触及到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即“兴乎感”的问题。他指出，史志因其“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所以“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罔睡”。而历史演义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形象地再现历史生活，因而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可惜张尚德没有进一步发挥，但不能不指出，这是他对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随着历史演义小说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传，在社会上，有一些人不再说历史演义是多余的了。然而，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责难历史演义小说，认为历史演义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

应该承认，历史演义小说的“紊之以正史”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自《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以来，历史演义小说，作者如林，书坊商贾，竞相刊行，在这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作者、作品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虚构的关系问题上，情况确实非常复杂的：有半实半虚、七实三虚或七虚三实者；有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既拙于措辞，又惮于叙事，徒有小说形式而丧失小说意味形同史抄者；有虽托史事，然悉由作者虚构而毫无根据者。然而，由于历史演义形象好读，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故一般读者，均可读懂，即使不识字者，也由于说话艺人的传播，而“人人得而知之”。就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不必也不会去考究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大抵信历史演义小说所写者为真。这种情况，如果所阅读或接受的历史演义小说比较尊重历史事实，实多于虚，那么与史实还相距不远，否则，则信假为真，以假作真，以虚为实了。

不过，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可紊之以正史”论，却并不是想探讨历史演义小说应

如何处理事实与虚构关系，而是诘难历史演义小说，企图否定它的存在。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仍需从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著作的根本不同点入手，熊大木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就是从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论证和批驳的。他明确指出：“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他说该书在基本事实方面，是“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的，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但有些方面，则又“用广发挥”，进行必要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不如此，就“难以成野史之余意”。历史演义小说也就很难写了。熊大木的观点，为以后的许多小说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并在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强调历史演义小说必须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的流派，诸如酉阳野史的传奇、小说，“百无一真”，而“人悦而众艳”^⑥的观点，明万历末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也说：“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特别是明末袁于令的“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的观点，更是熊大木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与这种观点差不多同时的，是另一部分小说理论家的意见，他们并不否定艺术想象和虚构，但强调作为历史文学的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可以想象和虚构，却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还在嘉靖末期，李大年曾经为熊大木所编辑的《唐书演义》写过序，他在序中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想象和虚构，虽不抱绝对否定的态度。例如他说：熊大木的《唐书演义》，“虽出其一臆之见”，然而书却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不能“以其全谬而忽之”，但是，他于《唐书演义》在尊重历史事实方面，是有看法的，并就此提出批评说：“逐首末阅之，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惜乎全文有欠，历年实迹，未克显明其事实，致善观是书者哂焉。”汪道昆的意见与此相类似。他在《水浒传叙》中，一方面就招安一事，与《宋史》等相考较，指出虽与史籍相出入，但却认为“此其虚实，不必深辩，要自可喜”，赞赏和肯定虚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评《三国演义》“雅俗相牵，有妨正史”。《水浒传》不是历史演义小说，但是由于史观念的束缚和史文化的强烈渗透，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们总是习惯于把小说中所写的事实，与历史相比并，而在这比并中，反映出他们对历史事实与虚构关系的认识 and 态度。从李大年、汪道昆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们并不反对历史演义小说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另一方面，他们都强调了在基本历史事实方面，必须严格遵守。

李大年、汪道昆等人的观点，到明末，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进行了全面的阐发。他说：该书是“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所谓“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就是说在一系列的基本历史事实方面，《新列国志》是严格地“本诸《左》《史》”等历史著作，遵守历史事实，他批评《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等历史演义小说，认为它们“悉出村学究杜撰，佞佛磔磔，识者欲呕”，并举《列国志传》采撷民间传说的秦哀公临潼斗宝的一节描写为例，指出“哀公之世，秦方式微，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并驾而赴临潼邪？”故既无“是理”，“尤属鄙俚”，确实“其纰缪乃更甚”，他认为它们“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

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总之，他认为在“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等方面，都应该严格尊重历史事实。

但是，可观道人也没有否认艺术想象和虚构的必要性，他在强调必须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仍然指出可以想象和虚构——“敷衍不无增减，形容不无润色”，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历史演义小说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这一特点罢了！

熊大木等人的观点与李大年等人的观点实际上是当时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两种不同倾向在理论上的反映。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一直十分繁荣，正如可观道人所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⑦在浩繁的历史演义小说中，自然不乏成功之作，但问题也不少。大体说来，就处理历史事实与虚构关系方面看，有两种倾向，一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虚实相间，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对其中的一些史实、人物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艺术想象和加工，基本上能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但也有不少作品，虽亦号称历史演义小说，然而大抵沾上一点历史影子，而全凭作者虚构，实则丧失历史小说的特点；另一则是以《新国列志》为代表，强调必须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但也不否定某些想象和虚构，不过也有不少作品，大多拘牵史实，形同史抄，只不过是把史书用通俗白话加以演绎而已。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意见并无根本的分歧，说不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因为他们都强调了历史演义小说性质上某方面的特点，但都没有否定另一方面的特点，况且他们各自强调的特点，都是历史演义小说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特点呢！正因为如此，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并各自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直接产生影响。

三

熊大木等人和可观道人等人各自强调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某一个特点，我们不能厚此薄彼，但是问题在于，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中，在对待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虚构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作家和读者，到底应该掌握一种怎么样的尺度来进行创作和检验呢？扩而大之，应该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呢？这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出然而未及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谢肇淛的意见引人注目。

谢肇淛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然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岂必真有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谢肇淛的论述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首先就在于他明确提出“虚实相半”的正确观点，所谓“虚实相半”的观点，不应理解为虚与实各是一半对一半，而是说小说作品应该虚实结合，虚实统一。他强调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认为没有

虚构，也就不必有小说，若“必事事考之正史”，那么，“则看史传足矣”，又何必有戏剧和小说？把虚构提高到这样一个理论高度来认识，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谢肇淛在这里乃是泛论小说创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和读者如何正确对待虚与实，并非专指历史演义小说而言。但毫无疑问，它包括而且主要是针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虚实问题而发的，“必事事考之正史”，正是他所处时代正统文人用以否定当时大量刊行的历史演义小说存在价值的理论，故有“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之谓。他之批评《三国演义》，和当时那些从反对历史演义小说的人有本质区别。他认为《三国演义》虚构不足，“事太实则腐”，语言“俚而无味”。这种批评不无偏颇失当之处。

然而，虚构是否可以毫无限度？作者是否可以不顾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随心所欲地胡乱想象和捏造？当然不能，谢肇淛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更令人瞩目的论点——认为虚构和想象的尺度和准则，应该是“情景造极而止”。

何谓“情景造极而止”？我认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要拘牵事实，不敢虚构和想象。有些作者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主题思想和塑造人物形象，作了虚构和想象，于是“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这种不敢稍离事实借助虚构和想象来加以集中和概括，是不可能很好地达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另一个意思是这种虚构和想象又不应是毫无节制的，离开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为了达到某种艺术真实和艺术效果，作者可以改变原来人物和事件的某些细节和事实，可以添枝加叶，想象杜撰，虚构夸张，但所有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即完美地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因此，在分寸的掌握上面，应该以此为尺度，为原则。

总的说来，谢肇淛在这里所提出的“虚实相半”，亦“要情景造极而止”的观点，是一种要求生活真实（当然也包括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观点，他正确地、也比较公允地回答了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虚构关系的问题，为小说理论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到了明末，袁于令在他的《隋史遗文序》中，除了明确地剖析历史演义小说与史志的不同特点外，也比较正确地回答了历史事实与虚构的关系的问题。

袁于令首先明确指出历史演义与史志的不同，他说：“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留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羨书生，恍惚不可方物”，他认为，“贵真”和“贵幻”，正是历史著作与历史演义小说虽同取材于历史，但在处理历史事实时的不同特点，史志“传信”、“贵真”，所载必历史上一定发生过的事和人；历史演义小说则是“传奇”、“贵幻”，描绘历史上那些“奇情侠气逸韵英风”的最生动的人和事，并可虚构想象。

但是，袁于令在指出史志与历史演义小说不同，强调历史演义小说虚构特点的同时，也并不主张可以不顾历史真实，“凭己”之意随意进行虚构。他严肃指出：历史演义小说“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它虽然可以虚构，但仍然必须尊重历史

真实，要力避那种“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创妖艳之说过于凭己”的虚构，对于这种不合情理，不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描写，袁于令认为应该“悉为更易，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他指出：历史真实与虚构想象之间的关系，是不能或缺其一的，它们之间“相成岂以相病哉？”总之，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虚构想象的关系时，都必须服从于塑造“凛凛生气”的人物形象和“昭好去恶，提醒颡蒙”的教育目的。

袁于令的这些观点，和谢肇淛一样，都是要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要完美的统一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科学表述，也是我国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最高成就，它不仅比较恰当地解决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虚与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这一场讨论，进而由历史演义小说扩大到一般文艺小说的“真”与“贗”，“真”与“幻”，即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关系的讨论，导致了明末小说理论的高度繁荣，这是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袁于令说《隋史遗文》的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足见他仍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史文化的高度发达，由于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源流之一的神话被历史化以及史观念的强烈渗透，致使强调“实录”、排斥虚构的观念，如同幽灵一样，长期纠缠着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造成文学与史学混淆不清，这是事实。在此其间，所谓“补史之缺”、“补史之遗”即是典型论点之一。然而，如若一见“补史之缺”，即以混淆文学与史学等而视之，则又未免失之片面。要知道，同是一个论点，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所赋予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即以“补史之缺”而论，唐代的刘知几确实文史不分，以史学的“实录”来要求小说，排斥虚构；而唐代传奇作家，则以此来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至于袁于令，则主要是根据历史演义小说还是附于历史文学，要求其在基本事实方面不“与史背驰”。可见，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以片概全。由于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将另撰专文加以讨论。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

②刘知几：《史通·采撰》

③刘知几：《史通·杂述》

④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⑤《古小说论概观》26页

⑥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⑦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⑧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浪仙”钩沉

杨晓东

一

冯梦龙曾为其友人天然痴叟编撰的小说集《石点头》作序一篇，原文如下：

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侏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言于晋，立于汉，移于宋，是皆有物焉凭之。生公游戏神通，特假此一段灵异，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岂石真能点头哉？噫，是不然。人有知则用其知，故闻法而疑；石无知因生公而有知，故闻法而悟。头不点于人而点于石，固其宜矣。且夫天生万物，赋质难判，受气无别。凝则为石，融则为泉，清则为人，浊则为物。人与石兄弟耳。盲人不知视，聋人不知听，粗人不知文，是人亦无知也。月林有光明石，能照人疾，则石而知医；阳州北峡中有文石，人物、溪桥、山林、楼阁毕具，是石而知书；晋平海边有越王石，郡守清廉则见，否则隐，则石而知吏事。是石亦有知也。望夫江郎，登山而化，人未始不为石。金陵三古石，为三举子，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炉，石亦未始不為人。丈人丈人之云，安在石之不如人乎？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所不点头会意，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是石之不如者也。

古吴龙子犹撰。

据此可知，《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别号浪仙。明人张瘦郎散曲集《步雪初声》（原题：“古石阳张瘦郎野青氏著，古吴袁令昭幔亭歌者较”），末附席浪仙曲三套，冯梦龙为《步雪初声》作序，文中又提及浪仙：

野青氏年少负隽才，所步《花间集》韵，既已夺宋人之席，复染指南北调，感咏成帙。浪仙子从而和之，斯道其不孤矣。夫楚人素不辨冰青，得此开山，尤为可幸。《白雪》故郢调，今其再振于黄乎？因名之曰《步雪初声》。野青氏勉旃！词隐先生衣钵，余且悬以俟子矣！

于此又知，浪仙又称席浪仙，与冯氏同为书会、词曲辈人。

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P·韩南先生（Patrick Hanan）在对冯氏《三言》作了系统研究之后断言，《醒世恒言》的风格与前两个集子（按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晓东）有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是有一个新人执笔写作了四十篇中的至少二十二篇。

这个新人是谁?!韩南先生在对作品作了细致分析后论断,《醒世恒言》的校点者“墨浪主人”和《石点头》的编撰者“天然痴叟”浪仙氏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这个参与《醒世恒言》执笔写作的新人。又是这个浪仙!

韩南先生的观点,顺理成章,代表一家之言,颇有见地,是值得重视的。至于《醒世恒言》究竟是否有新人参与写作,因缺乏力证,尚难一锤定音。但浪仙作为冯梦龙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密友,在冯氏的交游活动和创作生涯中曾扮演过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探索考辨这位神秘的匿名人——浪仙,不但对认定《石点头》这部我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作者的真实身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冯梦龙这位我国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生平交游创作的研究,亦很有价值。

这位神秘的浪仙氏究竟是谁?!长期来,国内外学者曾不惮其劳,刻意搜求。终因资料缺乏,毫无结果。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浪仙”究竟是否实有其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些可能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徐朔方先生在“《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考辨”一文中认为:“《三言》各本所署的编校者和作序者张誉、张无咎、陇西可一居士、豫章无碍居士和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墨浪主人一样,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尽管这一论断似嫌根据不足,但却很能代表学术界一部分人的意见。

笔者在研究整理江南地方史料典籍之际,发现了这位几乎使许多专家、学者感到迷惘的神秘人物——浪仙氏的蛛丝马迹。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索,就正于同行。

二

浪仙姓施,名绍莘(1588—?),字子野,上海人,诸生,工词曲。与冯梦龙之友绿天馆主人叶有声(详见拙作“《三言》‘序’作者考辨”,《文学遗产》1991.2期)既是同乡,又是近邻。兹引《青浦诗传》一段有关记载如下:

子野少负隽才,作别业于柳上,又营精舍于西余,极烟波花药之美。时陈眉公居东余,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

宋张三影即北宋名词家张先,字子野,乌程人,天圣(1023—1031)进士,官至都官郎中,工词曲,因其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时称“张三影”。施绍莘十分钦慕张先的学识文才,且与其同字,亦工词曲,故陈继儒曾为施氏书斋题名“三影斋”。施绍莘《秋水菴花影集五卷》亦由陈继儒作序,原题“华亭泖峰浪仙施绍莘子野父著”。据文渊阁存目提要云,是集前三卷为乐府,后二卷为诗余,“多作于崇禎中,大抵皆愁红惨绿之词”。

笔者翻阅有关地方史资料,对浪仙家世、生平进行一番考证,提供有关情况如下。

施家是松江的望族,祖先原籍山阴。其祖施退翁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任华亭县令,遂为松江施氏之祖。施绍莘是退翁十二世孙。《华亭县志》卷十一有施退翁小传:

施退翁,山阴人,淳祐间任县事,以风化为己任,兴学校,建讲堂,改创斋庐,

中置泳仁亭，后为观颐堂，七月告成，不扰民赋。学士王遂记其事略云：施君治化修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人谓之实录。

看来，施退翁在任上是办了几件实事、好事，颇受时人称道的。施绍莘的父亲施大谏，字叔显，早岁即颖悟绝人，“十岁能属文”。早年与董其昌同为府学寒窗学友，并为万历戊子（1588）同科举人。生性厌恶官场，不乐仕进，遂“闭门注《老》、《庄》，寒暑不辍”，自题书斋曰“一经堂”。其兄施大经，字天卿，号石渠，又号玉屏，万历乙酉（1585）举人，署丹徒教谕，迁江西瑞州府通判，为官颇有惠声。施家多典籍，万历间与王圻、宋懋澄、俞汝楫同为郡中藏书四富家。施氏仅书目就有四大册，“高五寸许”。其收藏印章有“借鸞不孝”及“子孙永宝”。凡购置藏书，均以此章印于卷首。

施绍莘生活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真可谓得天独厚，家学渊源了。绍莘“少为华亭县学生”，即身负雋才，丰姿秀逸，佼佼鹤立。但在科举场上，却与冯梦龙一样，蹭蹬不遇。转而寄情声伎，流连山水间，又据《南汇旧志》记载：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雋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余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时陈继儒居东余，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无子，时论惜之。

由于施绍莘的“早夭无子”，施大谏这一支因此而绝嗣，断了香火，渐至消声匿迹，湮没不闻了。可惜一代才人，来去匆匆，于世间几乎不着痕迹。

施绍莘的伯父施大经子系亦不繁盛。其长子名沛，字沛然，天启初以贡除河南廉州通判，早卒。次子名溥，字汝中，以贡授永清卫经历，迁乐亭知县，明亡殉难，服毒而亡。一个大家族，就这样衰落了。

“浪仙”施绍莘与“畸士”冯梦龙在生活经历、性格特征、艺术才华、志趣爱好等诸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均怀才不遇、跌宕不羁、寄情声伎、工词擅曲、热衷于市民文学。因此，他们的结为知己，广泛合作，亦在情理之中。

三

施绍莘的传世之作极少。在《青浦县志》卷二十八中我们发现了施氏《西余山居记》一篇，作于天启六年（1626）五月五日，亦即山居竣工之际。当时勒刻三石，“一沈（沉）三影斋池心，一藏散花台下，一沈（沉）北山泉底”，作者愿手泽永与山居之泉石长相伴。断管残沈，弥足珍贵，兹全文转录于下：

《西余山居记》

施绍莘

山居在西余之北，东余之西，饮食坐卧皆在空翠中。玉屏山直其东北，势若腾舞。更有一山，如鱼背，如眉棱，半隐半现，则凤凰山之介出于东余、玉屏间也。别有一点苍翠，在平畴漠漠中，若醒若睡，不衫不履，则北簪山之离群独处于烟草外也。揉蓝紫带，屈曲柔妩，轻和淡荡，则山径之涨腻沧漣而周遭于两余下也。此山水之大凡也。予山居则疏疏落落，点次山水间。在山腹者曰“半间精舍”，本为先人墓地，于此供僧忤

佛，故名。中堂曰“春雨”，其前平田远水，一目千里。西偏曰“无梦庵”，卧处也。万松在窗外，蒸烟鸣雨，夜枕幽绝。东偏曰“诗境”，晏坐处也。窗外皆竹，如绿云然。其前为“散花台”，出万竹上，每于此饭鸟，鸟闻木鱼磬声则下。竹间有小径，接“太古斋”。斋小如髻，他处犹闻樵斧人足声，至此万籁俱寂，惟闻鸟啼叶落。而闲鸟无求，声不多作。盛夏草木怒生，叶亦不落，但竹风潇潇而已。每岁暑月，为挂瓢晞发之地。此山腹之大凡也。降及山腰，有亭翼然，名曰“霞外”。其背背松，其面面桃，上径径松，下径径桃，更有梅花三四十株，作一堆雪，当桃花尽处。桃径凡三折，一折皆单瓣，开差早，一折皆千瓣，开差晚，两桃继发，艳可逾月；一折纯种桐，桐尽复种桃，而邻家松竹，更互相掩映，可称绿天红雨，绣幄香茵。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逗草拾翠之地。此山腰之大凡也。渐近山足，为“就麓新居”。初筑屋山上，已又作屋山下，故名。辟两板扉，有疏篱曲折，细柳平桥。水上天桃，照天曜日，人行花间，头面尽赤。入中门，榜曰“北山之北”。繁阴郁然，下有曲径，抵方池，渡斜桥。桥南北皆植梅，有老梅一株，是为梅祖，虬枝覆地，轻梢剪云，与池上垂杨，黄金白雪相亚而出。有斋两楹，面山临池，曰“三影”。予字子野，好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每岁催梅观荷于此，更为花朝祝花之地。斋后疏竹高秀，朱栏拳然。启其后户，达于小楼，曰“罨黛”。四山环之，翠色欲滴，阴晴改容，瞬息万状，雪朝月夜，于此最胜。此予坐卧处也。自楼而东，作轩三间，曰“语花”。有旁室，曰“蕉雨”。莫不花来镜里，树入床头，山眉雾鬓，绿生枕上。此朝云通德杂处处也。“三影斋”之西偏为“西清茗寮”。窗外有古梅修竹，蓄木奴数头，更种睡香一带，接“众香亭”。梅花开时，睡香助馥，闻二里许。疏云淡月之夜，薄醉微吟于此，令人恍恍有春思。亭前多桂，仰不见天，幽草闲花，总隶香国。每岁秋时，觴桂于此，更为月夕醉花之地。径折而南，启小门，入疏竹，有屋临水，扁曰“竹阑”。水月摇窗，风篁成韵，此留客止宿处也。中间为“秋水庵”。庵下有水，水上有竹，竹外是山，山上有桃，花时万斛红涛，势欲浮屋。庵前梧桐数株，壁立耸翠。更作“香霞台”，每岁锦茵绣幙，为牡丹洗妆于此。折而东，稍稍深阔，作轩其上，为“聊复轩”。轩内作暖室，曰“一灯十笏”，中供如来及纯阳祖师像，每清斋禅诵于此。轩前为“濯锦台”。台之东岸皆桃花，更有疏柳依依，高出其上，而东余烟翠，复衬其外。每岁柳绵飞时，送春于此。从轩而南，有小桥曰“济胜”。朱栏雁齿，达于竹外。绕径皆芙蓉，乃“聊复轩”东岸也。山展一足，插入短垣，就其高处，筑一草阁曰“妍稳”。轩中看桃花已胜，而于此更为奇观。盖凭高俯视，万锦毕集，红白交加，深浅互出，正恐武陵无此奇艳。每岁携妖姬、韵士问桃于此。阁不甚宏敞，而登此则“三影斋”之梅、“西清茗寮”之竹、“罨黛楼”之雪月、“众香亭”之桂、“秋水庵”之水竹、“聊复斋”（按，“斋”当为“轩”）之桃柳、“济胜桥”之芙蓉，以至“霞外亭”之桃梅、“春雨堂”之松竹，无不可坐而致也。此山足之大凡也。予盖经始于丙辰之冬，迄于丙寅，首尾十载。初作“春雨堂”，次作“霞外亭”，次作“三影斋”，次作“西清茗寮”，次作“罨黛楼”，次作“秋水庵”、“聊复轩”，次作“语花轩”，次作“妍稳阁”。盖贫翁不能顿办，且花木渐次成章，乃因而补赘之。此则予营

作之大凡也。予性苦城居，颇乐闲旷，己未冬移家泖西，而每岁春秋必来山中，或侵寻结夏，至十月而归。而梅花时，又遄至矣。居山中，雨不出，风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贵客不见，俗客不见，生客不见，意气客不见，惟与高衲、羽流、相知十数人往还。有见访者，杀鸡为黍而食之，无珍饈，家常五品而已。凡四时风景，山水花木之胜，皆谱撰小词，教山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箫管弦索，花影杯前，松风杖底，红牙隼舌，歌声入云，亦甚足为耳轮供养矣。更作一船曰“随庵”，风日和美，一叶如萍，半载琴书半携酒，红裙、草衲、名士、隐流，或履舄并载，历九峰，泛三泖，远不过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词，随付弦管。兴尽而返，阖门高卧。有贵势客强欲见者，令小童谢曰：“顷方买花归，兹复钓鱼去矣！”此则予居山之大凡也。《记》凡刻三石，一沈“三影斋”池心，一藏“散花台”下，一沈“北山泉”底。“北山泉”者，山居之井名也。清淳芳美，堪比慧泉。予曾有铭，《记》不及载。天启六年，岁在丙寅，五月五日，峰泖浪仙记。

全文一千五百言左右，记事、写景、抒情交织一起，文彩彬彀，妙思翩跹。浪仙氏之人品、格调、才华、情趣，于此亦可窥一斑。

另据《松江府志》卷七十八记载，施氏有两处别业，一即西余山居，一为泖上新居，绍莘均亲自作记，以资纪念。（《泖上新居记》尚未发现）

余山，在松江府城北二十五里，“高八十丈，广十八里”，旧传有余姓者居此而得名。有东、西两峰，故称东余、西余。东余多奇石，冯梦龙的友人、大名士陈继儒即隐于此，作别业号“东余山居”，筑有白石山房、神清之室、古香亭、含誉堂、顽仙庐、茗帚庵、鸚鵡冢、雪梅井、清微亭、高斋等。与施绍莘的西余山居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明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特别是明后期，更是杀机四伏，险象丛生，“环宇震动，四海沸腾”，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文人，科举无门，仕途绝路，空有济世大志，实无回天之力。转而远离城市，寄情山水，矛盾的心态被扭曲地表现出来，将内心的追求外化为放浪的风神，逐渐走上遁身世外，以求超脱的道路。他们厌弃恶浊的现实政治和喧嚣伪诈的城市生活，竭力从世俗转向自然，转向峰泖之胜、田园之趣，追求所谓“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境界，并于此得到情感的陶冶和宣泄、满足和自娱。于是，明末文士圈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所谓“晋人风神”的清流。冯梦龙即被时人誉为“晋人风度汉循良”（钱谦益“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而陈继儒的放达，更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轻易做到。二十八岁那年，他将儒冠撕碎投呈官府，并作书：“住世出世，喧静各别；禄养色养，潜见则同。揣摩一世，真如对镜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语言铿锵，掷地有声。难怪全县士子，惊诧不已。陈继儒甚至临终之前，还狂饮至醉，兴起下床，头插鲜花，婆婆起舞，尽兴方罢，瞑目鼓掌，大笑而逝。《金山县志》卷二十五载云：“泖滨古多隐君子，宋元以来，高风亮节，代不乏人。明季遭时多故，有志之士，怀清履洁，甘辱泥涂，其节愈坚，其心亦愈苦矣！”相当深刻地

（下转第77页）

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

——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

〔新加坡〕 王润华

一、从英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想起

1990年我在伦敦大学做研究，前后共有二个月。每天到泰晤士河畔那一带散步，看见西敏士大教堂，就要买一张票进去瞻仰老半天。我不是喜欢看帝王将相、皇亲国戚的遗容，而是独爱诗人之隅（Poets' Corner）的象征意义。这里的坟墓、雕像、纪念碑，不但代表英国重视诗人作家，把他们与帝王将相、上帝神权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代表英国文化包涵量之大方。正统的作家，反传统的作家（如拜伦）通通都被接纳，虽然拜伦曾一度被西敏士的主持人禁止进入，可是最后拜伦还是无比神气地被请进去了。描写英国本土的作家固然受到重视，只关心外国的作家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受到一视同仁的供奉。一些原是外国的英文作家，如澳洲的哥顿（Lindsay Gordon）、美国的艾略特（T.S.Eliot）、詹姆斯（Henry James）、郎费罗（H.W. Longfellow），都被英国抢过来，供奉在西敏士大教堂内。^①

西敏士的诗人之隅，空间虽小，意义却很大，它象征一个没有国家界限的英文文学大同世界。在英国人的文学认识中，凡是用英文创作的作家，不管其国籍，只要他是伟大的作家，都将被接纳进英国文学的领域里。譬如印度诗人泰戈尔（R.Tagore），他的英文诗，也被录选进《牛津现代英文诗选》中。^②目前世界各地的英文文学作品，特别是在英国以前殖民地的英文作家的作品，英国、加拿大、澳洲，都争先恐后地去研究。

从西敏士的诗人之隅到大英联邦英文文学的研究，使我想起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也该要建设起来了。^③

二、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建立的文学传统谈起

一个国家的文学成长，首先需要作家写出好作品，建立起一个文学传统，然后走向自己的国家，走进自己的社会，受到自己国家社会的承认，赢取自己国家读者的信心，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学才能算是长成，可以开始走向世界。

新加坡华文文学基本上已顺利完成这一段历史路程。^④作为构成新加坡国家文学一环的华文文学，它远比东南亚地区及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来得幸运。自建国以来，华文文学就一直被纳入国家文学里，其地位与价值完全被接受和肯定。新加坡的华文文学

作品，很早以来，就被列入中学课本与会考出题范围内，在大学中文系里，新马华文文学也成为教学科目与研究对象。新加坡全国性的文学奖，如公共服务勋章、文化奖（文学）、书籍理事会的书籍奖，华文文学作品之成就都受到应有之承认与表扬。^⑤一些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奖励，如东南亚文学奖、亚细安文化奖（文学类）、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华文作家都能共享这种荣誉与奖励。^⑥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学选集如《亚细安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⑦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所占的篇幅比例，比其他三种语文还多，因为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在过去，华文文学远比其他三种语文的文学来得蓬勃，作家、作品、读者，都比马来文、淡米尔文及英文文学多。^⑧

东南亚其他国家，像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甚至印尼，都有悠久的创作历史，而且产生了许多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作品。每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各有其独特性，各自反映其国家与社会。因此，整个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反映了这地区的许多共同特点和不同的地区色彩。因此近十多年来，已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研究。^⑨

1988年8月，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德国哥德学院，联合在新加坡主办了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美国、西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韩国、澳洲、及东南亚各国都有学者参加并提出研究论文；这一次的会议证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而且日渐专门化和深入化，世界著名大学的大门已为东南亚本地区的文学打开。^⑩

三、从“双重传统”、“多元文学中心”看世界华文文学

在上述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会议上，周策纵教授特地受邀前来作总评。在听取了二十七篇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后，他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者与学者，都应该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⑪

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这个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以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人来说，跟中国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

当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

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因此，周策纵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

目前英文文学的发展，也是形成一个如此多元文学中心的局面。除了英国本土是英文文学的一个中心之外，今天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印度及许多以前英国的殖民地，都各自形成一个英文文学中心。在他们的心目中，英国以外的英文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支流，而是另一个中心。英文文学的发展，比华文文学更复杂，因为许多国家的作家甚至不是白人，而是其他民族，包括印度人、华人（在新马）、非洲的黑人。

四、欧美留学生文学已具有本土的文学传统

在1989至1990年间，我先后到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访问，前后生活了一年。在加拿大有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在英国有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在欧洲大陆，现有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分会，在美国有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这些组织之成立，都是这几年的事情，由此可知欧美各国作家对自己在当地生根成长，自成一个中心的认识与关心。我在各国与作家接触的结果，发现这些住在欧美的作家，已逐渐脱离早期留学生文学、放逐文学，而形成加拿大华文文学、美国华文文学、英国华文文学的时期。原因很简单，他们在欧美住了二、三十年，在心理和社会关系上，距离台湾、香港愈来愈远，而一方面，对侨居地却拥抱得更紧，因此当地的社会生活经验，就更多的进入他们的文学作品里。我觉得在加拿大和美国，很多作家的作品已生长出上面所说的“本土的文学传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单纯地看作“来自台湾的作家或来自香港的作家”。今天，美国、加拿大、欧洲，许多作家已建立起他们各自的华文文学传统。香港三联书店所出版的《海外文丛》中的文学创作集，便反映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已达到不可漠视的历史阶段，所以编者说：

中国人移居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期以华工为多，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前往定居，于是，出现了一批华人作家。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华人作家已经从较单纯的“留学生文学”脱颖而出，他们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域，更深邃的社会层面，他们与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检视一个迁徙动荡时代的史歌。近十余年来，名家辈出，佳作纷陈，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影响日渐深远，本店有见及此，特筹划出版一套《海外文丛》。⑩

这套《海外文丛》所收集的作家像陈若曦、聂华苓、张错、非马、叶维廉，个个都已经在新大陆的土地上长了根，他们的作品都染有新大陆的泥土、气候、社会的特点。

五、重新认识我们的华文文学

英文文学已发展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每年最好的诗，最好的小说，最好的戏剧，不一定出自英国英文作家之手，它可能出自印度的或非洲的非白人作家之笔。同样的，如果我们公平地评审一下，每年最好的华文小说或诗歌，很可能出自新加坡华文作家或马来西亚作家之笔，他们不一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华文文学已出现新的局面，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华文文学。

1986年刘绍铭与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德国举办了“世界华文文学国际会议”后，来自台湾、大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代表决定编辑一册《世界中文小说选》。一年后书终于出版。如果我们细心细读各地的作品，首先必然发现“本地传统”之存在，其次最好的作品不一定全出自中国大陆与台湾作家之手，最坏的也未必全是属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作家。^⑩

所以我们有重新认识我们的华文文学的必要。

六、瞻望二十一世纪的华文文学

我在上面曾指出，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是目前世界上在中国以外唯一被接受为国家文学的华文文学，它与英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等文学构成新加坡文学。华文文学在其他国家，即使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只被当作少数民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看待。英国的文学史，美国的文学史，马来西亚的文学史，绝对禁止用华文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走进去，即使像美国的白先勇、加拿大的东方白、马来西亚的李永平，虽然是一流作家，也都因为华文和肤色被摒弃门外。^⑪

不过这种以语言和种族建立起的围墙，在二十一世纪恐怕会被拆除。目前许多国家，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都强调多元种族文化的重要性。美国学者近十多年的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文学，不管用英文或母语创作的，过去完全受到漠视，只有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的作品才受到重视，可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品，却是美国的重要心声，同时也是极有成就的艺术品。把这些被漠视的作家的作品放进美国文学史中，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声音，在日愈开放的今天世界，加以大量的移民，我相信许多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势必让步，承认和接纳其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为国家文学。美国的德克萨斯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在1976年曾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把各种族的文学作一检讨，其结论是把优秀的作家纳入美国文学，把美国文学种族多元化，这样做只有提高美国文学之世界地位，绝不会把它拉低。^⑫

⑩ 余光中有一篇写西敏士的散文，描述深入，题为《不朽，是一堆顽石》，见《青春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1—14页。

⑪ W. B. Yeats, *The Oxford Book of Verse, 1892-1935* (Oxford: Carendon Press, 1936) 泰戈爾的诗共被录取七首，见63—67页。

⑫ 关于世界英文文学之概况，请看Bruce King (ed),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in Englis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William Walsh,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 王润华《走向世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欢迎词》，见王润华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哥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1989），2—4页。

⑤ 曾获得公共服务勋章的华文作家有苗秀；文化奖文学类的有黄孟文、王润华、周燦三人；书籍理事会的书籍奖的作家很多，包括苗秀的《残夜》、何玉锦的《在白云间》、林白的《长哭当歌》、李过的《曲折的路》、《白粉佳人》、孙爱玲的《玉魂扣》（以上小说）、谢清的《哭泣的神》、柳北岸的《无色的虹》、周燦的《捕萤人》、淡莹的《太极诗谱》、丘柳川的《蕪蕪诗集》、南子的《萍果定律》、潘正镗的《告诉阳光》、梁钺的《茶如是说》、郭永秀的《筷子的故事》、希尼尔的《绑架岁月》（以上诗），此外还有散文及儿童文学奖。

⑥ 获东南亚文学奖的华文作家有黄孟文、王润华两人。

⑦ Edwin Thumboo, Wong Yoon Wah and others (eds),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 Vol I, (poetry), Vol II-III (fiction) (Singapor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1985, 1990), 其余散文与戏剧两集尚未出版。

⑧ 关于历年四种语文已出版的文学作品统计，见黄孟文、王润华编《新华文学作品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83），9—15页。

⑨ 关于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地区的文学发展，可参考王润华等编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论文。

⑩ 会议论文已出版，见前注⑨。

⑪ 周策纵的总评，见前注⑨，359—362页。

⑫ 这段说明印在《海外文丛》的背页上。《海外文丛》已出版的个人专集包括陈若曦、聂华苓、蓝菱、非马、张错、诚然谷、袁则难、李黎、秦松、叶子、赵淑侠等人的作品。

⑬ 刘绍铭、马汉茂（策划编辑），王德威（台湾）、李陀（大陆）、黄维梁（香港）、姚拓（马来西亚）、施颖洲（菲律宾）、王润华（新加坡）任地区编辑。《世界中文小说选》上下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7）。

⑭ 白先勇重要作品有小说集《滴仙记》、《台北人》等；东方白的小说集有《黄金梦》、《东方寓言》及长篇小说《露意湖》、《浪淘沙》；李永平的小说集有《拉子妇》、《吉隆春秋》。

⑮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研讨会论文已出版：Nolodymyr T. Zyla and Werdell Aycock (eds), Ethnic Literatures Since 1776: The Many Voices of America, 2 Vols (Lubbock, Texas: Texas Tech Press, 1978)。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调整着视角的华文文学研究

——“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承办，自1991年7月10日至13日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镇举行。160余人到会，是历届会议域外代表最多的一届。其中台湾3人，香港13人，澳门3人，海外各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澳大利亚、泰国）18人。会议收到专著2部、论文92篇，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等领域，而以小说、诗歌、散文为主。会议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格局和趋势，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成果和不足，对如何推进和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文化的影响研究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承传和衍变。正如有的代表所言，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一条长河的话，它已经流入大海，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它如何撞击、融合、再生。

饶芃子的论文《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就试图通过研究一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推导出世界各国华文文学形成的一般规律。她谈道，早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属于侨民文学，后来，随着华人在泰国经济开发的成功，华人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参政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华人有了落地生根的观念，“这些，正好表现出华泰两族文化长期接触、融合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华族文化观念。”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泰华文学，既继承了中华文化母体的文学财富，又植根在泰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上，“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构成了泰华文学的特色。”推而论之，“世界各国的华

文文学，虽然都出自同一源体，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们已经分别与各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各自成为所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过，本届会议的文化影响研究，更多的旨在揭示世界华文文学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衍进中的具体特点。如王振科的《试论新马华文诗歌的“泛中国文化倾向”》谈道，虽然中华文化作为“源文化”已衍变为新马华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华族文化”）而世代相传。然而，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使新马华族文化已面临着因“失落”而要“重认”的困惑与矛盾。正是在此形势下，出现了新马华文诗歌中的“泛中国文化倾向”。它通过文学有选择地赞颂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复甦和重新确立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心理”，也使传统文化更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从根本上挽救传统文化。”

在台湾，多元文化（原住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作用，因以中原文化为主导而与泰国和新马的不同。刘登翰《论台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分析道，“作为一种优势文化，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带动着原住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原住民族文化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又使它葆有自己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它们共同构成台湾本土的民族文化”，“规定着台湾文学发展的民族方向。”而外来文化常常都有政治或经济侵入的背景，往往反而“促进了台湾本土文化内在凝聚力的增强”，因而有台湾“乡土文学”口号的特殊内涵和“乡土文学运动”的几度崛起。陆士清《试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亦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不仅具有“中国意识”，而且，“‘中国意识’恰恰是台湾新文学的灵魂。”不

过，如刘文所言当面临要突破传统束缚的时候，外来的异质文化作为新加入的因素，却又形成了传统变革的外部环境。安兴本《管窥与泛视》，就是从台湾“世界级”长篇小说《失声画眉》的文本，读出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现代文化的冲击导致台湾歌仔戏（本土文化的象征）的衰落与危机。据朱双一《八十年代台湾文学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感应》的观察，经过30年纷争之后，台湾作家近十多年对传统、本土、现代三方面文化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已达到比较一致的体认，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精神”、“采纳世界性现代文学的表达技巧”、“掌握台湾本土的文化环境与当代意识。”张恒春《论台湾现代派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变迁》，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也看到，台湾现代派就是在传统文化（感时忧国的文学精神）和西方文化（人道主义的文学倾向）的整合中获得新生和发展的。

二、在诗学层面掘进

本届会议的华文文学研究，加强诗学层面的开掘颇引人注目。如杜国清的《宋诗与台湾现代诗》所做的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就引起较大反响。他认为，唐诗倾向于感物而言情，宋诗倾向于体物而浏亮，它们分别代表着诗之两仪——情（heart）和知（mind）的倾向；中国诗到了宋诗的出现才算大体完备了。台湾现代诗也强调知性的思考，它反对传统，和宋诗一样都自觉创新、讲究技法。同时，它还受到爱略特（T. S. Eliot）和里尔克（R. M. Rilke）等人西方现代诗观的影响，不象宋诗那样以理为诗，而有将形而上的思想加以形象化创造的倾向。通过中西两个向度的影响比较，使人们对台湾现代诗的历史定位在诗学的层面有了新认识。

孟樊《台湾的写实主义诗学》，则在梳理世界文学的写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写实主义的诗学原理；并结合70年代出现于台湾的写实诗歌的主张和创作，总结台湾的写实主义诗学，从而在诗学和台湾诗歌流派发展两方面的研究都有所突破。

简政珍的《放逐诗学》，则以世界文化比较的宽广视野，对台湾诗歌中的寻根意识做了系统的“放逐”母题研究，对“家”的空间意象，对因祖国分裂而牵系着大陆、或牵系着台湾、或已不知何方为家的复杂多样的乡愁和痛苦，对这一时代台

湾文学中出现的放逐的“集体意识”及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和社会心理的现实，层层剖析，充满感情，充分表达了两岸儿女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阐释“意象”这一古老翻新的观念，近年已逐渐形成意象批评一派。本届会议除上面提到的简文外，还有不少论文深入意象层面探讨华文文学现象的。如李元洛《中国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意象词、意象语、意象结构等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台湾及海外新诗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承继现象。周建新《从“新月”到“蓝星”》，则根据意象运用的变化，探讨余光中对徐志摩的承传和超越，甚至据以简括新诗发展的历程。李丽中的《血痕与墨痕》，亦借助意象观念去探索台湾诗歌的去向。曹惠民《陶然的“散文现代化”探索》，则把意象批评用到散文研究之中，发现以“意象表达心境与感受，是陶然近期散文的自觉追求。”

不过，散文研究向来赏析性品评的成分较多，并没有一定的批评模式。本届会议的散文研究，如杜元明《试论台湾散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徐学《从古典到现代》、张振金《香港散文的特质和流向》、陈贤茂《新马散文掠影》等，都是某一地区或国家散文的综合研究，却各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杜文从台湾散文的题材内容归纳其文化内涵，并探讨作为“美文”的散文语言及其所表现的流派特征；徐文则以中国古典文学观和古典散文的特质，与台湾现代散文相比较；张文则倾向于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考察香港散文的特质和流向，属社会批评一路；而陈文则是“掠影”式的品评介绍。

三、总体认识华文文学的形成与格局

诚如黄维梁所言：“十年文事一翻新。”本届会议出现了一些对世界华文文学作总体研究的论文：赖伯疆《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潘亚曦和汪义生《东西华文文学导论》、王润华《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其中，王文推出了“多元文化中心说”，尤其引人注目，引起了与会者激烈的讨论。他从英文文学的世界大同联想到建设华文文学大同世界的一般格局和规律，重申了美国周策纵先生1989年8月在新加坡“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论述了华

文文学在所在国(或地区)的发展中存在“双重传统”(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原理。他认为:“当一个地区的华文文学建立起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它“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

由于“Center”在英语中含义较广,而“中心”在汉语中含义较狭,容易引起误会(有如北斗而众星拱之),黄维梁提议用“地区”一词代替。王一桃则认为,多中心论根本不宜提,中心只有一个,华文文学是一个总体,它与各国华文文学之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根和叶的关系。有的学者却以为,如提以中国为中心,会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饶芃子指出,“多元文学中心论”的含义与“多中心”有实质的不同,它是与双重文学传统的特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华文文学到了海外,除了原先传统的根的特性之外,还要融入当地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影响,成为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这就会出现双重文化——文学传统的特性。

与审视世界华文文学的构成因素和形成规律的视角不同,赖伯疆按各地华文文学发展的程度、规模以及它在所在国中的地位等实际情况进行概括,把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格局归纳为:一个中心,即中国,含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两个基地,即①东南亚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②北美;三个发展地区,即澳洲、欧洲、非洲。

潘、汪则从华文文学所在国的文化色彩、社会状况、风土人情诸因素入手,把握各地华文文学的意蕴和特征,将海外华文文学分为两大板块:东方大板块,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体,包含东亚,东方文化色彩浓郁,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西方大板块,以美华文学为主体,另有南、北美洲,此地华文文学处于异己的文化环境中,

很难与西方文化认同。

如果从本届会议出现的相当一批纵谈一国(或地区)华文文学史的文章来看,如戈云《美国华文文学之兴盛与隐忧》、戴小华《八十年代马华文学的思潮》、流军《马华文学的渊源与发展》、黄孟文《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短篇小说》、苏卫红《战后二十年新马华小说》、楼肇明《台湾散文四十年发展的轮廓》、吴奕琦《四十年来当代台湾散文的发展(提纲)》等,虽然大陆学者与海外作家的视界有明显差别,前四位海外作家均侧重于作家、作品及相关的社会现实较为全面的描述介绍,后三位大陆学者却都侧重于评论和概括而未作史料的全面介绍,但是这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本身,客观上则都是对该国(地区)华文文学已独立衍进的地域传统的确认。

从语言状况来看,台港澳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长期受到了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外来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但它们都是以华语或其方言为社会共同语的,与大陆的语言状况较接近,只是因隔绝而出现与母体缓慢趋异的倾向。东南亚地区的华语,则与当地语言以及仍然保存的原殖民语言共存于双语制或多语制的国度,这不仅反映着各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共存、交融的状况,华语在语言的碰撞中吸收、融合、变异的现象亦已反映到此地华文文学之中。欧美等地的华文文学,则是以“外文”或少数民族语文描写当地文化背景下的(华人)生活及其心绪。然而,在不同地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华文,它所表征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本土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无疑是一个有待不断深入探讨的课题。

(陶原珂)

切实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

——东莞市“科技兴市”问题的思考

姚锦柏

一

人类历史表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起着巨大的作用。一百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三要素及其组合效应所发生质的变革中,起着主导作用,也就是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间的竞争,实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谁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抢占了科学的制高点,谁就能抢占高科技产品的市场,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被动、落后,甚至挨打。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对指导我们当前的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在实际工作中,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与企业的关系上。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凭着人文地缘的优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以80年不变价计)、社会

总产值分别为64.62亿元、4959元、53.15亿元、71.04亿元和124.42亿元,分别比1980年翻了3.1番、3番、3番、3番和3.2番,每年递增速度为24.81%、22.97%、23.73%、23.10%和25.63%,高于全国、全省同期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亚洲“四小龙”(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60年代12.22%、70年代18.8%的年递增速度。但是过去的12年,我们从总体上来说,是走了一条速度型和物质投入型的发展道路,主要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而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劳动力密集型粗放经营经济。这种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因此,其发展潜力是有限度的。从1987年—1989年,我市工业产值年递增25.96%,按道格拉斯函数测算:资金投入的贡献为39.41%,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为44.06%,而科技进步的贡献仅为16.53%,乡镇工业增长中,科技进步只占11.6%。这表明,科学技术在我市经济发展中,未起到第一位的作用,经济建设未走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自身对科技的要求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力量自身和赖以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尚不够成熟,至使科学技术既被束缚,又软弱无力。其主要表现为:

1. 缺乏强烈的科技首位意识。由于我市在政策和人文地缘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兼之外延性速度型经济具有巨大的惯性,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仍有一定的潜力,所以,人们未能

体会到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思想上没有科技首位的意识。虽然我们的工作重点迅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没有同时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这样，我市经济建设仍未能实现由物质主导型外延扩大再生产向科技进步主导型转变，走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

2. 科技投入逐步增长，但远远不足。近年来，虽然科技经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地方财政每年拨出400多万元作为我市科研事业经费。1986年至1990年五年中，还颁发了科技进步奖金13.05万元。同期，市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科、书、博”工程建设。但是，我市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以1990年为例，我市财政拨出三项经费230万元，科技事业费293.7万元，两者合共523.7万元，仅占当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0.08%，远远低于同期国家和省的水平，更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同时，我市科技投入的主战场——企业的科技开发经费投入不落实，银行没有一定的科技贷款额度，社会科技投入渠道还未疏通。

3. 加强了引导，但措施不得力，扶持科技发展的力量不足。我市越来越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1989年市委市政府就如何发展我市科技作了专门布置，但由于缺乏一整套保证科技进步和促使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具体措施，缺乏必要的经济杠杆和行政干预，科技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4. 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但科技人才与劳动者素质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矛盾依然突出。1986年以来，我市通过自己培养和招聘引进相结合的办法，全市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1990年底止，全市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已取得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的人员有15099人，外资企业还招聘各类科技人员8070人，这些科技人员遍布全市，为我市经济和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科技人才与“科技兴市”的要求很不相适应，人才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短缺，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比例偏低。以1990年为例，全市科技人员仅占全市总人口的1.15%，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只有62人，仅占工程技术人员2.98%，具有高级职称的农业技术人员只有2人，在基层的农业技术人员更为不足。每10万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程度的只有554人，大大低于

全国、全省的平均值。全市有9000多个企业，而各种技术管理人员不足5000人，平均每个企业仅半个，我市这种人才数量、结构，很难推动经济发展。

5. 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中试基地和科普网络，但科技管理和科研机构不健全的问题远未解决。目前，市一级的综合科研机构4个，部门一级机构2个，企业科研机构2个，民办科研机构5个，科技示范中试培训基地8个，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484个，全市33个镇（区）基本普及了七站两所，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部分科研机构的设备和科研能力基本上还停留在70年代水平，经费、设备、人才缺乏，影响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现有科研机构以农业为主，工业类科研机构还是空白，企业办科研机构刚刚起步，这与我市工业发展水平很不适应；其次，我市的科技管理机构尚不配套，影响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科技工作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再次，我市的科研中介、信息、服务机构的设置也未跟上，制约了我国的科技进步。

6. 引进、消化、吸收了一批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但未形成自身的坚实的科技依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先后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34.4万台（套）。通过消化吸收，在1986年至1990年五年中，取得了市一级科技成果和科技进步奖有245项。这批科技成果，绝大部分收到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我市消化、吸收、创新进展缓慢，水平很低，对大多数引进的技术设备，只是掌握一般的使用和管理技术。我市科技方面很多指标处于全国、全省的中下游水平。

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日趋迫切。一方面，原有的许多优惠政策已作调整，人文地缘优势逐渐消失，只有转变思想，确立依靠科技进步参与竞争的观念，以科技进步取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已具备了一定的资金和人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已成为必要和可能。东莞市委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在已翻了三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半，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市委提出“科技兴

市”的战略。但如何实现“科技兴市”呢？我认为应采取如下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1. 强化科技首位意识。我市不少领导干部已在实践中认识到科技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还谈不上全市已树立科技兴市的战略思想。我们要通过广泛、持久地宣传科技进步的意义，展示世界发展潮流，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统一认识，共同参与，形成抓经济建设就必须抓科技进步，必须抓发展第一生产力的共识。充分认识“科技兴市”是实现今后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目标、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是今后全市经济建设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将“科技兴市”的战略思想变为全市的自觉行动。

2. 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各方配合、健全“科技兴市”体系。市、镇、管理区和主管经济工作的战线、局、总公司都要“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并设立相应的科技管理机构抓“科技兴市”工作。用好用足国家现有政策，并结合我市的实际，制订有利于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财税、信贷、创汇等政策。实行科技倾斜政策，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科技投资体系。全市每年度要拨给财政收入1~2%作为科技三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东莞市科技发展基金，市财政每年要拨出300万元作为科技开发基金。激励企业对科技投入，发挥其主体作用，按国家和省的要求，企业从销售总额中税前提取1~2%的金额作为企业科技开发基金。积极鼓励外商投资兴办高科技项目。充分发挥各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市科委发挥其作为市政府决策“科技兴市”工作的参谋部作用，强化其管理职能，抓好科技开发服务工作，发挥科技情报信息服务功能；市科协充分发挥其纽带作用。人才是“科技兴市”战略实施的关键，全社会特别是教育部门抓好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继续走引进与培养相结合、高层次人才与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并举的道路。通过努力，我们要建立一个领导、政策、资金、人才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促进科技发展，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3. 增强我市科研自身实力，建立和健全科技进步的执行体系。为了增强我市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品种的消化、吸收、试验和推

广应用的能力，必须健全我市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根据我市的实际，从三个层次完善科技进步的执行体系。第一层次，要充实和加强市及部门一级科研机构力量。市委、市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发明创造的工作机构，组织科研攻关。重点办好市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尽快发挥其作用。第二层次，企业集团和工厂要开办技术开发研究所，加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开发和推广应用，以及科研成果的创新能力和要求千万元以上产值的企业都要建立和健全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各镇（区）亦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七站两所，并更新、充实设备，广招人才。管理区应培训2—3名农业技术人员。通过把科研力量充实到基层，形成一个强大的科研网络，切实把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第三层次，扶持民办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这是一条引进外地技术和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我市增强技术开发能力的有益补充。我市应提供优惠，吸引外省专家来我市开办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以及转让、合作等方式吸引国内外科技力量来我市，大力进行科技开发。此外，我市各类技术开发机构要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所的横向联系，建立技术依托关系，充实技术开发力量，建立和扩大高新技术开发区。

4. 落实措施，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运转体系。我市要坚决深入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按照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朝着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方向建立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的运行体系。计划管理运行机制方面，市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科研成果推广计划”、“科研攻关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有计划地推广我市产业的高层次、高效益发展。在实施以上计划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调节机制，逐步开展课题招标、项目承包、技术合同等改革。通过量化企业技术指标，将其纳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企业升级指标体系，建立厂长（经理）领导下的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由总工程师领导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和技术管理体系，使责权利相结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动广大科技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下转第36页）

取之于侨 用之于民

——潮州市金石镇利用华侨捐资为民造福情况调查

杨 越 李鸿生

人们一谈起潮汕平原的发展条件，总是念念不忘其“华侨优势”。是的，潮汕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这里有与潮汕现有人口相等的近一千万海外潮人。这些潮人在他们的侨居地辛勤劳动，苦心经营，许多人积累了程度不等的财富。他们都热爱桑梓，愿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历史传统。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华侨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现实，还得创造许多条件，否则，这还是镜子里面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得。促成这种转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取之于侨，用之于民，取之有道，为民造福。这就是金石镇领导总结出来的“十六字经验”。我们在调查中，看到金石镇在侨胞捐资的使用上，确实做到这十六个字，所以，连年成果累累。广大群众对镇领导几年来充分发挥侨乡优势，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办实事，为民造福，赞不绝口。

金石镇是重点侨乡之一。华侨多，分布广，足迹遍及东南亚、欧美、澳洲。仅有5万多人口的金石镇，有海外侨胞约1.8万人，旅居港澳台的同胞2150人。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精力，经过几代人克勤克俭，流血流汗，终于涌现出一批风流人物，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政治界享有声誉：有的是实业家、事业家；有的是著名作家、科技精英；有的是议会议员、政府部长。他们不管生活在那里，从事何种职业，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乐意捐资在家乡办福利事业。但是，过去或由于侨务政策中的不智，伤了侨心；或由于使用华侨捐资工作中的失误，引起不满；或因为个别人的作风和行为不检，致使华侨对家乡的办事效率和捐资的使用不放心。许多侨胞站在国门之外，翘首观望，犹豫徘徊。针对以上情况，金石镇领导一方面认真落实侨务政策，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对全镇侨房进行全面调查核对，全部落实归还侨属，不留手尾；另一方面坚决杜绝不正之风，认真改进工作，努力提高效率。从而了解了侨情，广结了侨众，争得了侨心。

金石镇领导这种认认真真办实事的作风，成为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首要条件。新加坡著名实业家兼侨领郑镜鸿先生，几度还乡，曾多次关注家乡公益，但总感觉家乡办事不尽人意，而使其宿愿未能实现。去冬再度省亲，与镇领导有了新的接触，产生新的

感受和认识。从而决定捐资800万，拓建镜鸿路，改善家乡交通。此外，还捐资兴建华侨医院和改水工程。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兴办湖美小学。郑镜鸿先生热心家乡公益，堪称侨胞楷模，家乡人人有口皆碑。又如马来西亚著名侨领林进华先生有捐资兴学的愿望，又担心家乡办事效率低和捐资使用不当，金石镇领导悉知这一情况后，立刻通过各种渠道，加强联系，并制订详细方案，征求意见，终于取得林先生的信赖。镇主要领导又亲抓工程的进度和资金的使用。结果，仅用了八个多月时间，便建成一所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美观、坚固、明亮、宽敞的林周全中学。100多万元 的捐资，收支出入，清清楚楚，账目往来，明明白白。只是在建校竣工那天，花了86元购买糖果慰问辛劳了几个月的工人们，算是额外开支。林进华先生非常满意。消息传到海外，闻者都刮目相看，称赞不迭。林进华先生更是慷慨解囊，又捐资150多万元，兴建金石中学。不久前，兴建龙阁学校的倡议者、主要捐资人、新加坡作家蓉子女士回乡探亲时，镇委书记热情登门拜访，亲自陪同勘察建校地点，按照捐资人的合理要求，修改建校图纸。对于这种认真细致的作风，连原来习惯新加坡社会认真办事的风气的蓉子女士也赞赏不已。

金石镇领导在与华侨交往中热情有礼，不摆架子，不打官腔；在使用华侨捐资时廉洁奉公，言必信，行必果，效率高，工作细，大大改变了华侨的观感。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家乡不在金石镇的新加坡杰出侨领刘学伟先生也为金石做出巨大贡献。他说：金石有这么好的官员，华侨给家乡捐资就放心啰。于是他热情地为金石镇穿针引线，架桥铺路，替金石引来一笔笔侨资，支援金石建设。全镇人民万分感激刘学伟先生的深情厚谊。

近十年来，金石华侨共捐资1615万元，支援家乡建设。如何使用这笔资金，镇领导念念不忘的是为民造福。他们把全部捐资都用在为群众办实事，为人民谋幸福。先后新建中学三所、小学九所、幼儿园二所、敬老院十所、医院一座、民房九十多间。还修建了道路和完成湖尾的水改工程。而从未挪用华侨捐资，更没有在封建迷信活动上花一分钱。其实，我们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主张，说到底，不外就是要为民造福。在我们现阶段的条件下，国家还不富裕，社会还不发达，为民造福不能不受着物质条件的制约。但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和干部，是不是时时、事事、处处有颗为民造福之心。在我们与金石镇领导的接触中，我们强烈感觉到他们这颗心的跳动，因此，他们才有可能坚定不移地把那一笔笔华侨的捐款投入为民造福的实事之中。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金石镇领导还把华侨捐资和镇的投资配套使用，更好地发挥效益，为民造福。华侨捐资兴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镇里便拨款和多方集资，修建教师宿舍，改善教师住房条件。最近，又有四幢五层楼共有住房50套，总面积达3300平方米的教师宿舍楼落成，从而彻底解决了全镇教师的住房问题。使教师们安心从事教育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金石镇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改善投资环境，是振兴金石经济的重要条件。镇里决心首先解决通讯和交通问题。先拨款安装400门程控电话，与潮州市联网，可以直拨世界各地。又着手修筑镜鸿路，贯

通全镇干道，连接潮汕公路。这一工程，需拆迁原路侧的几十户住宅，这通常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镇委书记洪楚茂、镇长许文海带领干部挨家挨户征求拆迁户的意见，最后，决定除了按章给拆迁户以经济补偿，另盖新房外，还在市场内为他们安排好摊位，便于他们做生意，解决生活问题。由于领导处处为群众着想，照顾群众的利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一条7公里长、8~10米宽的公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便出现在中离溪畔，既畅通了交通，又美化了镇容。

金石镇历来是附近几个镇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集市贸易越来越兴旺，镇领导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兴修商住楼和开辟洗马池及灰窑尾小商品市场，以促进贸易，繁荣经济。当金石的华侨闻悉这一信息后，又有热心者愿意捐资，支持镇领导继续为家乡人民办实事，建设富裕文明的新金石。

金石镇在潮州市辖属的二十三个镇中，人口和地域，不过排在中间，而近年来这个镇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特别是侨务工作和发挥华侨捐资工作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这一现象，引起我们的兴趣，在与镇的主要领导人洪楚茂书记的接触过程中，我们曾向他提出一系列的问号，其中主要是关于华侨捐资的使用问题。把这位青年书记的谈话概括起来，主要是：在我们的十六字经验中，核心是“为民”二字。我们始终致力把这个核心思想贯穿到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之中，这是我们处理捐资的宗旨，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抱定这个“为民造福”的宗旨，就能用我们的行为去启动侨胞的爱乡之心，赢得侨胞的信任，乐意协助建设家乡。也就是说，去把潜在的“华侨优势”转化为现实，这比口头上的千言万语更有力量，因为侨胞捐资家乡为的就是要“为民造福”嘛！

这番平凡的语言，说出一个平凡的真理，是颇引人深思的。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就以此作为我们的调查报告的“结束语”吧。

外向型企业发展道路的实践与思考

——记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广东省市头甘化厂

罗文金

在制糖工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广东省市头甘化厂近年来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有的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1988年、1989年、1990年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3.5%、6.77%和23.40%，销售收入1988年1.1亿元，1989年1.71亿元，比上年增长58.28%，1990年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6%，此两项均创该厂历史最好水平。实现利润1989年比1988年增长9.45%，1990年比1989年增长15.39%（抵扣糖的政策亏损1587.98万元之后）。1988年出口产值442万元，创汇127.7万美元，1989年比上年增长30.70%，1990年比1989年增长43.8%。职工收入和其它福利亦同时有所增长。1988年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1988年至1990年所生产的一级白砂糖荣获轻工部的优质产品奖。现在，该厂已发展拥有集体经济企业9个，外资合营企业8家，境外联营企业2家，国内联营企业8家，全民经济企业5家。除生产糖、酒精外，还先后增加了其他18种产品。

该厂所以能在困境中保持兴旺，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外引内联，不断增强承受能力和发展生产后劲。具体说，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搞好内部改革，增强经济实力

1. 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造。该厂前身是市头糖厂，建于1934年，抗战期间被毁，1951年复建，机器陈旧落后，产品产量、质量长期处在同行业的下游水平。为摆脱落后，赶超先进，该厂从1975年开始，逐年进行技术改造。1982年，对压榨、制糖、动力和酒精分厂进行了彻底更新。

从1982至1987年，逐渐形成了日榨甘蔗5000吨的生产力，酒精生产也增长一倍，达到日产32吨。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能耗下降，仅1987—1990年，煤耗与蔗比平均为5.44%，节约标煤2378吨。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仅两个榨季就还清了银行贷款。1985年与轻工部广州设计院合作，试验成功石灰回溶碳酸法制糖新工艺，可以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优级糖，填补了我国制糖工艺技术的一项空白，为增加糖、酒精出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 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1983年，该厂在大力推行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着手试行企业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把部分科、车间和部门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公司。随后把6个车间改为5个分厂，并成立9个公司。通过这些改革，下放管理权后，调动了中层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使厂部可以摆脱较多日常事务的羁绊，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发展多种经营。

3. 成立广州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该厂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勇于开拓新路子。1985年，着手与法国糖业食品集团合作项目。当时，国家有关中外联营的政策尚不完善，该厂认为，对方是集团公司，以一个厂的身份与之联营，资格较低，不太合适。为了使这个合作项目能够顺利进行，须以公司与之联营。于是成立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与之成立中法糖业食品工程公司，是该厂属下的一个中外合资单位，开展咨询和介绍工程等业务。开业以来，已盈利30多万美元，双方都希望继续合作，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境内投资实业。市头实业有限总公司的成立，使该厂摆脱了

单一经营局面，开创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和外引内联的新路子。

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加快外向型企业转变的步伐

近几年来，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该厂着重改善了能源、交通、通讯、土地、人才等方面条件，取得初步成效。主要项目有：

(1) 办热电厂、水厂，保证能源及工业用水需要；(2) 购置现代通讯设备，沟通与世界重要地区的信息；(3) 支持地方修公路，缩短了工厂与广州之间的距离；(4) 积极筹建万吨级配套码头，加强企业物资周转，提高水运、仓储能力；(5) 与邻近村镇合作开发本地资源，为发展工业提供充足的用地和劳力；(6) 广揽人才，培训人才。该厂现已有各类高、中、初级工程专业管理人员400多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由于具备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已先后与法国、联邦德国、美国、苏联、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及台、港、澳商人洽谈投资办厂或进行合作，有的项目已投产，有的正在洽谈中。

三、积极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该厂是一间老厂，干部、工人对制糖工业比较熟悉，而对外经工作却较为生疏。为了扬长避短，防止盲目性，对引进项目均以市场为导向或与制糖生产有关。1983年引进年产600万条糖用塑料编织袋生产线，提高食糖包装水平。这个项目改革十分成功，推动了全国制糖行业的包装改进工作，加上投产快、产品质量好，被广州市评为新产品先进奖，全国包装改革先进奖；引进蔗渣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发展甘蔗的综合利用，提高蔗渣的经济价值，该项目从1987年立项，与广州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香港越秀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三兴纤维板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9月13日投产，已生产中纤板材11500立方米，产品质量逐

月提高；配套脲醛树脂除自用外，还外销534吨。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该厂逐渐积累了从事外经工作的经验，并培养了外经人才。引进项目逐渐从行业内向行业外过渡，如兰石洁具、聚苯乙烯等几个项目即属于行业外的产品。与美国国际森林公司引进的真空加压全细胞全穿透的木材处理厂正在加速基建，目前设备已到齐，预计今年可投产。

四、外引内联，内外互相促进

经过多年的努力，该厂外经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签订中外合资项目8个，利用外资684.70万美元。形成境外企业帮助办好境内企业，从而吸引外商投资，把外经工作与内贸生产有机地结合，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1987年，塑料编织袋厂出现了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困难的局面。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与香港穗华（一轻）公司联营，成立了联兴企业有限公司，使塑料编织袋厂顺利渡过了难关。1988年这个厂因产品质量好，获得轻工业部出口产品铜牌奖。后来，该厂通过改造、仿制设备，使生产能力扩大到年产1200万条的规模。

该厂创办的兴华工业开发公司，是内联企业，资本雄厚，先后吸引了港商、新加坡商人前来合作。

该厂与番禺新造镇经济发展公司联营的振兴实业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土地、劳动力的优势，吸引了美国、马来西亚商人前来投资，合作办厂。

该厂准备进一步利用国际上配额的有利条件来生产出口产品和创办更多的境外企业，逐步发展成外向型企业。并努力争取在1991年实现出口创汇600万美元的目标。为创造外向型企业（集团）公司准备条件。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公司总公司

责任编辑：林有能

公关活动与企业的发展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的启示

余 华 湛

建于1973年的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经过白云山人18年的奋斗，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全国三大制药厂之一，并跨进全国500家经济效益最好的大中型企业之列。它的成功，是与它注重开展富有特色的公关活动分不开的。

一，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开展公关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党现阶段的任务。因此，我厂十分注意结合生产经营开展公关活动，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我们把在全国开展优质服务和信誉投资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关活动来抓，1982年我厂率先向全国医药商业部门宣布对产品实行五包（包产品运输途中损耗、包产品降价损失、包产品超过有效期的库存损失、包淘汰药品损失、包质量问题造成的退货损失），解决了医药商业部门和广大用户的后顾之忧，大大提高了企业的信誉。几年来，我们还组织医生、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到全国各地，举办学术报告会、新产品推广会、用户意见座谈会，又开拓了产品的市场，打开了新产品的销路。

我们把加强与广大用户的联系作为公关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以“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为主题，先后在四川、安徽、江苏、黑龙江、山东、辽宁、天津、河北等地开展了大型的问答有奖活动和公关活动。今年1—3月，我们在四川举办了“白云山与您共度新春好时光”活动，使白云山的企业形象深入到千家万户，一股“白云山”热在天府之国兴起。销售量大幅度增长。

实践证明，公关活动是企业沟通用户的桥梁、厂家联系用户的纽带。

二，走向社会，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我们在抓好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效益，走向社会，使企业在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我厂在国内首创企业办体育、企业办文艺之先河。从1984年起，我们承办广州足球队，易名为广州白云足球队。1989年，我们又成立广州白云足球俱乐部，承办广州足球一、二队，这样，既支持了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又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1984年，我厂还资助了广东白云轻歌剧团，剧团到全国各地演出。大兴安岭发生火灾，剧团到黑龙

江义演支援灾区，深受群众的好评。

我们在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时，还积极争取新闻界对我们的支持，广泛利用新闻媒介的力量，宣传产品和企业。同时，我们与各地的新闻界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白云山的发展，为宣传白云山的企业形象出谋献策。几年来，省、市、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为我厂宣传达2千多次，使白云山的形象深入到千家万户。

医务人员常年工作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人民的健康辛勤劳动，同时，他们又是我们最大的用户。逢年过节，我们分别给全国各地的白衣天使寄去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和贺年卡。一卡寄深情，带去了白云山人的情和爱。

三，以“爱心满人间”为主题，开展公关活动，使企业永远保持活力。

我们厂的经营口号是“白云山、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我们以“把健康送往千家万户、把爱心洒向人间”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关活动，把白云山人的情送往祖国大江南北，把白云山人的爱带到了神州大地。

我们把支援灾区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大兴安岭火灾，1989年江西水灾，去年汕头风灾以及今年华东水灾、汕头风灾等，我们都尽力捐款、捐药和捐物。

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是我们办厂的根本宗旨。近年来，我们在生产优质产品的同时，还组织了医务队、流动医院，到全国各地为群众服务。我们先后到过全国20多个省市的敬老院、荣军院、福利院、老干部所为群众义务治病，免费送药。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我们医疗队的足迹，到处都洒下了我们白云山的爱心。1989年中秋节，我们分别给武汉市武昌区福利院、哈尔滨敬老院、南京铁心桥敬老院送去中秋月饼。教师节，我们给边远山区的教师送去药品。六一节，我们给广州智灵学校的弱智儿童免费送医送药，并赠送我厂生产的玩具。八一节，我们又为部队的老干部诊病送药。去年和今年，我们为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广东省、广州市残疾人基金会捐款。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公关活动，使白云山的产品进入千家万户，使白云山的企业形象越来越光彩夺目，使白云山制药总厂越来越壮大。这就使我们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公关活动在企业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

作者单位：白云山制药总厂

责任编辑：林有能

金石

◀ 鄭鏡鴻先生
▼ 劉學偉先生



許文海、蓉子、楊越、洪楚茂



林周全中學



鏡鴻路



仙都中學



潘厝學校



華僑醫院





廠長：陳杰



國務院副總理鄧家華、廣東省委書記謝非視察梅縣廠

廣東省梅州工業新星

梅縣綉綸廠



廣東省省級先進企業梅縣綉綸廠，具有現代國際先進工業設備的國營企業，生產各種規格的低彈絲、網絡絲和FDY仿真絲。產品暢銷全國各地，以質量穩定、價格合理而深得用戶青睞和好評。



廣東省代省長朱森林視察梅縣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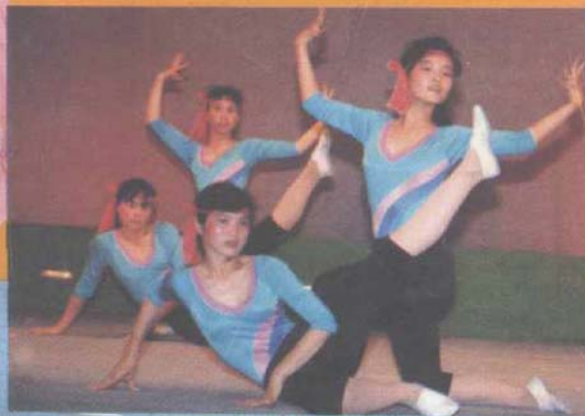
引進FDY技術簽字儀式

該廠獲梅州市職工健美操表演賽女子青年組一等獎

主要產品低彈綉綸絲



綉綸車間後紡部分



廠址：廣東省梅州市江南八號工業區
 電話：242182 243840
 傳真：243236
 電掛：3321
 電傳：429009 MXDLC CN
 郵政編碼：514021

(攝影：謝廖沙 撰文：登書)